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二篇

中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册）

目录

| | |
|----------------------------|-----|
|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 4 |
|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 4 |
| 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 | 52 |
|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 90 |
| 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 96 |
| 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 114 |
| 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 142 |
| 第七节 四川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 159 |
| 第八节 武汉解散“工总”----- | 181 |
| 第九节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 211 |
| 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 285 |
| 第十一节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 309 |
| 第十二节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 | 312 |
| 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 321 |
| 第十四节 抓叛徒----- | 353 |
| 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 371 |
|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 442 |
|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 | 442 |
| 第二节 打击极左思潮----- | 472 |
| 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530 |
| 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 536 |
| 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 555 |
|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582 |
| 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631 |
| 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675 |
|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748 |

| | |
|-----------------|-----|
|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753 |
|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795 |
| 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819 |
| 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825 |
| 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908 |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壹、本节概述：

一、歪曲军委八条，镇压革命群众

“八条命令”颁布后，叶剑英根据“命令”，先后处理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从一月十七日开始，石河子市先后有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冲击了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

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与汽车二团、独立团发生武装冲突，共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 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谈话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条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聂荣臻与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这样一个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一）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 XX 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二）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 XX 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
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布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热烈响应军委号召，大部分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规定

一，海军，空军，飞行航校，各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二，海军舰队，机关和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暂不搞四大，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望各单位遵照执行。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陈伯达接见第二军医大学和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

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辩论，有的人还要打倒。（众：我们没有要打倒）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里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

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湘江风雷”的通知

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规定的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和四〇三厂同志们：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单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由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专职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二月十八日，成都军区把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

成都军区抓了数万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叶剑英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
文章指出：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以达到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维持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聂荣臻对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到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全世界人民把无限希望委托在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革命最高的指导思想。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主席著作，和他们本国情况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恐慌万状的，采取什么行动你们都清楚了。仇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采取一切手段，对留学生采取法西斯手段，证明他们是恐慌和虚弱的，苏联修正主义带头勾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反华高潮，这就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边境加紧活动，不断挑衅，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出笼，斗争很尖锐，很复杂，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叶群说：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

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说：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肖华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批判武汉市“三钢”、“三新”等造反派二月八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抓了三钢、三新派的一批头头和骨干。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

（详情见“七二〇事件”专题）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通知

各总部、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各基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学校机关检讨的规定”，完全适用于军队内部派往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工作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五一研究所和机要密码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关于青海省赵永夫事件另有专题详述）

发生类似事件的还有广东、内蒙古、安徽、河南、西藏等省。

二、“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

〔两封信写于六日至八日之间〕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丕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

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三）略（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
 接见

叶剑英在会见时说：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才行。现在中央该项小组的权力太大，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有些不妥当呀。许多老同志对此有反映，我多少做了些工作可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比如处理陶铸的问题，当初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长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我就有看法，认为他不适宜这个职务。但他毕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前的呀。不经任何手续，只是由陈伯达，还有江青同志的一次讲话就把他打倒了，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好嘛，尽管他该撤。

毛泽东说：这事没和你商量过？

叶剑英说：没有。对此老同志很不理解。不但我不知道，当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他们问李富春时，他也不知道，说没讨论过。

毛泽东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商量嘛。他们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会议上来决定。不过，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叶剑英说：许多问题我也不清楚。谭震林、陈毅他们说，如果开了中央文革小组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正政治局委员的行使其他人的政治生命岂不是更无保障了吗？主席啊，大家的这种安全感还是应该保障的，不然没法安心工作。

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有缺点和错误完全可以提。但不能像刘少奇那样肆意攻击。他和一些省市负责人说，十一全会以后是中央文革执行了反动路线，这个话是颠倒黑白。

叶剑英说：刘少奇那种恶意攻击，我们当然不能客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也不能把大多数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推到刘少奇那一边去。我们之所以能坐下来安心搞内部问题，履文化大革命，不全凭解放军镇守边关吗？

毛泽东说：这个观点我赞成。军队要稳住，一定不能乱。革命造反派夺权，一是要有领导干部，二是要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没有这两条，他们夺不了权，即使夺了，也巩固不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毛泽东说：

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

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叶剑英说：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李富春说：我看也是这样。别看有些人把毛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好。

陈伯达说：请剑英、富春同志说具体点！

毛泽东说：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

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扯到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干的。我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个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措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周恩来说：是不是叶群、杨成武、萧华同志也参加的好？

江青说：萧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拍着桌子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发言。

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周恩来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当天晚上，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

(二) 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

(三) 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

(四) 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日程：

(一) 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 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会议还未正式开始讨论。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

谭震林接着对张春桥说：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他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呵！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只看到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正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家的扶手连我们去了还用紫外线消毒，更别提普通群众了。批判他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说：这叫什么问题？就算老干部有缺点，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挨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张春桥说：不是，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谭震林说：你歪曲！

张春桥说：像你这种思想，起码应该批判即使我们想保你，广大群众也不会答应！

谭震林说：你所谓的群众，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今天会上我敢打保票，曹狄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你们把他们打倒是迫害老干部。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

陈毅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说：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问题。

谭震林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拍着桌子说：你给我回来！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讲，干什么就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谭震林说：我就要和他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哪。

陈毅说：谭老板，你不要走，留下来就是要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周恩来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许多干部都揪出来斗，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

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

叶剑英、徐向前说：连国民党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周恩来说：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康生说：我没看。

周恩来说：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你们谁起草的？

陈伯达说：我不清楚。

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给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

陈毅说：不但红旗十三期社论有问题，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要负责任。（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党的会议，当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下去绝对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能搞小动作。同志们都要顾全大局，不能作损害党的任何事。好，散会。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写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

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党章上大概没有规定这么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常委审查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从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江青会见林彪。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毛泽东说：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对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说：

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周恩来说：

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说：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周恩来说：

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康生说：

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说：

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说：

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党答应么？

周恩来说：

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个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毛泽东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说：

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

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

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毛泽东在卧室里说：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周恩来与陈毅谈话

陈毅说：真没有想到主席会得出这样的！我们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这可不是搞阴谋呀！我不怕，大不了成为刘少奇！他们不就是让我低头写检查吗？为了大局，我写检查。我真没有想到，江青还有这么大的能耐，竟使整个中国都按她的意志转起来了。没想到，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谢富治、李先念与谭震林谈话

谭震林说：林副主席应该站出来替我说说话嘛，我谭震林革命四十多年，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毛主席！我好糊涂啊！我错误地理解了毛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以为下一步是反左，没想到反来反去，反到自己头上了，我太糊涂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啊。谁说我不写检查来，我写也是向毛主席写，不能向其他人写。我三天之内就可以交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叶剑英、李先念与徐向前谈话

徐向前说：我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早在长征时期就跟他走了，还等到现在干什么？请你们汇报主席，我就是说了那么些话，要杀要剐随便，我不在乎。反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这么大，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上海市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对参加北京市革命师生军政训练的部队指战员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对“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进行了批评和驳斥。

这次会议印发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谭震林等人提出的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文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陶铸亲自抓，李富春亲自主持，谭震林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主张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文件出来以后，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样做打击面太宽了。把文件退了回去。周恩来阅后又送到中央文革，他在上面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值班的关锋认为：这个文件不好。王力、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也同意

关锋的意见。由这五个署名的文件，经过江青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批字，退给了文革小组。)

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些文件。

二月二十六日，是会议最紧张的一次。

康生说：二月十六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势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陈毅说：江青同志，我没有否定延安整风！

江青说：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陈毅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样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要王力念材料：陈毅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是也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陈毅说：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谢富治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令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经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事先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二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叶剑英说：是我。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的！

江青问：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席批准照发的。授予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动，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说：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二月十六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说：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十八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屈你们！

周恩来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

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怵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的，有背景的。总后台就在上头。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类人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江青说：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嚣张，又是拍桌子，又叫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什么话都摆在桌子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

叶剑英说：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说：难道你只是脾气、习惯吗？你的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有人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李富春说：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二位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周恩来说：你做的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中央文革就那

么几个人，管理全国这么多事，作了那么多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二月十六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牢骚。

江青说：这是动摇啊！

周恩来说：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的关于天津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材料上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

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第二方面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极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

三、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用他们的思想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 100 余人。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一些人更加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说：赵永夫打得好。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地方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

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什么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煽起了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肖华怒气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

会场立刻哗然。

叶剑英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

这次会议情况迅速反映到党中央。中央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叶剑英在会议上“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随即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会议的方向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2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批评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

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毛泽东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四、“三结合”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杜绝将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

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

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肖华对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马场进行正面教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总后勤部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人员供应问题的通知

四、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

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讲讲刘、邓路线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关锋：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

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退江青。 可以，照办。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

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
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
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
你们的东归还你们。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
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
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
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一
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
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
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
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
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
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
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对肖华同志口述的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电话指示的电话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次发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以后，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

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召集该院两派代表会议纪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曼村与海军文工团军乐队代表的谈话

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叶剑英：

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

六、军管是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

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

五、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揭露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作了辩驳。

会后不久，一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 81 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有人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在李先念检讨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认为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同志们应该欢迎李先念同志的自我批评，同时希望李先念今后多到各部里面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随时发现、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很好的几句话。今天的会证明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以求的有了初步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开始。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同主席所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正因为这样，先念的检查是推迟了，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喽。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同意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打倒姚依林大会”上的讲话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我也是犯了错误的，以前你们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打倒李先念方向也是正确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嘛！希望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批评。

我的错误，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分两派，如果因为我分两派，我心里不安，感到惭愧。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周总理谈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风

今年一月由上海工人阶级为首，联合了革命群众组织展开向上海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经伟大领袖批准，传播到全国，这样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更进一步唤起了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的觉悟，认识到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展开和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就形成了全国一月革命的高潮。当然，革

命发展高涨了，那么，阻碍革命不甘心失败的分子就要出来了。走资派不甘心失败，暗中操纵，就出现了二月逆流。又经过伟大领袖指出，经中央文革努力击退了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时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至五点半，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我们要提高警惕。民院抗大，东方红两派后面都有坏人挑动，钢院的也要注意：是否有坏人？有坏人就自己起来抓嘛！不要只抓对方的嘛！天津大联筹在陈伯达讲话以后就自己起来抓了。安徽的，江青 9 月 5 日讲话后，他们一天晚上自己就把双方的坏人抓出来了。这样就很好，不要别人抓，各派抓各派的。

这次周总理处理的农口秦化龙问题就处理得很好。本来谭震林讲了秦化龙是坏人以后，保守派就被扶植起来了，把革命派压下去了。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受到了批判，批谭是完全应该的，当时他们也提出为秦化龙翻案。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现在证明秦化龙确实是叛徒，在新疆监狱里叛变了，他们就把他揪出来了，这次秦化龙实际上就是曾经要为秦化龙翻案的这一派揪出来的，当然那一派也参加了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一派揪出来的。这就很好嘛！现在就不能把保过秦的那一派压下去而让保谭的那一派翻过来，那个保谭的案不能翻，这个作法是完全对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农口《革联》批准斗争谭震林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发生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是继刘、邓、陶事件之后，在一月革命高潮中发生的，又一个反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迄今官方未公布过正式文件。这里采取的资料是从民间著述中摘取的。它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参考：一是，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版的《叶剑英传》、《聂荣臻传》、《徐向前传》的有关论述；二是，二

0 一一年七月，王广宇的文章《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中指出：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这些材料都收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但历史证明：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并不是仅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作法提出强烈批评，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对他们的批评，称之为“二月逆流”是完全正确的。

所谓“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指“大闹怀仁堂”这一件事，而是包括从一月下旬开始至三月，叶剑英等人利用手中权力，支持、指挥一些军区，把一些军内外的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大规模地捕人，甚至开枪屠杀群众。

1 月 2 8 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2、3 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1 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2 月 5 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

在湖南，2 月 4 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 2 月 5 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2 月 7 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头上万人。

在湖北，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

在吉林，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月4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8）

在四川，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

在福建，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3月9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3月22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8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14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才基本上遏止了这股逆流在全国的漫延。七月，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扭转了这一趋势。

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泽东也留有余地。毛泽东要江青去看望陈毅。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让他们于“五一”上天安门城楼。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这个事件作了淡化处理，意在团结一批老同志共同做好工作。

实践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7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8月20日修改

第四章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

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壹、本节概述

一、“联动”分子从反动血统论走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大闹怀仁堂”活动中：

（一）“联合行动委员会”政治上走向反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西纠一小撮人乘王明瑚（王明瑚是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入运动。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值班的机会将王非法绑架到“劳改所”。

他们抢走了王明瑚的手表，将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来撞去，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王明瑚小腿被踢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动用了“坐飞机”的酷刑，几个暴徒揪住王的四肢向上抛，使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然后将王上衣剥光，用钢丝鞭猛抽一百余下，使其昏过去。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场。”朱支前手还拿大姆指粗的钢筋抽打王明瑚，甚至用刀吹伤王的前额，鲜血喷出老远。

经过这几番非人的折磨以后，王明瑚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但是那群歹徒们还让他劳动，叫他围着炉子跑，逼他举大砖头。

直到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来到六中、才使王明瑚出了虎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联动给清华井冈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 1966 年 11 月 15 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的一封恐吓信，全文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装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下：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

韩北宁：大狗熊 李旦生：白面蛋白质

李乃民：日本人 丘志全：日本良人。

哈！哈！哈！哈！

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

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

杀李旦生战斗队（手印）

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

17 /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联动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7434 代号 发 1008 号

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手，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你妈的个屁吧！

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

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

砸碎狗崽子的狗头！

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酒热血，捍江山

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后，联动根本不理睬，进行打、砸、抢。

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加指示。

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他妈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砸了新北大校刊编辑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继“劳改所”之后，六中“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

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烈士子弟，现已被公安局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革命学生耿小西进行公开行刺，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想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刺脖子两刀都未中要害，以后便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捡得一条性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分子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人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公安人员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释放出来后，他们说公安部乱抓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会。

由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

彭小蒙临场指挥，她对清华附中的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

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

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人（其中一个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嘶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彭小蒙奔上台对刚刚念完口号的马X X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

12?26 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巴，秋后蚂蚱。”

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口号是：

1.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这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 活着干，死了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人、强占了公安部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工作人员，迫使这些人离开办公室。

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人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人的头部。

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

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人，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人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士，该女士当场昏倒，而他们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

这帮人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

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

第二天，即 29 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人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撤走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人，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士，踢伤一个男士，经公安部工作人员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康生批语指出：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广大群众实行大民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二) 拿刀子捅人的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 康生 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座谈纪要

江青说：

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是流寇！法西斯罗！希特勒！（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红卫兵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

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你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人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

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标语。

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

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人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惶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分子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旗帜闯入北京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X X万岁！”等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X X”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传单。

一月六日，联动砸了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 X的一封信。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 1.7 晚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打倒江 X”。

他们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战士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砸了北大附中井岗山。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康生、江青、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谈联动会

康生同志：联动会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借此，欺骗群众，“三条”（按：“三条”是指联委会等造谣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也没有。中央文革怎样？我们支持他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逮捕他们。

江青同志：现在有个几百人的联动会，他们炮轰谢富治，包围公安部，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小头头应该抓起来，实行专政。他们号称三千人，里头有西纠、海纠、东纠。**冒名周总理的指示**。他们也是可以分化瓦解的，要把他们的头头目抓起来，专政。他们说抓了一百多，其实才抓了九个，对他们专政，是法律制裁。

周总理：他们联合行动委员会造些谣言，首先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又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样，都是胡说八道。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载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学文革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力威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联动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 X 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联动”于二十八中再次纠集五、六百名人，企图第 6 次冲公安部。

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 X”，“打倒周 X X”，“打倒陈 X X”、“刘 X X 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

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全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治、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江青说：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文革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

陈人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

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他们得知父亲仍然是一个兵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可以放了我。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他们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我被送回公安部，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后回家的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事做了批示。”

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身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当时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到弥留之际，她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摘自陈人康著《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X X当国家主席”的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打。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一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人。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二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传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谢富治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谢富治讲话：

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刘格平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陈永贵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

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三）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

江青说：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

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

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

（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

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被关押（扣留）的 140 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说：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

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更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周总理讲话：

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

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

7434 密字 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 4 月 24 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 1967. 4 月 X 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 7431 密字 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一”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不起！”“打倒江X”“刘XX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淋。

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刺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刺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说：“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四）特色社会中批判血统论、联动组织的余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谭力夫的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

（谭力夫倒打一耙，是有人人指使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章云的文章：《斥“血统论”》

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

（颠倒黑白！）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

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

“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一代。

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按照胡思升的逻辑是不是要把阶级分析统统否定了？）

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966年6月，“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

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

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1966年11月以后，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

联动于1967年1月1日颁发了著名的003通告。

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

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

1967年1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这个民运分子也与其他民运分子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他对“联动”表现出的对文革的严重不满、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表现出严重不满，称赞为“是一些宝贵的思考”，称赞少数联动分子政治上走入歧途是“成熟”、“”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余樵：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

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

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

-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 七、元帅的愤怒
 - 八、揭发的真相
 -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 十、“红八月”大事记
 -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 十五、逮捕谭力夫
 -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 十七、“十二月党人”
 - 十八、灭顶之灾
 -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 后记 顽主天下

二、遇罗克的《出身论》从反对阶级划分走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一)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打着批判《血统论》的幌子反对阶级论

1, 《出身论》的要害在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说成是新的“种姓制度”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出身论》之一：《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

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

今天的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

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学校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

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出身论》之二：《谈“纯”》

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

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

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

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反驳步曙明

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扯！

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战组、宣传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唯出身论》和《出身论》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 一、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关系

- 二、关于重在表现的问题

-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出身论》的作者，虽然谈的是阶级出身，却不作真正的阶级分析，只是写了一些表面的个别现象，就荒谬地下结论说：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而否定阶级对一个人的影响。

《出身论》还有很迷惑人的一面，他们为了迷惑别人，唤起反动阶级的阶级仇恨，不惜用了大量篇幅谈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女如何受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

《出身论》的作者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地主，资本家血腥迫害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罄竹难书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当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的时候，分过什么老子，儿子，成份，出身吗？百分之百的工农及其子女，不要说上大学的绝无仅有，能上小学的又有多少呢？他们在政治上有说话权利，当上什么官的有没有呢？如今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几个上不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工农子女到如今上小学有困难的又有多少？

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就要求人人平等，甚至在要求平等的背后，仍然想像解放前那样，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才不算受害，这乃是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十足的表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二）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1, 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经历

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是私营企业主，在“三反”“五反”中遇崇基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是贪污嫌疑对象，被关押、逮捕，母

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反右派中遇崇基说：“人和人，冷冰冰”等等，被打成右派，母亲王秋琳（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也被划成右派。遇崇基劳改。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

1960年夏末，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未被取录。

1961年春节前夕，他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遇罗克就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

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

1964年初，他回城，几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在一所小学代课。

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

1964年8月，他进入工厂当工人。

2, 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反映出的政治立场

1966年1月2日，他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主题批判近来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966年1月27日，他写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的。”。

1966年1月29日，他写道：“今天，则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

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6日，他对陈伯达颂扬毛泽东不满，他写道：“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1966年2月15日，他写道：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6年6月4日，他写道：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1966年7月29日，他写道：所谓当权派云云，亦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行动起来？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三）遇罗克涉嫌刑事案件

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搞串联，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把手榴弹到香山埋了。

1967 年下半年，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遇罗克被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

接着又把对遇罗克的调查重点转到“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是否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问题上。

196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 年 1 月 1 日，谢富治批了“同意”两个字。

1968 年 1 月 5 日，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的判决书，有这样三条罪名：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197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联动及反动的“血统论”

谭震林说：就算这些老干部有问题，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要挨整？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李先念说：现在在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

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联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央是怎样处理“联动”问题的？

1966年6月，“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它一开始就遭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劝阻。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是血统论的推广期。“血统论”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走资派、保守派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同时，一批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纠察队”逐渐变成保护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1966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

1966年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告正式成立。并提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1967年1月1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003号通告，宣称：一九六〇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它要加以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为副主席的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文革是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它要加以粉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它要加以取缔；各级造反组织都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它要加以打倒。这就充分证明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反动组织。

由于他们大搞打、砸、抢、抓、杀，攻击革命组织，残害革命群众，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一些干坏事的分子被扭送到公安机关，实行治安拘留。

1967年4月，北京市被公安机关拘留的140名联动分子，经过教育以后全部释放。

1968年以后，这些人同广大知识青年一道，下放到工厂、农村、部队经受锻炼。

1976年以后，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二、关于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

遇罗克的判决书及有关档案、平反书及其档案，人们都无法看到。估计很可能是“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一条罪名证据不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遇罗克以此为主要根据判处死刑，就是一桩冤案了。

这桩冤案的形成当然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也并非如某些人说的是“四人帮”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而是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法院审判，并经过中央领导人批准的（宋永毅说：关于遇罗克之死，有些高干子女说，处死遇罗克是有关的中央首长批示的，是位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长。数一数当时中央里出身不好的有周恩来、康生、江青……，而这些高干子弟向我暗示，是在出身问题上很计较的那一位，可能是谁大家都知道了，他批示枪毙遇罗克。我们假设他们说的是真的，当他在写下枪毙遇罗克的指示时候，他已经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因为遇罗克讲出来的话对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应该是更容易接受的常识，对不对？无论这个人是谁——《民主中国》1999年6月号）。可见对个案件的慎重。

同时，不能因为遇罗克判处死刑是一桩冤案，就把遇罗克的《出身论》以及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都说成是正确的。

下面是两个民运分子对遇罗克及其《出身论》的评价：

宋永毅：《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时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

《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

这个宋永毅非常可爱！他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反动本质以及遇罗克的真实政治面貌，清楚地揭露出来了。这个民运分子故意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其实，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的不平等！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中难道说存在过什么不同出身的人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吗？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由于阶级还没有消灭、由于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个人分工的差别仍然存在，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平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剥削制度、剥削阶级！

郑也夫：读《遇罗克》断想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

这个郑也夫也坦白得可爱。他把遇罗克的政治、阶级本质暴露无遗：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

2007年9月13日初稿

2011年8月24日修改

第四章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

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约2000人，进入汽车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车二团的掌权派请求独立团支援。独立团派了92名指战员到汽车二团。

1月26日零时，双方开枪，造成5死6伤。

1月26日，农八师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要求进入师部的造反派进行武装阻拦，在冲突中打死2人，伤27人。

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进行枪战。

这一天，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

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

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

总理：你们冲进过新疆军区，没有引起什么问题，这很好。现在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不要被苏修利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敌人是不会翻天的。不要这也怀疑那也怀疑的，毛主席有这样的信心，对你们这样信任。你们应该对中央军委有起码的信任，第一，新疆要把军队稳住，新疆这么多问题，先抽出一条来，什么应爱护？解放军嘛！

总理：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草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

总理：12.19 绝食，停工是全出于激愤，可以理解。责任归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但不提倡。

你们回去着重宣传我们这几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

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

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

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师、团（场）、矿、企业事业单位均应成立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并受上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群众可以在本连队（车间）和团以上机关的本部（处）建制内建立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文艺团体、科研部门和医疗单位，一律按照原建制搞好本学校、本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干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生产建设兵团所有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及全体支边青年一律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所在单位进行串连，不外出串连；有生产、工作任务的单位，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批判张仲瀚总结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会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解决了生产兵团的关键性问题，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这场夺权斗争不只是表现在这个会议上，几个月来表现在生产兵团的各个方面，表现在许多事件上，一直反映到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相当激烈尖锐，我们经过这次会议，关键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问题：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

么健康。

第四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要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

第五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来说，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需要，现在更加证明了，揭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集团。

第六个问题：夺权的斗争，取得初步的胜利，还要继续，这个继续不是一切都打倒，区别两类矛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军区支持的一派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不让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参加。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红二司等组织开了一个三万人大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与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记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传达总理同新疆革命造反派来京代表谈话要点

〔注：此件为新疆军区文革办公室魏学武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九时五分，同全军文革办公室蒋培国通电话核对的。〕

一、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但要与石河子事件、自治区党委内部斗争划清界限。

二、你们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他已经回到乌鲁木齐准备检讨，并且准备找你们谈谈。

三、军管单位除机要部门外，根据规定，有的可以串连，进行四大，但不进行大串连。除军队方面另有规定外，地方上，各造反组织，不应解散。

四、所逮捕的人，除现行反革命外，其它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要全部释放。

五、对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事件，中央的看法不变，责任在兵团党委和自治区党委。

六、三月十二日的大会，不要二司及其他造反组织参加是错误的。听说三月

十九日的大会开的不错嘛！

贰、本节简论

新疆石河子事件是一个地方的又涉及到军队的流血事件。

这件事的发生，一方面是建设兵团的某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派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群众不了解建设兵团的特殊性，按照一般地方的要求在兵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中央处理这个事件的原则是：命令部队向群众开枪是不对的；但中央不支持群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所属单位搞夺权。

由此涉及到新疆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问题。新疆军区不支持造反派夺权，造反派就冲击军区，军区就抓造反派。这也是当时全国的基本形势。

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就是反复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说服军队领导人要支持左派、要正确对待群众；另一方面教育群众要拥护军队，要正确对待军队犯错误。但是，这个工作遇到的困难很大。一方面是军队方面有来自“二月逆流”的影响，一些犯错误的军队领导人很难转过弯来；另一方面是群众中既有来自极右方面的干扰，挑动群众斗群众，也有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完全按照对待地方走资派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军队领导干部犯错误。

军队、地方领导干部、群众都要在运动中经受考验、重新学习。

2011年9月1日修改

第四章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壹、本节概述

一、“二月黑风”

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众对内蒙军区有意见，组织人在军区门前静坐。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中午 12 点 15 分，内蒙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希望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出来辩论。

正在这时，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提着手枪跑出来。

韩桐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

接着，柳青便开了两枪。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体内。

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 20 分钟已无法抢救。

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818”自己打的。

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

此后，内蒙军区还宣布许多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許多人。

二、中央领导人调查内蒙古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总理：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副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指示

内蒙的问题很大。现在武斗很严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别给家里做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拉萨、新疆甚至提到，叫解放军滚走，叫解放军掉转枪口。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

总理：从十八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如果 18 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与呼和浩特市“三司”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给周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电报。

电报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具体标语、口号如下：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

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

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国务院给内蒙军区的复电

三月七日电悉，同意对X院实行军事管制，该院系XX技术试验单位。军管后要坚决按照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及军委二月一日、二月十六日两项规定贯彻执行。对 818 暂不急于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忙取缔，先进行政治攻势，分化其组织，孤立其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待进一步暴露后，再相继逮捕法办。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十八号你们（军区）要开会，十七号报告，还要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818”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总理：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同志：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

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李天佑与内蒙古师范学院代表谈话纪要

当晚李付总长、吴涛政委同调查团全体成员，机场军代表杨××乘车到了师院，一看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就知道气氛不对。并上了二楼。李付总长进院时又重申：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临走之前，李付总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八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李天佑来了刮了一股妖风。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

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他们还说：“派调查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二师宣传科科长、公安厅军事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一份材料说：“你谈你的，我夺我的。”“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中央文革干涉了我们”。

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总理说：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查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康生与呼和浩特市农民代表周文孝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三、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1967.04.13；中发[67]126号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六、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

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讲话：

从一月下旬报社问题后，本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解决得很好，报社问题可以承认错误。刘昌开始先承认错误，可是回去一商量就变了。以后群众要求见刘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见，问题就大了。

“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军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以为军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

二月八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查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区打的，弹头也拿出来了，口径与军区子弹相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查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哪位女同志来了吗？（田光同志站起来）你身体好些吗？（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卅天）看！

化验一下就押了卅天，这是内务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付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

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以来，由北京军区派的副司令员腾海青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副司令员肖应棠，作了检讨。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使腾海青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以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晚，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公安厅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

五、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自四月十五日以来，连续举行旨在反对中央决定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利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等正确口号，蛊惑人心；他们公开怀疑中央决定，说什么“中央决定违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大肆制造谣言，大喊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他们还恶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大量工人、贫下中农，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制造白色恐怖事件。例如四月十七日晚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二十一日冲击公安厅；二十二日晚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十六日以来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他们为什么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掀起这股反革命逆流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以后的一些天，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的约三、四千人，到北京，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被接见的有内蒙《无产者》方面到北京上访的数千人。

周恩来讲法：

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

同志们！（鼓掌）我现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鼓掌）：

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长时间的鼓掌，呼口号，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继续口号）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继续鼓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鼓掌），不要鼓掌，听我讲嘛！

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

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一个从军区里打出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纵容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线，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群众答：不对）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组织犯了保守的错误，是受他们操纵的，一点不冤枉，你们并不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会觉悟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们接见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跟那些反动的家伙，反动的头子划清界限（鼓掌），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限，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二月五日发生，中央就找他们来开会，开了两个多月，中央解决过省市自治区的问题，最长的是这个地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批准了九个要求，大家共同承认了的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从自治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上层领导者嘴里说出来，周总理说话不算数，没有效了。

我们又派了一个正式调查团，就是由军委总参谋部副总长李天佑同志为组长、吴涛同志为副组长，去了九个人吧，九个人的代表团，去把师范学院被包围

的情况调查清楚，也到军区调查站在哪一方面，还调查河西公司的事情。这完全是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后，从军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方面传出来，说九个人里头七八个人是右派。完全是造谣。因为那里头去了两个记者，两个记者就是在二月五日前后同情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们也被捕了，这两个记者是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出去的。军区不管他们是中央派的记者，也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并且还把自己的笔记本，日记本都没收了。中央打电话去叫他们放，军区还派人押解到北京来。我们叫他们回去把记者接过来以后，在北京的，他们的军区一位副司令员黄厚同志；他们正在北京作为代表会谈这个问题，他就带这么几个笔记本一直不给我们，等到三月下旬了，三月大概是二十号左右，咱们见到这两位记者了，才知道黄厚还带十几本日记本，等我们问他才承认，才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目无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调查的情形，就是代表团调查的时候，他们居然听信王逸伦那一派的人，弄了几个人向李天佑同志来示威，使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很好进行。调查回来以后，居然从军区，从无产者、工农兵那方面放出空气说，是谈判了，北京我们是找各方面代表来会谈，商量办法，解决问题嘛，他们说北京的谈判是重庆谈判。说在北京谈判那么拖，只要我们这个组织扩大了，夺了权了，中央他们只能够承认既成事实。这个两面派的态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

由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青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开会以前和开会以后，有少数人公然地煽动一部分人退出会场，采取恶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这是公然的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公开的对抗党中央的行动，这是绝对不许可的。

为了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象，能够回头，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就打了电报给呼和浩特各个群众组织，批了三条。这个三条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康生同志讲话

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还有几个部队的几个人参加，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来，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

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来的电报。他的电报怎么说呢？他们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中央精神打着括弧的）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们讲的反动宣传，大量张贴标语，什么样的标语呢？在这个电报上公开地写着，我念念同志们听一听，什么标语。这种大幅标语内容：第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鼓掌）同志们鼓掌了，问问同志们，这是反动标语呢？还是革命标语？（群众：革命标语。“喊口号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好，第二，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笑鼓掌）第五，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这样的革命标语，竟然使内蒙军区能够向军委发电报说这是反动宣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内蒙军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总理讲话：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同志：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众答：对。）

总理：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当讲到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时，会场很混乱），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江青同志：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决定。）

总理：内蒙位置很重要，那里发生的每个问题，苏修很快就知道，前一段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错捕了很多革命小将，他们生气勃勃，敢说敢干革命性很好，而被打成反革命。八条下来，没机会和他们讲，遇到了阻力，主要是王逸伦、王铎搞鬼，你们没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同志：首先问你们好，我完全拥护总理对中央决定的解释，中央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聂荣臻同志：中央对内蒙问题是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后决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审查批准的，是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听党中央的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能产生对抗中央的行动，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像林副主席指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台下一片混乱，递条子，送材料，这时江青、叶群同志接送来的条子和材料）

叶群同志：同志们、战友们，首先我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完全反映了我们的心情。我来之前，请示了林彪同志，他知道你们来了，知道你们都是想多作一些革命工作的，他嘱咐我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

在这次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们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象市场一样。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

总理：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

总理：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内蒙来北京上访的军人仍有一部分人不肯回内蒙，分住在六个招待所共 788 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一些仍然滞留北京的军人，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

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

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 100 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

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

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

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

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

众：“好！”

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

在五月廿四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

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所策划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

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对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批示
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五条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革命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的决定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二十四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 788 人（其中 150 人）宣布禁止外出，要他们自己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为负责执行上述决定，由谢富治，xx，李天佑，郑维山，xxx五同志成立五

人小组，以谢富治同志为组长，xx同志为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周总理讲话：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
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 4 月 13 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 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付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 100 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付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公开批判乌兰夫等人的意见
1967. 05. 28；中发 [67] 169 号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意你们关于在《内蒙古日报》上公开批判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的意见。

1. 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为了严肃军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采取断然措施，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军委批准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命令。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和措施，受到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在内蒙古军区机关部队已恢复正常秩序，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好转。

贰、本节简论

内蒙军区是全国第一个向群众开枪的省军区。

打死了一个学生，比较起来，这件事并不大。问题在于内蒙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不肯承认错误，说这个学生不是军区的人开枪打死的，而是学生自己开枪打死的。中央派人调查、验尸，取得了证据。他们还把参加验尸的军区医生关起来。真是荒唐透顶！

从根本上来说，内蒙军区的一些领导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问题反映到中央以后，中央对他们反复进行教育，并作出了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更严重的错误在于，内蒙军区的一些领导人公然对抗中央的决定，操纵、煽动、支持、纵容几千军人到北京上访、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在中央首长接见的会议上起哄，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殴打内蒙军区政委及军委办事人员。拒不服从中央返回内蒙的命令。

这件事也深刻暴露了建国以来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山头主义、特权思想、军阀作风等等。

2011年9月2日修改

第四章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起草和刻写“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密令说：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号召“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到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巷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高师与张平化签订“望江楼协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发生武斗

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并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大搏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湘江风雷”叶卫东、李铁凡等人，批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约十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湘江风雷”与高师矛盾激化

双方在要不要召开“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分歧，导致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湖南省军区明确支持“高司”，“湘江风雷”与高师之间的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浪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为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

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

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央“1·20”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即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此后“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全军文革办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后来，省军区承认抓了五千人，实际是，三天内，省军区统一部署，逮捕大小头目一万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头目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 12 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

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省军区在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

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长沙红中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四月初，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

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

高师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省红联”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 7 人；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 5 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叶卫东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指导思想

他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革命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红中会再封《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红中会”、“井冈山”等，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将其封闭。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成立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一批领导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成立。省委“永向东”的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湖南省最早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

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各县区机关也都成立了“永向东”

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长沙市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在河东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河东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

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次日谈判，汤建平等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回答：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说：走着瞧！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中央文革发来电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省会造反派组织在东风广场（现在东风路省体育局门前的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

成立绝食指挥部，组织人到省军区绝食示威。湘潭也出现类似情况。

三、中央处理湖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华国锋在湖南长沙发表的声明

〔华国锋原是湖南“长高司”的结合对象，是“工联”的对立面。中央点名要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到北京汇报。十九日在长沙上飞机前，华国锋发表了与以前的观点相反的声明，表示支持“工联”。声明大意如下。〕

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

二、“长高司”、“红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

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支持。

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五、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晚，各造反组织领导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死亡 10 人，负伤众多。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长沙武斗事件的急电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一点二十五分）

长沙工联：

关于长沙武斗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有分歧要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二、请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协助湖南军区，制止武斗，并同军区一起参加双方的协商。

三、严禁打、砸、抢、抄、抓，杀人、放火凶手要拘留法办。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省军区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人听取温玉成汇报时关于“湘江风雷”问题的谈话

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实很坏，有的是帮会。

（《周恩来年谱》）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接见湖南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的谈话

请他们转告湖南两派：（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好文件，搞好生产。这五条谁执行好，谁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周恩来年谱》）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叶卫东提出“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

总理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华初谈“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对当时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

用。“湘江风雷”的斗争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二·四”批示后大肆抓捕“湘江风雷”成员，甚至其它组织的人员也抓。

现在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因为湖老谭搞假报告向中央文革谎报军情。

说“湘江风雷”有枪枝，是假的，是展览馆的。

说“矿冶”事件打死了六个人，姓氏名谁？住在哪里？家属是何人？交出来！可是至今还未交出。

]说“湘江风雷”搞经济主义用了二千四百多万元，实际上全湖南的文化革命费用，包括红卫兵串连费用在内，才一千七百万多元。到“二·四”批示前，“湘江风雷”只用了二万七千多元。同一时期内，“高司”用了二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学校内开支的费用。

至于打、砸、抢、抄，我们不提倡，但“湘江风雷”当时打砸的也只是“长保军”、“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等保皇组织。“高司”当时也不例外，也参与了。

讲到株洲“湘江风雷”的罪状就更可笑了。说什么他们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已经联系好了。还说准备了许许多个麻袋，装人往河里丢等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到井冈山的红卫兵很多，当地的粮食，蔬菜都供应不上，要湖南省委支持，省委没人管。株洲的“湘江风雷”知道后，马上答应援助。于是借了三千多个麻袋准备粮食、蔬菜，这是好事嘛！冒想到倒成了一条罪状。

说组织不纯。当然，由于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某个基层内有一些不纯也是不奇怪的。

但光凭这一点是不是就能全盘否定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呢？当然不能。在决策人里面，有很多干部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二百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

“工联”派十一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三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又派人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一千多

发子弹，打了一夜。

南郊有冻肉厂等八个工厂停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工联”在火车北站抢走 12 支枪，抓走 11 名解放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下午，“高司武工队”的四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十三支步枪。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高司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工联夺过去。抓走了七个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湖南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7.19 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戚本禹等。〕

这次接见主要谈铁路运输问题。

总理建议“铁路军管，可介入地方，两派都退出。”并说：“邮电局军管行不行？”

总理：“你们都相信（47 军），我让 47 军黎源同志跑一趟行不行？（答：行！工联派鼓掌）他们都相信你，请你跑一趟，你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不要搞武斗了。谁拥护就证明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铁路是全国的命脉，停车损失就很大，特别是对国际有影响。”“双方铁路组织不要介入地方，他们双方也就不互相斗。”“铁路无论如何不能中断，要以全局为重。”

总理：“湖南问题不统一，慢慢会统一的。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国有刘、邓，中南局有陶、王，湖南也有嘛，王延春不是双方都不同意吗，你们可以批判他。”

总理：“双方做好调查到底谁夺了枪，我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要说假话。你们青年人，要光明磊落，错了就改，允许你们犯错误，也允许你们改正错误，我要求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

生。”

总理：“再不要武斗了，不要抢枪了，看哪派做得好，就证明你们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马上恢复交通，不夺枪，不武斗，不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黎源同志的部队保护岳阳到衡阳的铁路，今后军管一律由 47 军派人，原来的军管单位有意见也可以派 47 军的人去补充或调换。”

（来源：摘自 67. 8. 14 《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黎原在长沙“工联”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我代表我们四十七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

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首先恢复铁路运输，然后停止武斗。

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一定保证安全。

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第二步任务，就是要协助我们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

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要痛痛快快的。

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章、梁答：赞成。）

“湘江风雷”问题中央给你们分担责任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湖南医学院发生武斗，死伤数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戚本禹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的谈话

江西、湖北的情况，你们要研究一下，湖南造反派受压制，中央是知道的，中央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你们不要走错一步棋，走错以后，就不好办了，事情不要做得过火，过火就错了。四十七军是支左部队，造反派围医学院，四十七军有不同看法，你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保证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航运）不要出问题，双方要停止武斗。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去马坡岭国家军火仓库，拿走三卡车军火。

五千多名各组织人员冲进省军区司令部，占领所有楼层，包括保密楼，军事档案和一组密码被拿走。后无法拿回。

医学院被围困，断水断电 6 天。

7 月 26 日，415 团 6 连驻地被造反派冲击，军火被抢，士兵受伤，副连长刘美展在队前试图劝说，派性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刘美展指挥部队干部战士卧倒，不准开枪还击，自己被击中右胸牺牲。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咄！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咄！

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总理：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

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今天又比十九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

现在军区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是因为他犯了路线错误！

总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四十七军负起责任来。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

（总理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

总理：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像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总理单独接见）

总理：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红联”派站起来要辩驳），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检讨

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方向，犯了路线错误。我要改，坚决改，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二月四日以前上报中央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如矿院上报打坏一百多万元的东西，实际上不到二万元。当时说到矿院造反派有八万多人，我们上报一万多人，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人，当时说打死三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说“湘江风雷”有枪，实际上是展览馆的病枪，“二·四”批示下来以后，因为我看不惯造反派，把革命群众当成敌人，又把造反派大大小小的负责人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头目，人太抓多了，革命小将当敌人抓了起来，有的关了四、五个月，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了，这是方向

路线错误，是极大的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搞肃流毒，错误更严重，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没有阶级分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肃来肃去，肃的是革命造反精神。

第三，支左工作也犯了严重错误。

第四，我们搞了“六·八”通令，更是错上加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郑波在湖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不管那边，发展快了，成份慢慢复杂起来。叶冬初同志你们发展快了，正赶上一月风暴夺权，夺权多数是对的。你们那里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官办的，解散了。“湘江风雷”也确实有不符合要求的行动，到京告状抢了几次车子。个别事件造反派可以劝说的。铁路要罢工，我们劝说了。军区的报告，多方面的反映，后来还有从其他方面的反映，我们中央几个同志决定的，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军区确有错误，军区在执行“二·四批示”时扩大了，抓人抓多了，后来肃流毒把相同观点的也搞了，问题更大。从“二·四批示”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我们察觉是逐步的，到六月份我们比较明确了，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察觉的。我表示了态，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表态的。

我们对军区的指示有错误，对军区我们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完全怪军区。当然形成这个局面军区有责任。我们的批示影响了军区，军区本身也有责任。龙书金同志到广州也承认有错误，写了检讨，比较好，主席批了五条，将来印给你们参考。

在广州检讨的比较好，回到湖南是另一个空气，武装部、军分区影响很大，很多改的机会都失掉了。军区的错误与刘、邓路线不一样，刘、邓是有意的反毛泽东思想，提出反动路线的与执行反动路线的有差别。军区不同，军区的“三支”“两军”的任务很重，又没有经验。军区认错了，改了就算了，从爱护解放军出发，改了就行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谈对湖南的二·四批示

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泽东说：今年 2 月 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同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高校的问题还是依靠他们内部左派起来革命，不要采取他们的办法去压他们。“高司”四五千游行反对总理，反对我们，我是小人物，不在话下，总理日夜操心，调查研究，为你们平反，他们反对总理，你们不管，只顾打内战。有相当多人受蒙蔽，你们要作争取工作，团结他们，分化他们。高校都是小将，犯错误可以原谅。对“高司”现在不宣布是保守组织，还是群众组织，少数头头是保守的，无非是蒙蔽了些群众。“高司”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一点好事没干，尽管他反对我，我不能说他一点好事没干。它是群众组织，你们能消灭吗？也许他们的革命不依靠你们，如果你们不采取正确政策的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戚本禹接见湖南“红联”代表谈话纪要

戚本禹同志说：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

万雄师”的道路。

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高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

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发枪，为什么不抢枪？从江西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抢总是不对的。

借江西这个例子，告诉湖南的同志，由于分区发枪，调动农民，造反派要枪有理由。要肯定，因对他有压力。但象长沙，造反派占优势，在大批抢枪就不对了。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月七日，在马坡岭和工程兵学院，工联和湘江风雷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 号

已阅，同意。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

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黎原

湖南的七二七工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再说服不了，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由国防口军管小组粟裕处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

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作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对解放军在支左中的一般错误应该谅解。如果坚持错误，成为一个时期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抵制，批判，也要注意区别对待。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五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四十七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

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查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总理：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

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四十七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四十七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枝，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四十七军派人指挥。

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他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高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

他们这样搞不对。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

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

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讲话
总理：

除了军区负责外，这个错误还影响到中央，因为根据省军区二月三日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中央也批准了，匆匆忙忙发出了“二·四批示”。中央接受了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估计，说应该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虽然当时“湘江风雷”因为是人数发展比较多的跨行业的革命组织，在发展中免不了混进一些、也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怎么纯，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个问题我们跟这次来京代表叶卫东、张楚榷、谢若冰等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况。但我们应该说这只是一种支流、细节，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把这个组织的头头采取了专政措施，就等于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用毛主席严于律己的精神，我们得到教训，中央没有得到自己的调查，就匆匆忙忙根据军区一面之词发出了“二·四批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不是说中央负起主要责任，省军区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呢？应该指出，报告是由省军区来的，事实材料是由省军区供给的（当然另外的一些报道也有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中央“二·四批示”有一点笼统，但省军区拿这个笼统的批示，就把它扩大了，就好象整个“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不仅解散“湘江风雷”及其所属基层组织，而且逮捕扩大化了，不仅逮捕头头，逮捕到底下很小的单位，十多个人的一个支队的头头也捕了，刚加入十几天的也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对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实行了叫“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也落入打击面。所以，压制、打击面就更宽了。这些责任，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恐怕要负更多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批示不是说了吗，有“红旗军”嘛。

“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一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

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一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十二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三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枝。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来了。同样，他们在贵州也有人煽动革命群众来反对贵州革命委员会。有一个著名的头子叫李××，在北京我们也把他逮捕了。在浙江，也叫“红旗军”，也是跨行业的组织，我们说服了浙江造反派的同志，“红旗军”在浙江不合法。下属组织归口，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查，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

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一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象“湘江风雷”，它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

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五十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让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

“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作“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

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还不止此。

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竟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查，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查、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毫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查清楚以后再作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就在七月中旬谈判的时候，蔡爱卿还在革命群众组织中放毒，比如，他说：现在是武斗的时候了，要拿武装杀到河西（湘江以西）去，解放大湖南。还说工人生产可以停止，他可以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说可以夺军权。这种说法，可以说原形毕露，被小将们识破了。

至于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如果说“红旗军”的问题，中央在一月确实说过“红旗军”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在一月二十二号中央常委和文革共同商量后，在人民大会堂，由我代表讲过一次话，讲了“红旗军”、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字。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委托黎原同志，请回到湖南继续调查。

现在，有一种形势分析是不对的，说武汉出了陈再道，现在全国的形势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全国都要实行反革命复辟呀！这种估计完全是悲观的、右倾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全国形势很好，陈再道的问题一暴露，武汉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嘛！“百万雄师”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神气了，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都起来了，形势马上改了嘛！几十万人的游行得到武汉三镇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解决了。河南的问题，军区错误的领导，我们在北京开会，把他们撤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解决湖南的问题。但是有人错误的估计，既然湖北出了个陈再道，大概中南各省都有陈再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不实事求是。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或个别严重错误的，军队跟地方性质不同，不仅湖南如此，广东、广西也是如此，也要作具体分析。

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们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作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三次了，也许是四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

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淅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啊！××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你是×××的。×××要夺军权，夺军权是不对头的。

再不能冲军区。要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刚才看了你们的计划，组织起来二十个连。但要注意一点，组织起来的连，不要跨单位，各单位各自组织，然后联合组织起来，执行警卫，也要分担任务。有了指挥部，就一起来，部队也要把枪背起来，这是第一个环节。

湘派：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需以“湘江风雷”为核心。

戚本禹：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别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议“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毛主席为核心。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代表，

总理：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一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总理：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吗！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二十个连，三千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四点五十至五点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湘江风雷”的双方代表

总理：黎原同志、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为筹备小组领导人。黎原同志任主任。

还有郑波同志、谭文邦同志、刘顺文同志，还有梁春阳，贾镛，万达怎么样？对！还有林国兴同志。万达有严重错误，可以通过筹备工作考验。

群众参加筹备小组成员，你们双方来的人要同等数目。原来商量各三人，也可两方各五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有一个，“青年近卫军”也要有，代表一个方面。“孙大圣”，敢闯，也有代表性，还有“长沙工人”。各方选自己的，然后协商解决，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是领导机构，要尊重。

首先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一千五百人，发枪一千条。“工联”方面工厂大，双方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每个连的人数就不相等。怎么样组织法，戴利（“红艺会”负责人）你们懂吗？派出勤务的时候，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五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一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学生如何组织，看是否这个学校组织很好，如果组织很好，再经过训练，才能决定能否发枪。如果组织好了，四十七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枪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查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黎源等会见衡阳党政机关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在省政法干校又接见衡阳代表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五年，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湖南省委积极派出工作组大抓“三家村”、“小邓拓”。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张平化上调中央主管宣传部的工作。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九月初，张平化主动请求回湖南“请罪、造反”。不久，听到“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风声，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向全省干部作“抓黑鬼”的报告。十月，他又作检讨。以后被中央保护起来。（一九七三年，张平化又被派回湖南担任一把手，他又干了不少坏事。十月政变后，张平化被华国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批“凡是派”中，张平化没有紧跟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了。据说，他写有回忆录，至今没有见到。不知他在去见马克思前是否有所悔悟？！）

一九六七年初，中共湖南省委瘫痪以后，湖南省军区负责支左。但是由于它的一些负责人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把造反派看成是右派。特别是对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四处收集他们的“黑材料”，加以夸大，无限上纲，上报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湖南军区的报告，未经调查核实就下达了“二·四批示”。这个错误当然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

但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在执行“二·四批示”的过程中，又加以扩大化，在全省把“湘江风雷”组织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都抓起来，估计全省在万人以上，有可能达到两、三万人。后来又提出要在全省“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湖南省军区与相当大一部分造反派的矛盾。

湖南的另一部分造反派组织，以“湖南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为主的“省红联”的头头们，受湖南省军区错误的影响，以及小团体主义派性的干扰，跟着干了一些打击“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的错事。形成了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两大矛盾就成为了一九六七年二月至八月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大串联、大批判逐渐演变成了大武斗、大枪战。

这其中有许多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2011 年 9 月 3 日修改

第四章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壹、本节概述：

一、青海省文革运动的开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开始了青海省的文革运动。

文章发表后，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论是“大毒草”；另一种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打扰了省委的工作。”

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要求报社作出说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六日，有更多的人涌进报社，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

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的内容都是：“社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负责写社论的人从“政治错误”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

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

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

二、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

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

四、组织专人专版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

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8·18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所有外地红卫兵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8·18”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

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大字报的矛头指向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后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向省委报社工作组讨说法，韩洪滨、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

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红卫兵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

文革，取得了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

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8·18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8·18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在一月夺权中爆发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青海的党、政、军纷纷用各种形式明的暗的硬的软的表示了反对。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赵永夫在党委会上也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他们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八·一八

革命造反派”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了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赵永夫等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

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两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在报社外面，是从草原调来的部队，一辆辆汽车、装甲车把印刷厂围得水泄不通；南面占领了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晒台，西面则在民房屋顶架起了机枪，在北面湟水河一座木桥上，更是布满了一层层荷枪实弹的年轻士兵（他们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语）。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包括干部、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大约上万革命群众便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保卫战，他们在报社印刷厂四周搭起了帐篷，日夜轮班，吃在斯睡在斯，报社许多编辑记者和印刷厂工人拿出家里的米面煤砖给守卫人员做饭烤火……。

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

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搞“绝食斗争”，要求收回“三条指示”。

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

“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这一天为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

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赵永夫等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三、镇压革命群众的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

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 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 (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后字 2 0 5 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直接策划、指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

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

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这次事件，前后共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人。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采用各种刑法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有人说这是叶被误作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赵永夫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四、中央文革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开枪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时，“军级干部会议”（后来又叫“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

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据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后来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

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

中央文革的《简报》刊登了红卫兵的来信，诉说他们被赵永夫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召开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

关锋 戚本禹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时间：夜至 22 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 ×××，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晚至 24 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24 夜—25 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

本禹、穆欣、肖华。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〇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 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 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 到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 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 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 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 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 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 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 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 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 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 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 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 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 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 命的一律平反。

(四) 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 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 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

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 [67] 110 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 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 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青海代表时的讲话

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

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

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

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贰、本节简论

青海赵永夫事件极具典型性，它是当时文革形势的一个缩影。

一九六七年一月，各级党委和政府由于负责人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批判，陷入困境，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妖风越刮越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地造反派纷纷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权力，从而加强对运动的正确引导、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此时，党中央命令各地的军队支援左派，然而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缺乏正确的理解，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而他们的这种错误立场又得到中央那些搞“二月逆流”的老人们的支持、纵容。

赵永夫作为一个副司令员为什么敢不经兰州军区、中央军委批准，就从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手中夺了权，并把他软禁起来，有人怀疑他这个时候就已经从上面某个人那里得到了支持。

二月二十三日事发当天，叶剑英就得到了西宁市大规模屠杀群众的情况报告，并直接打电话给赵永夫，鼓励他“打得好！打得好！”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事件，这既是邀功又是备案。然而，这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如果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屠杀群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进行调查。

二月底，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介绍青海“镇压反

革命”的经验。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后，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第四次青海问题调查会上，就由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这说明：事实很清楚，性质很明确，处理很干脆。

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 103 页）

然而，就是这些人，在一九七六年政变以后，又闹翻案了。不说别的，一次军队行动，打死三百多个工人、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十五、六岁的娃娃，他们就不感觉心中有愧吗？

2007 年 10 月 4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6 日修改

第四章第七节 四川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重庆驻军五十四军代表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 30 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并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八一兵团代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发言分别是红岩机器厂八三一代表、红农八一五代表、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代表、财贸八一五代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重庆“联络站”一派召集 50 多个群众组织开会，讨论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及联合夺权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的“一·二四夺权”是“假夺权”。

因夺权而激化的内部矛盾使重庆造反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财贸八一五王绍川、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徐正身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 50 余人。

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革命组织围攻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军区派出部队逮捕围攻成都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经叶剑英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这封信。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

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

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重庆革联会得悉中央军委2月17日致四川大学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公开信，连夜向所属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把四川大学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员抓起来，并提出“如有抗拒者，以革命行动对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

至 2 2 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 3 3 7 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重庆革联会布置凌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学八二六人员（包括从贵州经重庆返成都在火车上的八二六人员），砸了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重庆八一五派抄砸由西师八三一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控制的“一二·四惨案调查团”并将其成员赶出人民小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再次遭到重庆革联会一派抄砸，三司人员上街游行抗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召开大会，宣布工人造反军（北碚地区）六号门纵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场逮捕 7 人，勒令登记自首 58 人。会将拘捕人员五花大绑车载经北碚区、沙坪坝区、市中区游街示众。

重庆市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 237 人，刑事拘留 746 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与重庆市公检法联合发出《通令》，宣布工人造反军（临江门街道）前哨支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拘捕 13 人，勒令其余 80 余人三天内到派出所登记自首。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和市公安局上午在解放碑召开批斗处理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会将被捕者田树堂、许洪烈等五花大绑戴手铐挂黑牌游街示众三天，此外该组织还被判处管制 2 人，劳教 1 人，勒令

登记自首 72 人。

重大八一五出动 20 多卡车人员到北碚区抄砸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重庆师专附中八一五等组织以“一贯反对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联会”等罪名将重庆大学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关押 15 天至 3 月 7 日释放。

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工矿企业职工为主组成）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江海云在成都被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重庆报》公布革联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发表镇压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报道及社论《扫除一切害人虫》

重庆革联会组织人员晚上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重庆革联会一派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级镇反专门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重庆革联会组织上千人围攻反革联会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军工造反兵团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以来全市第一次冲击国防工厂事件。

重庆革联会布置各单位组成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门对反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进行抓捕、捆绑、刑讯逼供）。革联会组成警司（五十四军）、公安局、红卫兵（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三结合镇反小组”，到区县、工厂、街道地段指导“镇反”；从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四十一

中东方红等抽调 80 余名学生组成打鬼队，驻市公安局进行擒拿格斗、捆绑等训练。

从二月中、下旬开始，重庆反革联会一派的一些群众组织相继被驻军、革联会或参加革联会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勒令”自首、请罪，其间大量出现对被抓被斗人员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对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抄砸等武斗现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

到 3 月 4 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 5 0 0 0 余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重庆革联会对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战斗团实行戒严，捆绑斗争 577 人，拘押 120 多人，勒令登记自首、写认罪书上千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重庆革联会和市公安局宣布市中区红旗纸箱厂红铁锤战斗队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逮捕 3 人，拘留 5 人，勒令登记自首 7 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重庆北碚区驻军宣布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重庆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八三一负责人周荣等 7 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重庆驻军对后字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 30 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 29 人。

重庆驻军在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主持对西师八三一“首恶分子”的批斗大会，会后逮捕了“首恶分子”。

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黄廉从北京归来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重庆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反革联会的九一五战斗团团部。九一五负责人 8 人被拘捕。

重庆新华印刷厂红旗战斗队被公安局勒令解散，负责人被逮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砸抄反革联会的财贸九二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重庆革联会和公安局临委会在重庆灯泡厂实行戒严，宣布该厂八二八战斗团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余四个组织勒令解散，捆绑斗争 80 余人，拘捕 29 人，斗争会后游街示众。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的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六五分团发出通令，勒令该厂反革联会的军工造反兵团解散（此前该团已被抓捕和批斗多人）。

据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 2 月 24 日到本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 个，由群众出面砸掉的 82 个，自行解散的 146 个。

据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情况》中称：“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基层单位，大多数是工厂的）。”

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到三月底止，重庆全市被拘捕 2253 人，24 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另外被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抓捕的人员和砸垮的群众组织不在其内。

（以上关于重庆的材料摘自何蜀《重庆文革武斗日志》）

据后来统计，这次所谓“军委二·一七公开信”散发后，在四川省各地逮捕了八·二六派革命群众约十万人。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 1100 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 8 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 33000 余人。

二、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

康生同志说：

1. 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 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

3. 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

4. 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 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 14 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

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

康生：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 8·15 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 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

总理：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

人”几个字。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 7012 部队一个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 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

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

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

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

江青的讲话

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

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

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

周总理的讲话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

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

三、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

康生：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周总理：韦杰同志，你在1月29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陈伯达：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

杨成武：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

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周总理：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題，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

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

- 1、派军队保护造反派。
- 2、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
- 3、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

的滔天罪行》

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七月初，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将红色派从“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并且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 7790 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 7790 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王回来后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结果这些人都会被泸州的红联派俘虏。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1962年的6月19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

案。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还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宜宾市革筹派人与宜宾市武装部协商，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八八团一个连，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谢英富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

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民兵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州。另一路则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这就是有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行至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附近，遭到对方的伏击，被对方打死打伤多人。并被围困在此地多日。后来在 7790 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张键的指导下，对对方展开夜袭成功，双方均有伤亡。

一九六八年初，宜宾地区红旗派派人到宜宾县打死红色派一人。

谢英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傅文琪等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谢同意傅某等人的要求，派人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到了观音后，有两个队员将对方的一个人打死了。一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一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四、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 8·15 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

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

总理要他当众辟谣。

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 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

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

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

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五、八·二六与八·一五两派之间内战不止

贰、本节简论

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有它的特点：

一、关于所谓“中央军委二·一七公开信”问题

关于中央军委的这封信问题：

二月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事实很清楚，就是叶剑英搞的。

二、关于所谓二月镇反问题

以后搞清楚：这封信是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批发的，从二月十八日开始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川用飞机散发。

这是否也可以看成二月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二、关于二月镇压反革命运动问题

正如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的：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

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了六万人至十万人，创造了全国的新记录。

三、关于宜宾的刘、张问题

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宜宾市委书记张洁挺，一九六二年被李井泉秘密关押多年，并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五年撤消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

2007年10月31日初稿

2011年8月28日修改

第四章第八节 武汉解散“工总”

壹、本节概述

一、湖北造反派批判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至五日，“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

他们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受到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曾经“保省市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

五日，“工人总部”组织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三千余人，“联合会”也密谋用暴力抗争。

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早上一时，周总理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

总理向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捉了一些人，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一面红旗一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捉那么多人？当时北京就没抓，实质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插手北大，清华，当了北京市的顾问。

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拉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来斗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王任重自吹自擂，一大车，一看，真不象样子。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的名字。我特地看了王任重一眼，他好象满不在乎。下来，我向王任重说：“你要好好帮助一下张体学同志，他太不象话了”。他连忙点头“是呀！是呀！”其实都是他搞的，真是个两面派。

王任重到广州养病，你们把他揪回来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还发脾气。

王任重是 12 月回武汉的，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斗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嘛。

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是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林杰和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代表的讲话

“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无政府主义”。“现在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王任重写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等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信

自从去年 12 月 25 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

自从 1 月 20 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

从去年 12 月 25 日到今年 2 月 24 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

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

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

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

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们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对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超、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竞等同志分别与各组织协商，哪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要首先吸收，暂时不愿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要做好工作争取他参加。

我希望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王任重：《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以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张体学同志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总、二司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

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

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 12 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

即《二·八声明》。这个声明主要方面正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的重要性，以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勾结保守势力和社会上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危险情况；另一方面(次要的方面)则由于头脑中“私”字作怪，对夺权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和做法的其它某些革命造反派组织，指责为“托派”、半途出家的投机商”，因此在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引起严重分歧和打内战。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内造反派

军区通知造反派到军区礼堂听报告，一个人也不准缺席，不准外出，会场上

造反派被保守派包围，台上架有机枪，一个连的战士负责警卫戒备森严。副司令员孔××、叶×、韩××亲自主持大会，会上孔××把几个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是「反革命小将」、「小牛鬼蛇神」等，随后，军区副司令员叶×、韩××都控诉、训斥革命造反派为「假左派、真右派」、「纸老虎」等等。这时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斗后就当场抓走了三个人，有一个人要求公布被抓人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来就打了他两个耳光。一些战士高喊「要按军委八条办事」。

会后在文工团共开了六次控诉造反派的罪行的大会，小会检讨，请罪不计其数，文工团共抓二十二，大会斗争时坐土飞机，带手铐，大会「亮相」一百八十七人次，行政看管二人，警告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

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

把“拥护或反对《二·八声明》看作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把群众分为“香花派”（支持《二·八声明》的人）和“毒草派”（反对《二·八声明》的人），并公开发出指示：“香花派靠边站！”在工矿、企业、学校剥夺“香花派”群众的听报告、被选举等政治权利。对“香花派”群众大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在汉口井冈山大楼搞了所谓“工人总部罪行展览”，在武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搞了所谓“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造反大队”、“二·一八”红星军、“中学红卫兵”等 7 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分三批对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等革命造反派进行了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查的二千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

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二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工造、三新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在签发声明时，出现问题，红武兵方面派代表要求在声明上签字，遭到拒绝，同意他们在三新、工造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单独以红武兵名义发表批判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陆军第 29 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

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同志向二司等在京代表说

《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

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立即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主动停止了历时二十天的全市大辩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与到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要求恢复武汉秩序，要注意工业生产、大联合、恢复学校中的班级建制。要求集中抓好 3 件事，抓革命、促生产；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抱怨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下面为难。他并且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即下面建立机构来分别领导各省文革，或者当地军队定期派代表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人总部

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勒令 48 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湖北军区副政委张竞失踪

张竞，贫农出身，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支持左派的革命群众，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一直在搞支左的工作，工作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支持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新华农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深入新湖大调查研究。于三月十七日失踪，后停职反省、检讨，被软禁起来，不准会客，不准与造反派联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

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

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十六条，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工造总司和三新因此与军区公开分裂。

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 3 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称“二司比工人总部还坏”。布置各公安分局大肆调查二司大小负责同学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大整黑材料，为镇压学生运动做准备，接着就解散了曾反对《二·八声明》的新华工、新湖大、工造总司等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宣布了「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革命组织」的罪行

又抓了六个同志，其中四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当时两个女同志说：「我没罪，我不去。」士兵就推她们、拉她们，她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望着台上的毛主席像痛哭。会议主持者就命令拉上幕布遮着毛主席画像，演员们和被

捕的人都流着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同志五花大绑拖走了……。留下的同志含泪目送着她们，嘴里不断呼喊：「保护八条，不许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邓子政贴出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二司水电学院（即红水院）战士奋起反击，举行了声讨邓子政、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游行。武汉大学、湖北医学院、十四中等二司相继到红水院游行，支持红水院二司。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新华工数千人到红水院及武昌游行高呼“打倒谭震林”、“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被认为是“反革命游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们可能把你们砸了。工人总部的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没有宣布反动组织，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是没有材料。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们是历史的看问题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你们说有人想把你们整垮，谁想把你们整垮，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

同意他们现有基层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或参加其它革命群众组织，但不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总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对湖北军训团及群众组织的讲话
钟汉华讲：

“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工人总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总部没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广大群众不要人人过关。

工人总部有我们的家属，我们也抓了嘛！

陈再道讲：

解散工人总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总部很不纯，九个人就有七个坏分子，工人总部是群众强烈要求解散的，没有宣传是反动组织，只解散。

要把批判“二八声明”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支“左”办公室某负责人在华中师范学院作报告声称“凡是与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穿一条裤子的都是保字派组织”，“谁死保《二·八声明》，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三、武汉造反派提出为工人总部翻案、炮轰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二司、三新等数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十周年。二司和三新两支队伍在长江大桥头会师时，双方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情激昂。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三军部队战士与三字兵、三司等一起单方面举行游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

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三新工造和几十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加强了冲击军区阵式，上万学生静坐。满城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陈大麻子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陈再道在群众抗议声中被弄得焦头烂额，十分被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

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三新工造提出：，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这是他们的权力。此时，二司拼命为工总翻案，工造、三新也参与其中，为工总问题，工造三新和其它几十个中等造反的工人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和军区对立，冲击军区机关，游行，到市、区、公安局静坐，示威，工人组织全力支持学生，工总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造，一部份人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游勇，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称“钢八司”，（即按时上下班、下班后 8 小时自由参加运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陈再道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斗了王任重没有，这人要搞一下，会要开大些，是否把厅局长开个会。（江局长说，人太多了，是否分两层开，书记、秘书分开，上下揭，内外揭。）二司与工人总部把他们关起来，实际上是保起来。王任重写了几个东西，还要通过军区转发到地县。光写成绩，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说他为什么是三反分子，抓住成绩不放，对错误没有认识，未触及灵魂，把张体学与他关在一起，要张体学揭王任重，张说：“你像不像三反分子，我看不像”。

大专院校对“二八声明”认识不够，与刘邓路线分开来看，新湖大坚持不批判“二八”声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他有看法。大专兵保省委犯了错误不能怪他们，怪王任重、张体学。他说他是党的好儿子，这是用来迷惑人的，所以抓“南下一小撮”犯了错误。开始。他们没有把握，后来他们打出来，你们不要他们，他们就下厂下乡，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注意的，今后也要注意，有人把“三字兵”当作敌人是不对的，要允许别

人改正错误，欢迎别人革命。现在有一小撮人造谣表演跳出来，华农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拿左派，一手拿右派，锋芒所向是清楚的。

学生不搞军训、不管工农，还要出去，“二八”声明也不让批判。为什么要把串联取消，也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二司批判“二八”声明不下，说谁批判“二八”声明就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为什么不让去工厂？就是不让去！在学校搞斗批改冷冷清清，学生就喜欢轰，打旗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三新召开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会，

二司应邀参加大会。会刚开始，就遭数千三字兵冲会场，挑起武斗。三新、二司为了顾全大局、率队到湖北大学操场继续召开批判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红水院等校出现新动向开始出现“提着脑袋质问陈再道”、“武汉支左大方向全错了”、“炮轰陈再道”等大标语和大字报，反复辟的斗争序幕正式拉开了。

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则刷出“支左大方向全然没有错！”等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两派分别举行了大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八周年二司、三新的队伍高呼“坚决执行《十六条》！”“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队伍则呼“坚决拥护武汉部队公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二司、三新等刷出大标语“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另一派则刷出“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谁为工总翻案，决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陈再道钟汉华给湖北“新华工”等组织的电话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会动摇的。受蒙蔽的，你们

要争取他们，用瓦解的方法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

《湖北日报》要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市“抓办”派出新工作组到中学去镇压学生运动。市新一中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向市“抓办”提出撤走新工作组，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等四项严正要求，但遭拒绝。新一中小将毅然进驻市委，并宣布从4月12日晚9点开始绝食斗争，有1000多人参加，斗争得到全市革命群众支持。绝食54个小时后，军区领导人被迫答应四项要求，但第二天就单方撕毁协议，拒不交出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钟汉华给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

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红卫兵。

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报汇了。江青同志说：我收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0多人绝食。

（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

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陈、钟打回电话传达的内容是：

“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时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似乎文革在 1967 年已经该转入镇压反革命来收尾了。

（当时参加 19 日汇报会议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

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 19 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批示，感到震惊。他们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武汉事件后，陈、钟承认电话“事件”是他们打电话说了假话，但文

革以后，在陈的回忆里又重新讲了以上情况)。

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二司、新华工几百人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进行了20多天的静坐斗争

他们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被汉阳公安分局非法逮捕的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分部的负责人夏邦银同志(工人、共产党员)是革命闯将，坚决要求立即按军委十条放夏。但武汉军区拒不接受，反而挑动保守派和上万不明真相农民进行围攻，于是二司、新华工几百人从4月下旬开始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进行了20多天的静坐斗争，得到全市革命群众支持。最后公安局(已军管)不得不释放夏邦银，夏出狱后即与广大工总战斗队员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武汉“钢二司”等对话

同学：现在武汉到处流传着陈再道十九号的讲话，并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们希望证实澄清一下。

(念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特大号外(特大喜讯)(北京来电)

- 1、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
- 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 3、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散。
- 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们的政委给家里打的。

下午与钟汉华谈话记要

同学：相信你已经知道上午的谈话内容了吧，你们讨论得怎么样？

钟：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与武汉革命造反派的辩论

小：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

陈：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

小：你们不是已下了结论。

陈：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棉事件

武汉棉织厂 40 多个红武兵围攻到该厂去贴大字报的华中师范学院二司小将，用粗木棒、砖块玻璃片毒打，当场受伤 26 人，重伤 9 人。造成轰动武汉三镇的“4. 29 武棉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三司围攻湖大

三司保字派近千人纠集部份三字兵连续三次围攻新湖大解放区，挑起严重武斗，新湖大战士被打伤多人，解放区校牌被抢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清华井冈山中南调查组 5 人在汉阳调查时，遭冷冻机厂的红武兵和三字兵的毒打。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新湖大、新华工、红水院、机械学院等校斗争王任重连续举行了斗争湖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秋后算账派总头目王任

重大会，把王任重拉上台示众，二司、三新等革命造反派愤怒控诉和批判了王任重的三反罪行。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汉阳轧钢厂保守派阻挠该厂工总战斗队员开竖旗大会，用铁棒、木棍打伤工总战士四、五十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江汉公安局民警闯进公安学校打人

在上级策划下，调动近百名民警撞入公安学校，伙同该校三字兵将新公校红司的大字报全部覆盖，并毒打红司战士，打伤 30 多人，重伤 5 人。新公校红司向公安局多次照会并提出七点严正要求，遭拒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新公校革命学生在公安局前进行绝食斗争，

得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外地赴汉调查组的大力支持，到 17 日，全市有四万人参加绝食斗争，一百多昏倒，几十人休克。军区领导人迫于形势，不得不签字同意新公校红司的七点要求，但两天后就单方面撕毁协议，说签字是“被迫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

代表：军区机关 24 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 200 多人。武汉抓了 2600 多人。

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 48 张，说：“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

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

戚本禹说：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 3 月里

被捕的工人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红武兵等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武汉市大专院校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
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坚决为工总翻案。

三字兵中革命的同志起来造反，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武兵中要革命的同志也站起来造反，成立了“红武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都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坚决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冷冻机厂、水泵厂的一千余名红武兵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静坐的群众

在精心策划下，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进行静坐斗争的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等革命小将，200多人挨打，几十人受伤，14人重伤。事件中有便衣警察、军用卡车参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

这七条（指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错误的，是省委内一小撮策划二司内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军队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们一小撮讲话，不准人民讲话，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针、路线、政策。现在他们这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认这七条比较有利，他们已经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军事机关和军管单位，围攻军代表，方向完全错了。这不是对缺点错误提意见嘛，他们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参谋长，绑架钟政委，而且强逼签字。

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就不能挽救他们，要大搞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有人插话：刘真是否等一等呢？）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晚上 12 点左右，有人派出近百名解放军包围新湖大，不许新湖大战士出入，这是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同日，商业学校保守派勾结建校、钢校的三字兵突然袭击商校二司朝阳兵团，重伤 10 多人，四、五人被长马刀砍伤，一人被迫跳楼。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总字 127 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副省长、张华副秘书长操纵了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在省、市领导干部中大搞签字画押式的“集体亮相”，一次就公布一百多干部集体签名的“亮相”大字报，公布了几次，声称有六、七百领导干部站在保守派一边。

付省长孟夫唐同志养病多年，运动以来没有他一张大字报，就因他在四月底公开表明支持二司、三新而被军区正式文件（如“5. 21 公告”）中打成“孟夫唐之流”。

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任爱生亮相站到二司、三新一边后被陈再道之流唆使三字兵抄家，绑架拘留，残酷毒打，最后任爱生被迫跳楼求救，摔成重伤。

原付市长薛朴若，三月份被委派为市“抓办”副总指挥，说薛是好干部，但当薛 5 月 15 日起来造反，愤然辞去“副总指挥”，并宣布坚决支持二司、三新后，就被打成“政治投机商”。

四、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引发两派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造反组织举行集会游行

工总、九. 一三、工造总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盛大集会，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一周年，会上还有新北大公社，

清华井冈山等赴汉战士发言，聂元梓等同志也来电祝贺，会后进行了游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任爱生同志给陈再道的一封信公开信 陈再道： 我还未死，成了残废，这个责任应完全由你负！ 我于四月上旬曾写了几张大字报，反对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当时严厉批评了武汉部队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不是支“左”，而是支“保”，他们扶植已经垮了台的保守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压制革命造反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并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

四月二十八日我又给你和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前段武汉地区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强烈要求你公开检查，迅速改正，以利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当时我还指出：你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是湖北省委常委，一切重要会议你是参加了的，一切重大决策你是参与了，省委在文化革命中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你一份的。但由于你的特殊地位，对你的旧帐没有认真清算。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你就怀着刻骨的仇恨，赤膊上阵了，利用你的特殊地位，更加顽固地坚持已经破产的刘邓路线，疯狂镇压革命左派。信中还讲了一下张体学，就其错误，你比张体学的错误要严重十倍，危险十倍！因为你盗用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盗用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利用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你执行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

不是吗？由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湖北地区几乎要葬送在你的手上，从武汉到专县，从工厂到机关学校，整个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遭到严重打击，我省文化革命的烈火几乎被你扑灭。在你的大力支持下，保守派死灰复燃，例如：二月份以前，全武汉三字兵几乎全部被分化瓦解，剩下的不到 3000 人，可你却为三字兵涂脂抹粉、鸣冤叫屈，明的暗的竭力扶植，现在已达十几万人。另一方面，你对工人总部这个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却造尽了谣言，放尽了暗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硬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关进牢房，并非法宣布解散“工总”。你靠的是什么？是保守势力，如“三字兵”、“黑武兵”、“大专兵”等。继续蒙蔽他们，竭力扶植他们。你打击的

是什么?打击的是“工总”、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革命左派组织。尤其恶毒的是，你纵容和策划“联动”、“特动”、“黑武兵”经常制造武斗，打击革命造反派和敢于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压制革命干部起来革命，压制干部起来造反。在这里，顺便把我受迫害的情况讲一讲。5月3日下午，军代表李俊找我谈话。当天晚上就找了数十人抄了我的家，强行将我绑架。绑架时，用毛巾将我的嘴堵住，放上了大卡车，并对我进行拳打脚踢，把我关押于22中中等学校的三字兵司令部，完全失出了人身自由。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不能学毛选，不能看报，不能会亲属，连大小便都不能随便外出，生命安全遭到威胁。对于此事，我曾向三字兵联络总站和“特动”提出抗议。他们说：是经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批准的。后来我又向你和孔庆德、韩东山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要求你们直接处理。但是你们置若网闻，根本不理。我也曾向支左办公室提出过六项要求，即：(1)我的问题由支左办公室处理；(2)到北京去告状；(3)向武汉市人民发呼吁书；(4)保障我的人身安全；(5)有权看报和学习毛主席著作；(6)每三天会见一次亲属。这六项要求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解决问题的诚意，相反你们却叫军代表李×告诉三字兵总站负责人谈。任爱生那三张大字报非常狠毒，要三字兵对我严加处理。在被扣押期间，我对你还提出不少要求，特别是要求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但你回避这个问题，一直到6月17日晚上，三字兵“特动”对我做出最后决定，我才不得已于18日上午9时越狱跳楼。……现在我仍是气息奄奄，人命危浅。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再次向你提出六项要求：(1)、你必须公开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2)、你必须为工人总部平反，朱洪霞必须立即释放；(3)、必须公开宣布支持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左派组织；(4)、公开宣布对“大专兵”、“乌拉希”要分化瓦解；对三司、三字兵当作一般群众组织和保守组织，绝不能作依靠；(5)、公开宣布解散联动、特动、黑武兵，并严加惩办首恶分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6)、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陈再道，你看过我的信后，可能暴跳如雷，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我和其它亮相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迫害，但我任爱生严阵以待，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生；我死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不管面前出

现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我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决心不会有丝毫动摇！ 陈再道，你不回头，就将加重你的罪过，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会饶恕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也决不会饶恕你，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林付统帅也决不会饶恕你！何去何从，由你选择，不过时局将迫使你迅速选择罢了。 任爱生于病中 1967.6.1

《红水院》1967.6.15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二千多百派围攻长办联司，90 多人被打伤。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军区发表 6.4 公告

武汉军区在 6 月 4 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下午，400 多百派围攻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驻市委联络站，受伤 8 人、联络站被砸。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几千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等驻汉阳的联络站。

百派冲入大楼后毒打造反派战士并施放毒气，几十人受伤，十几人重伤。百派攻占了区委大楼，汉阳一片白色恐怖。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百派误伤解放军战士

解放军空字 659 部队三十余名穿便衣战士清晨乘军车往郊区参加支夏劳动。行至汉阳桥头，被百派误认为九.一三，遭伏击，对解放军战士拳打脚踢，当场数名战士血流满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机械学院二司战士游行庆祝中央《六. 六通令》时，六卡车百派把队伍切断，毒打机院同学，伤 20 多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工造总司”等以“文官政府”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紧急公告”和《6.4 公告》针锋相对，号召全市工人努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加倍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防止武斗，并下达七条命令，禁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进攻武昌造反派联络站

六、七辆满载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驻在区委大楼的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区委大楼全部被砸毁，联络站 20 多名同学全部被打伤，5 人重伤。在场数千群众奋起制止百派行凶，也惨遭毒打。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围攻造反派驻在汉口民众乐园联络站

上午，近百辆卡车满载上万全副武装百派围攻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工总、九. 一三、二司、新华工等联络站，多次冲击，打伤造反派 200 多人，死 6 人，重伤 14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

1000 多百派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打伤 40 多人，重伤 13 人，被逼跳楼 4 人，绑架 17 人(其中有到该厂去调查的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柴玉本)。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居仁门事件

凌晨 5 点，几千百派手持狼牙棒、带倒钩的长铁钩、长矛等包围居仁门红锋中学 36 人，企图砸掉二司的广播站，有的百派还穿了石棉衣，准备火攻并对红锋中学实行断水、断电、断粮。红锋中学二司小将坚守楼顶，向全市呼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三千有组织的农民袭击华中农学院，致死华农学生。

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秘书接电，提出要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嘲笑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吗”，不同意党委去研究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循礼门事件

晚 10 点，40 辆满载百派的卡车在江汉路横冲直撞，狂叫“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街道两旁小孩高呼“解散黑乌龟(即红武兵)，镇压反革命!”百派恼羞成怒，下车用长矛往人群中乱刺，受伤很多，当场被刺死 2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武汉钢二司《千刀万剐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汉口六渡桥——第一次大武斗

百派首先抢攻中南旅社旁的财贸大楼，想以此作据点占领中南旅社，然后围攻人民文化园。下午一时许，一千多全副武装(头戴安全帽或钢盔，手持两米多长的铁矛)的百派向中南旅社奔过来。并占了财贸大楼。凭借大楼居高临下，砖瓦石头象雨点般打向马路。

一支由工总、一冶、工造总司铁军和“钢八司”组成的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杀向财贸大楼。其中二十多人冲上了二楼。

就在这时，百派从江汉公园派出七卡车援兵，包围了财贸大楼，七辆全新的大卡车，朝着群众冲来，几个小孩当场被压死，老太婆更难逃横祸，群众被铁矛刺伤，被车上早已备好的石头、酒瓶打伤。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硚口、人民文化园方面相继开来了十多辆军车，停在十字街口，解放军出面调停。

“毛泽东思想武钢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敢死队”，分乘三辆卡车从人民文化园方向过来，当一辆卡车冲入百派阵地时，一辆军车封住路口，卡截了后面两辆车子。“九·一三”的车上几十名敢死队员(除个别被群众救出外)几乎全部被打死。

与此同时，被围困在财贸大楼内的二十多人，大部份战士被打死。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特大血案中，有一百多名造反派，革命群众被打死(其中不少是十几岁的小孩)，重伤就有三百多名。……

十八日上午九点钟，百派使用了毒气、烟幕弹、硫酸和高压水龙，又一次向民众乐园发动猛攻。

从清队运动开始，对胡国基搞打击迫害，在长达两年的“学习班”毒打迫害之后，1970年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名义被“扭送”公安局，关押四年之后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间以“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胡国基又被收监，收监的名义是在毛主席逝世那一天还在贴大字报的“大不敬”罪名，最后法庭是以“反革命报复伤人、打砸抢”罪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在湖北××水利工地

调动农民与工地上的老保，用长矛、锄头、扁担围打工地上造反派，有150人被打死，1000多人负伤，使全国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汛期瘫痪。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在汽车配件厂

凌晨，约一万多百派和从东西湖市郊的大批农民围攻汽配厂联司二百多个上夜班的工人，使用匕首、大刀、长矛、高压水龙、瓦斯等凶器。二百多联司战士除几名幸免外，全部受伤，重伤50人，工人工程师杨正超等十多人惨遭杀害。厂内20台机床被砸，二月内难以恢复生产。同日晚，新华农战士也在武昌被百匪围攻毒打。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武汉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在汉口民众乐园前集会

愤怒控诉百派大屠杀，追悼6.17死难烈士。群众高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百派内部分裂

原三司司令部驻汉口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袁军公开声明宣布退出三司，加入三司革联。百派内部一部分人杀出来，成立了“百万雄师革联”，声明坚决支持二司、三新，坚决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汉阳轧钢厂、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上千个手持铁棍、长矛的百派围攻汉轧工人总部，切断水、电，并用吊车吊至半空向楼内扔浓硫酸、燃烧弹、烟幕弹。工总战士高唱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英勇自卫，由于寡不敌众，死 8 人，重伤 100 多人。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百派调了上万人从水上、陆上围攻四院造反派，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困在大楼上，四院最后被攻下，造反派战士和家属死伤不计其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水运工程学院

万余百派和农民从水、陆两路围攻新水运二司战士，守卫大楼的水运二司、工总、九. 一三战士被逼全部跳楼，当场死伤数百人，被绑架 300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次大武斗

6 时开始，“百万雄师”叫战，广播促“工造总司”：“（1）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2）“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3）“将抓进去进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4）“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

针锋相对的广播员朱庆芳等控诉“百万雄师”、陈再道……放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8 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消防车开来几部，开始向“工造”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水龙头向“工造”喷水和当年电影中向罢工工人喷水一样。

10 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向“工造”大楼内抛石头，“工造”内已准备了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11 时，强攻不下，“百万雄师”开汽车将“工造”大门撞开，准备杀入。

12 时，“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二十辆汽车全副武装的支援“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已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那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也被杀死。

当场杀死 28 人，杀死“工造”负责人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杀伤“工造”

负责人、宣传部长彭祖龙、保卫部部长严志斌、广播员姐妹俩朱庆芳、朱庆玲，一死一伤，姐姐朱庆玲肠子被勾出、致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大楼

长办造反派群众于 25 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晚一点多钟，“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七字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司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召开誓师大会，决心将抗暴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

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工总、二司等在武昌举行盛大游行

庆祝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6.26 来电，决心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并对百派中给蒙蔽的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思想攻势，使他们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日下午 5 点，武汉工学院二司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中央 6.26 来电，群众拍手欢迎，在水塔上的 100 多百派二次冲出刺伤二司战士，重伤 8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武汉军区发出《通告》

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百派包围新湖大，并出动装甲车把新湖大围墙撞倒，

见新湖大战士就毒打，有一个路过的红体兵(造反派)因叫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被百匪当场打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钟汉华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社会上叫百匪，踏平什么，骂是骂不倒的，谣言被戳穿了，可以教育老百姓。红卫兵有的喊：“解散工总，欢迎受蒙蔽的起来革命”。很好。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帐不对，但有的人的帐，还是要算的。

那些所谓造反派“三新”、“二司”不听我们的话，中央的话也不听，中央社论说成是大毒草。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

“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

“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

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武汉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勤关于工总问题的报告

在工总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直是参预其事的。三月份取缔工总，我们参加了，我本人也参加了，三月十七日全面大逮捕时，我是副总指挥

(一)工人总部的性质问题：可以肯定的讲，工人总部不是被少数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

(二)领导权的问题：工人总部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据我调查了解，对照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十条以及历来逮捕人的规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朱鸿霞同志等九位勤务员绝大多数是好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尽管有个别勤务员有严重错误，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七·一五大血案——第三次大武斗

7 月 15 日，是武汉最热天气，武昌高校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双方发生武斗。半小时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追杀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一直到晚上 11 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 200 余人集体到电车公司，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由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

“百万雄师”包围搜查后，将王兴武查出杀死，另又杀死了几人，为了毁灭罪证，将这几位人遗体埋于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战士 吴克强《放开我，妈妈!》

贰、本节简论

一、湖北省文革形势大好，造反派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尽管当时中央并没有马上表示支持，但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 12 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这表明，一些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在宗派主义、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支配下，在造反派内部争高下。造反派的这个错误很快就被执行错误路线的武汉军区领导人所利用。犯错误的头头们很快就清醒过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并主动停止了历时二十天的全市大辩论。

二、武汉军区的某些领导人乘机打击军内外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徐向前到武汉亲自主持会议，徐向前问：“武汉军区为什么听不下来？”孔某某说：“我们的腰杆子不硬。”徐向前说：“反对面怎么办？”孔说：“抓？”徐向前说：“对！各总部、各军部都要抓。”徐向前说：“别的军区有反革命，难道你们武汉军区就没有？我不相信！要抓，你们还下不得手，不要怕，有武汉军区作后台！”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武汉军区继续镇压军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宣布了「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革命组织」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勒令 48 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

三、造反派愤起反抗，军区领导人坚持错误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 4 月 21 日接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棉事件，开始了保守派殴打造反派，造反派到公安机关、军区搞静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 3 月里被捕的工人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声称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拒绝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几千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等驻汉阳的联络站。开始了六月份的武汉全市大武斗。

2011 年 9 月 5 日修改

第四章第九节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壹、本节概述

一、南京军区下属各部开展“四大”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

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

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

斗队，其他各部门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

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特别是有些人，“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还有不少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日左右，宣传部的摄影干事陈时秋写了一张大字报

陈时秋认为：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他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

这张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是：陈时秋和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

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

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

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他们的

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接着，他们强令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并强令领导人“跪下”接受批判，并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政治部的人很快撤离会场，并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又把文化部的方泽浦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有人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南京军区后勤部一部分人，召开批判大会。

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

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

赵玉祥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

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

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许世友当时在北京开会，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一、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

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二、许世友下令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有 30 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

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

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许世友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判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 181 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1967 年 2 月 9 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陈荣安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

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 60 军 181 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

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

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王六生主任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

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

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南京军区天天抓人。

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了。

新闻科李少白副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副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了！

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等等统统都被抓起来了。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 8 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

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园、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

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

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

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

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

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

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

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

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

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赵玉祥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 60 集团军 181 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 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被关押的人，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被关押的人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 181 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

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 916 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

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按“官方统计”，总共逮捕的有 505 人。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 181 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 700 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后勤部在大礼堂后召开批斗大会，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参加，“专职人员”，高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赵玉祥、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被押解到南京军

区后勤运输部批斗。

田从洵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

于国城任营职，指控他是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赵玉祥任营职，指控他骄傲自满。

周乃馨任连职，指控不详。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

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

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许世友开始释放被他抓捕的军内造反派艾汉美等人。

艾汉美释放后，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他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一九六七年四月，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其中赵玉祥、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

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人。这批人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艾汉美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军区政治部在他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他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陈时秋、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到浙江义乌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负责文教卫系统。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三、南京军区受压的干部要求平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号，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叫张春桥去接他。

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毛主席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并同意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

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

许世友对别人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

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人经过多方联络，取得二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通知南京军区政治部下放浙江的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人：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 40—50 人。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

高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

王元仁（干部部科长）

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

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艾汉美。

一九六七年八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赵玉祥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赵拒绝了这个任命，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赵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急电”。

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

并列出了抽调的 40 人名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后来，这四个人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在杭州召开了南京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

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

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旬，浙江的南京军区干部“批资总部”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人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人、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人，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朱顺潭（嘉兴野战医院医护人员），揭发控诉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通知朱顺潭到这里谈话。

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

“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

“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两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晌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没有多久，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

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

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赵玉祥透露：

“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

“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

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

“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

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

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

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赵玉祥等平反小组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副书记谭友夫。

走访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

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等地，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晚上，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艾汉美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 200 多干部的代

表，赵玉祥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刘锦平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 340 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 20 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 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 916 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刘锦平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汇报进行到凌晨 2 时 15 分。

会后，“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

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联合成立的“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在南京AB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

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么？”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 27 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

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 74 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

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由军区政委杜平，副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许世友一直在大别山上，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这时，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

南京军区后勤部 9 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 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 86 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

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林副司令说：“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

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鲍先志中将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

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
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
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

南京军区总医院 8 个小护士，都不满 18 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参加了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 21 名代表作

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至午夜 12 时 50 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不承认告状团 21 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代表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代表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下旬，周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晚，周恩来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

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 8 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

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

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十一名代表”有两人：艾汉美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

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 21 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 人也在主席台就座。

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会议自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6 日历时 14 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

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发南京军区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打击迫害造反派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 22 人，开除 8 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

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 [68] 18 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

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

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 error 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 error 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 error 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 error 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康老：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 error，这些 error，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 error，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 error，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 error，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 error，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江青：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的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总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

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四、许世友擅自决定批判“倒许乱军”分子

一九六八年二月某日，南京军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

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讲话，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不报告中央，竟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风潮。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

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

由许世友训话，他说：“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

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在“积代会”上，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

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一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初期，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他强调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但是，杜平的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舟嵎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营级参谋朱雷等一大批舟嵎要塞区领导干部，被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家也被抄了，在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经历了残酷斗争。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

艾汉美被定为“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他连砍了“三斧头”：

一天晚上，正当艾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艾感到莫名其妙，简直“祸从天降”。艾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他“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艾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艾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艾拳打脚踢，把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艾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他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艾汉美等人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

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他们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白水桥营房，“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嵎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

“舟嵎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嵎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等人。

在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营区内，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 200 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查外调。

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他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听许司令的”。

这个学习班初期，许世友亲自到学习班讲话：“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出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有一次，他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一天晚饭后，谈某邀艾汉美在附近散步“转一转”。他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艾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艾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就“转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我艾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一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艾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查材料”。这样答非所问。

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发言人，正是昨晚同艾“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说：“昨天晚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艾展开了大批判。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说：“艾汉美昨晚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

一九六八年五月，陈荣安一九六七年二月写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作为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白水桥学习班，被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

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

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

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

重来之后，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

吴俊红小鬼出身，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一再说“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

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

一九六八年某月，“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 20 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又命令 20 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

一九六八年六月，赵玉祥成为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了 120 天（6、7、

8、9 四个月)，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走到那里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赵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批判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学习班党支部给赵戴上 7 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李树和统一规定：“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是陈时秋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小组会上逼陈交代是攻击毛主席。

当时，陈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由于天天逼迫交代，逼得陈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

其实，学习班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陈，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陈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

（到北京学习班后，高岳言告诉陈“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

一九六八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等 12 人又被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间，白水桥学习班由宣传部召开对艾汉美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 50—60 人。

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艾作检查两天，对艾批判一天。

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告诉艾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

艾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

对艾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艾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赵玉祥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

一九六九年元月，赵玉祥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

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赵谈话，冯对赵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

五、中央决定南京军区的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学习班到达北京后，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

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许世友对他们二人说：“这次

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王蕴瑞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学习班。

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

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

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学习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

学习班的领导班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各部门的学习小组，分别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学习班全体成员对候选人投票选举。最后，由得票最多的七人，组成新的学习班领导小组。

这七人的名字是：

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成员 李广中（文化部科长）

成员 纪国城（政治部军事法院法官）

成员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干事）

成员 郭群生（青年部干事）

成员 井洪寿（组织部干事）

新选举出来的七人领导小组，有部长、副部长、科长，又有一般干部；有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也有持“保守派”观点的人，还有持“中立”观点的人。七人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赵树湘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是许世友要打击的部长一级的代表人物。纪国城和艾汉美则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

5月18日，游览长城。

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十三日、四月三日，在北京学习班上，舟嵎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先后三次在舟嵎要塞区 700 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

舟嵎班办公室主任整李朝龙一再动员朱雷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他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朱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嵎班 700 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朱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

（以后，朱雷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八个月的支左工作，就成了朱的罪状）

一九六九年四月，赵玉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上班，并且派他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

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

“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

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 4 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说。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

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 1—567 页，时间：1967 年 6 月 5 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

“啊那有那么多？”赵玉祥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 500 字计算，那就是 25 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 45 天，平均每天写 5600 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 5 天，却被逼写出了 25 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北京学习班召开了一次交心大会，团结大会。

这次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预先安排，由各部门的代表介绍本部门前一阶段总结经验，促进团结的心得、体会。

会议开始不久，有一些同志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主动上台，自由发言，各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现大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高涨，会场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领导小组因势利导、“顺水推舟”，

使会议迅速掀起了群策群力地“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高潮。

艾汉美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带头上台“讲团结”的一员。他向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发出誓言：

“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同志间的分歧，裂痕甩到太平洋去！”

“从今以后，我们要与群众中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他在台上的表态和誓言，当场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陈时秋，施关彬等坐在台下的同志们当即站起来振臂高呼：

“我们要与过去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此时，坐在台下的另一位同志王某，也是宣传部的。在白水桥学习班，他是学习小组的头头，是批斗艾的积极分子。他在艾发言之际，“唰”的一下站立起来，高声急呼：“听了艾汉美同志的发言，我很受感动，在白水桥的时候，我批判他言词过激，调子过高，他不计较这些，我现在也表个态，今后再不要在群众中分这一派那一派，不要群众斗群众”。

艾与王某在会上的表态，当场又带动其他同志、接二连三纷纷表示“团结一致向前进”的愿望和决心。原来计划这个会开半天，结果开了一整天。

最后，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同志总结时，非常高兴地说：“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好！确确实实地开成了一个交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是近几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动人场面。”

廖副司令员也非常满意地说：“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好！体现了团结的新局面！”

中央联络员老王说“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成功！说明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水平不一般”。

有一些同志说：“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在北京开的确实好！到了南京，那就又不一样喽！”

六、许世友借整顿机关大批赶走批评过他的干部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到南京，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

许世友说：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许世友在南京部队体育馆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谈“整顿机关”的问题。

他说，最近毛主席签发了一份关于军队干部复员的文件，军区机关要精简，给大家打个招呼。

毛主席签发的这份中央文件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全国将 41 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

一九六九年六、七月，赵玉祥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看望赵玉祥。

郭政委对赵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

赵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1969 年国庆节前夕赵玉祥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赵在家休养。

一九六九年八月起，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

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 7 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产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

以上转业。

许世友违背党的政策，把一批又一批地把营以上的干部复员回乡了。（当然，复员干部本身就有问题）

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

一九六九年八月某日，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陈时秋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

此时，陈的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陈谈话，说他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他提供情况。陈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

根据以上情况，陈时秋补作为复员处理。

陈时秋是建国前参军的干部，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 6000 元复员费卖断了。他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他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 47 元（原工资 96 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第三批走的是孙皓月科长。他是中校，是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老资格科长，当然不属于“复员”对象，但许世友又以“精简机关人员”为名，与“复员”对象一起“滚蛋”。孙科长被流放到安徽皖南深山里的一个县人武部去了。李少白付科长稍晚一些时候，也被赶到安徽的县人武部去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陈荣安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陈作复员处理。1969 年 10 月初，陈复员到浙江湖州，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前后，组织上正式宣布艾汉美“复员”的决定，是军区政治部复员干部中离开较晚的一批人员。

一九六九年十月，组织上找赵玉祥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赵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赵谈话，敦促他到生产建设兵团去，赵仍然拒不服从。

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曾对赵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也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赵玉祥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

赵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

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

赵同意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赵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艾汉美一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毅然决然离开军区家属大院，把家搬到南京远郊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他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两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走。

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

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赵玉祥（参军 20 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 100 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 36 元（在军队月工资为 108 元）。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 5500 元的复员费卖掉了”。

七、许世友借清查“五·一六”大批逮捕干部群众

一九七〇年四月起，南京军区开展清查“5.16”运动，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历时三年多，比六七年二、三月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抓捕、大镇压。

1971 年，许世友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功：已经挖出“5.16”分子 1190 人，还有嫌疑对象 2000 人。

被许世友委任为“前线总指挥”的吴大胜上报数字是：隔离审查一万多人，江苏全省清查“5.16”分子二、三万人。

当许世友调走后，江苏省委的正式调查结果：三年多清查，江苏省共有十三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死亡两千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据江苏省委调查，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 84 人之多，仅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 11 人。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

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〇年四月，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李仲麟，被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娃娃桥监狱一个单人牢房里。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门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基本痊愈后，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

李仲麟出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

一九七〇年七、八月间，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陈荣安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陈荣安的“5.16”假材料，以及陈荣安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

陈荣安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朱雷被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朱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朱申辩。

1970年10月5日。普陀守备区党委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朱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X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朱一家回山东老家。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朱和妻子张志敏与押送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

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 6 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

顾永年缓解了押送措施，让朱的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朱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

朱雷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朱雷又上访北京状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

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逮捕入狱。

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深夜，赵玉祥在家中被当地派出所秘密逮捕，直接投入南京市娃娃桥监狱。

1970 年 12 月 5 日晚 11 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赵玉祥家，对赵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赵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拿起一件棉大衣，向妻子郭泽俭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 年 11 月 1 日，被无罪释放。

赵玉祥到了派出所，军代表向赵宣布了逮捕令，要赵在逮捕证上签字，被赵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赵反手戴上铐子，把赵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赵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赵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

狱警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军代表指导员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

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

赵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

看守们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赵填写，又被赵拒绝了。赵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赵：“你叫什么名字？”赵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赵说：“我家住在红花地 24 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赵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赵，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赵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赵“进去”！

一九七〇年底，朱雷到军委总政上访，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

朱雷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嵎要塞区。

一九七一年初，清查“5.16”开始后，许世友决定短兵相接，亲自审问史景班。

这天，由李树和陪同，许世友与史景班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史景班！你跟‘5.16’组织是什么关系？”许世友开门见山、单刀直通要害。

史景班毫无思想准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搞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许司令这话的意思”。

许世友的火爆脾气，一听史景班这吱吱唔唔的答话，很不耐烦了。

“你别装算！‘5.16’是什么货色，你不清楚吗？军区政治部那些跳得高的家伙，不是‘5.16’吗？你跟他们没有联系？现在我不讲明，让你自己坦白交代，早交代早主动。”

许世友这番话，史景班听明白了，回答说：“我与军区政治部造反的那些人，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们中间有没有‘5.16’，我不知道。”

接着，许世友问道：“批资总部的头头，上北京告状的那些人，他们参加‘5.16’的活动，你能不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上前两步，直逼史景班跟前，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史景班！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已经供出了你的‘5.16’罪行，现在给你坦白机会，你还嘴硬，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我与‘5.16’毫无关系。”史景班坚定自信，理直气壮地同许世友顶了几句。

许世友怒火冲天，怒不可遏，“啪”地一声！狠狠地朝史景班的脸上，抽了一耳光！史景班脸部被打得通红，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但他没有惊慌，没有失态，仍然平稳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

（一九七四年，史景班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被中央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
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

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

对这些问题，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

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帐。于是，他们就合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他两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屈服？那晓得，张瑛同志回答是：“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区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

南京军区的那两位军官，只好“扫兴而归”，葛化党委书记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张琦及党委成员吴官正等的一致支持，没有按照许世友的指意去办。在这之后，南京又给葛化寄来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的“艾汉美‘5.16’材料”。葛化领导仍然坚持不办学习班，听候南京的审查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艾的计划也只能“暂停”了。

艾汉美免遭“隔离审查”的劫难。但当年同一起“反许”的几个人，如：南京的赵玉祥，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等，由于处于许世友的权力控制下，一个个在劫难逃。

一九七一年五月，朱雷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

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朱的一举一动。

1971 年 5 月 5 日夜，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 5 名战士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8 时，将朱雷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

深夜 11 点 30 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的吴掌林对朱进行毒打，并责问：“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

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朱雷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朱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朱的绑架，借给朱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朱。朱妻一到桃花岛就与朱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 35° 高温下，依然把朱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

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 24 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指使四名战士，对朱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朱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朱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朱的胸口要枪毙朱！

宋干、栾经诚等人，还用饿饭手段摧残他们。有时一天只给他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

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的第二天，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

回来。

一九七一年六月，普陀守备区正式认定朱雷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反革命”。

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朱一家三口拆散，把朱雷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逼朱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轮翻对朱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朱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鳞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

“九·一三”以后，又诬陷朱雷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

朱雷的六十多岁的老娘得知朱的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朱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对朱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朱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朱的老母回到了山东老家后，对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朱雷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在押送途中对一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朱雷乘车北上申诉冤屈，讨回公道。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嵎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在舟嵎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朱的一家人的罪行。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干事卢淑琴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

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

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

一九七二年十月下旬，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说陈时秋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

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

不久，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

但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嵎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

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一九七三年三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 出来！”。看守把赵玉祥带到提审室。

主审台上已坐定了 5 位解放军。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你教育你。关了你这些日子，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

赵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 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

问：“你狡辩！关了 you 29 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赵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赵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

赵答：“可以”

第二天赵就把材料交了上去。

过了几天这 5 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一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赵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当天晚上七、八点钟，赵玉祥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常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赵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赵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看守对赵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看守突然呼叫赵玉祥的犯号：“3002 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

又进了提审室，6 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赵坐下。

主审对赵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

赵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1975 年 1 月 18 日，中共南京市委给赵玉祥平反了，平反通知书如下：

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并按每月 36 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赵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赵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

八、许世友离开南京，遗留问题不了了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许世友离开南京。

一九七四年五月中旬，南京军区复员到湖北的艾汉美、湖南的洪期钩，南京的赵玉祥，浙江的陈时秋、高丕忠、陈永安等从各地汇集南京军区政治部，提出我们的冤假错案谁来了断？

政治部派了两个干事对付他们。

他们提出：“军区清查我们的‘5.16’问题，已有好几年啦，总该有个结果吧！”

“究竟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我们是‘5.16’呢？”

“军区不是早就要对我们隔离审查，现在我们送上门来，要抓要杀请便吧！”

那两个小干事“无可奉告”，只能是“向上汇报”。

“磨”了几天，终究给了一个“巧妙”的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艾汉美的‘5.16’问题予以排除，有关‘5.16’的材料由各单位自行销毁”。

洪期钩等也得到同样口径的答复。

一九七四年，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浙江省革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陈时秋为其中之一，陈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陈被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朱雷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他一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朱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

谭启龙书记于 5 月 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嵎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朱雷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

后，他讲：“你记得没错”。朱雷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 13 号楼，210 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朱雷问题处理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

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

这个“部门意见”，首先，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

一九七五年四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陈荣安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陈荣安在“5.16”假案前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浙江省委调陈时秋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

中央 [75] 16 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

“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派来一位“省红

暴”派的农民张来根。

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

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对陈时秋执行隔离审查，

关押在浙江展览馆三楼讲解员休息室，多次拉到宣传部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

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陈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陈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陈交代攻击华主席。陈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

谢兰生为头儿的专案组，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铁瑛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指使舟嵎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朱雷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嵎要塞 65 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朱雷进行非法拘留，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朱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

在狱中，公安局对朱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

朱雷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违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并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

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经浙江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陈时秋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陈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陈的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以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不让家属探视。“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

陈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陈的家，拿走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一片“红色恐怖”。

专案组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陈时秋的“十大罪状”：

(1) “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去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

(2) “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师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师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

(3) “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表态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

来吧。

一九七七年某月某日，陈时秋被提审了一整天，要陈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陈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

把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

一九七七年，在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把陈荣安的申诉活动（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陈荣安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他平反假案），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对陈荣安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杭州市公安局向朱雷发出“释放证明”，明确告诉他：拘留他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过铁瑛书记。

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在狱中绝食抗争，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在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朱雷保证，在朱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

失。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也向朱雷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一封信，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朱雷出狱后，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又去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铁瑛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他再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

朱雷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的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事实是：陈时秋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张永生建议他们向党中央申诉。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事实是：1974年11月在北京，陈时秋和高丕忠去看望周建人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陈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嵎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事实是：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

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嵎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多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给铁瑛写信反映情况朱雷的情况。

后来，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事实是：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省宣政[1979]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浙江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79]11号，《免于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陈

时秋被匆匆释放。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郑汝培送我陈时秋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

林场有陈家的亲戚，知道陈时秋的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陈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陈如亲人。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陈时秋《劳动、思想小结》（摘要）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 77 年 6 月 10 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 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于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于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 72 年 10 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 72 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 72 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 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

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宣传部周永祥到林场对陈时秋说：“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

陈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

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

陈时秋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浙江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 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 号《免于起诉决定书》。”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他们平反落实政策。

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

他们公然向朱雷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 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 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

宣传部领导周群对陈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某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陈时秋宣布定性结论：“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

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旬，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陈时秋谈工作问题，要陈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

陈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

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陈时秋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

校领导和同事们待陈时秋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年多，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照片上了光荣榜。

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

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 1981 年 11 月 19 日以公群(81)12 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

公安局对朱雷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 1977 年 3 月 23 日被我局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 1979 年 9 月 29 日释放”。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

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 318》文件。舟嵎要塞区《(1988)党

字第 35 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 年 1 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陈时秋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 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

陈时秋在杭电返聘一年到 1994 年 10 月正式离休。

二 00 五年六月十日，陈时秋向浙江省委宣传部申诉，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 号文件的结论。

贰、本节简论

所谓“南京军区镇压军内倒许乱军分子”的问题，实际上许世友镇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南京军区一些给他和军区其他人贴过大字报的人的问题。

受打击者之一的艾汉美，在他的《石头城的风雷》一书中，最后说了这样一些话，这里介绍给大家：

“南京军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许世友一次又一次地压制和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这是一场激烈地短兵相接，反复多次地生死大搏斗。

许世友从始至终，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压反革命”、“反击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在许世友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天下，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就是他许世友的天下，他就是“许家天下”的“皇帝老子”，唯我独尊，至高无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始至终总是把那些给他写过大字报的人，反对过他的人当作“坏人捣乱”，当作“右派翻天”，当作“反革命暴乱”。肆意动用部队、动用真枪真刀，采取专政手段，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大批大批的抓人，成千上万的抓人。凡是能够用上的种种罪名，统统套在那些人头上，施行“坐牢”、“判刑”、“劳改”、“开除”、“清洗、滚蛋”、“扫地出门”，株连家庭亲友，制造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在南京军区历史上，造成空前规模的大劫难、大灾难，致使整个南京军区不计其数的干部、群众蒙受深重的冤屈、痛

苦和伤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许世友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加上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项头衔，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他疯狂推行“多中心论”，公然标榜“以我为中心”，以“拥许”、“反许”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凡是拥护许世友的人，就是革命派，就是大左派；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大坏蛋。

在当年的“许家天下”，许世友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许世友的话，就是“王法”，就是“圣旨”。他一再扬言：谁要造他的反，他就把谁抓起来，就专谁的政。我们新闻科的摄影记者陈时秋同志，是一位十三岁起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红小鬼。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为许世友的随身摄影记者。陈时秋以其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和欣赏。陈时秋偏胖，许世友喜欢称他“胖子”。那几年，陈时秋成了许世友走到哪、带到哪，形影不离的随员。文化大革命中，陈时秋出于爱护领导的良好愿望，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希望许司令保持优良作风的大字报。李树和把这张大字报汇报给许世友，他勃然大怒，不问长短，不分青红皂白，冲口而出：“胖子造我的反，我就专他的政”。许世友“金口”一开，陈时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5.16’分子”，被开除党籍，先在南京的白水桥被“行政看管”五十多天，后又在浙江蹲大牢三年多。

南京军区文革期间，不只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遭到许世友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是一样在劫难逃。某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许世友仅凭着道听途说，无证无据的“揭发”，亲自出马，多次审问逼供，硬要这位少将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该少将坚强不屈、拒不就范。许世友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大骂一声：“给我滚！滚！”就是这么一个“滚”字，使这位少将回到原单位，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人向许世友反映：“这位老红军，从小参加革命，久经考验，一向忠于党，忠于人民，怎么可能是‘5.16分子’呢”？许世友一听，马上改口说：“那好吧！不是就不是”。由于许世友“开恩”，这位少将的命运才算出现了转机。请看：许世友的话多“神”！他一字可以送“死”，一字可以送“生”，他岂不是成了当今的“皇上”吗？

当年，面对许世友的横行霸道，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尽管深受其害，饱受苦难，但我们没有吓倒，没有畏惧，没有屈服，而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凭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在南京贴许世友的大字报，在抗州造许世友的反，到北京告许世友的状。明知征途有风险，迎着风险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与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作坚决斗争。为保护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为履行党章、宪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为伸张正义、维护真理而斗争。

我们这些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无名小卒，在许世友的强权势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用许世友的话来说：是一群只需他“一脚就能踢死”的“乌龟王八蛋”，哪能经得起他的“少林武功”、“用脚一踢”呢？但是，我们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挚拥护和鼎力相助。我亲身经历就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我每当危难关头，或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总有许许多多地好心人，和我心连心，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六八年，在白水桥“围剿批资总部”的学习班里，我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之际，与我素不相识的范传典同志，本来是“奉命”负责“监视”我的动向，他却反而“倒向”我这一边，冒着“投敌”的风险，变成我的“内线”，充当我的“秘密情报员”，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

六九年，当我被复员“扫地出门”，四处安置无门，又被逼着我们全家下农村，面临奔波流浪之时，幸好军区政治部的卞庸中秘书长、文化部的王浩科长、还有我爱人所在工厂的周厂长等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同事；就是靠他们对受压群众的同情与仗义、对许世友蓄意整人害人的不满和愤慨，及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给我“救命信”，帮我闯过难关，使我全家顺利走向新生活。

我复员到武汉之后，又被许世友诬陷为“5.16”反革命，再次面临“铁窗”之灾。又是幸亏我所在的厂方领导张瑛等同志，这些同志对我在南京的情况并不清楚，然而他们靠着共产党员的正气和良知，识破了南京军区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毅然顶住南京军区的“命令”，才使得我免遭一难。

事实充分说明，普天下的人民大众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我们对许世友

的抗争，是顺民意、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我们赢得人心，“得道多助”。因而我们的抗争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地群体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我们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使我们经受了痛苦与磨难的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灾难，使我们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很多；也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敢。这是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是一笔世代受益的精神财富。当年，许世友一再狂叫：“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他要“统统杀光！”他恨不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但是，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妄想、诬陷、咒骂，恰恰相反，我们这些人有“上帝”保佑，“苍天”照应，我们并没有被整倒、整死，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二〇〇一年以来，我数次去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南京的孙海云、赵树湘、季遐年、纪国城、冯玉章、尤亮、夏继诚、孙宅巍、陈培光；上海的赵玉祥、张炳奎、周自求、方源瑾、吴燕京；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施关彬等等。除了因病过逝的洪期钧、陈荣安等同志外，我们相见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四十年后，我们亲切相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比兴奋。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变老了，头发变白了，多数人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有些已经八十以上的高龄啦！我们从大难中闯过来，还能活到今天，而且活的很硬朗，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胜利！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许世友所宣判的那种“坏蛋”、“反革命”。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2011年9月18日初稿

第四章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壹、本节概述

一、省革联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全家学语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接管公安厅

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 13 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 10 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公安局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

晚上 12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 13 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

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

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

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

下午 4 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人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 18 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是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八一中学、七中、铁路中学、省实验中学、华师附中、十三中、十六中、十七中和二十七中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广州再度活跃起来。

华师附中出现了两张令人瞩目的大字报，一张题为《我们就是好汉》，另一张题为《满天怨恨满天仇》。两张大字报，都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并说：“我们红五类就是靠对联翻身的。对联就是好得很！好得很！我们是顶天立地的自来红，我们里里外外都红透了，崽子们，叫你们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大字报又呼吁：“革干、革军子弟，狗崽子骑在你们头上，你还沉默吗？抬起头干下去，干下去才有活路，砍头如同风吹帽，坐牢算得什么！”

（二）一些人冲击军区，军区取缔一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一部分军队院校学员、文艺团体的成员，串连回来后，要烧一烧军区，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一部分地方造反派参加了冲击军区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一）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十七时三十分

命令（二）

一、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二、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该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二十时三十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发表大联合筹委会宣言，参加发起的单位有 14 个总部，所属成员约 27 万

由地总、红总发起的筹委会，从 1 月底就开始酝酿串连了。

2 月 4 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发出“实现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倡议书。

2 月 21 日晚上，一致通过吸收‘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参加了‘省联总筹委会’。”

省联总核心小组成员包括：王云亭（红旗工人）、吴开东（三司）、李广（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何登培（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陈保伟（红旗农民

总司令部)、黄秀琨(地总)、冯春青(市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部)、赵树安(一司)、张礼敬(省政法革命委员会)。由地总的黄秀琨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办公地点在原省委大院内。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

总理: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主义兵四处出动

一口气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二十四中井冈山、二十中井冈山、三十八中井冈山、五中东方红、华师附中红旗、广雅八三一、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组织总部。大街小巷,到处响彻了他们的怒叫声。在广州兵团门口,他们贴了一副大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滚蛋,老子反动儿好汉”,横批是:“狗仔子翻天”。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省革联垮台
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
凌晨 4 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一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 130 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 243 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七名常委中，有五人被捕。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飞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主义兵继续搞抄砸

下午，华南实验学校、铁中、广雅、三中、七中、四十四中、五中、十七中、六中、二十一中、十五中、十三中、四十中、二中、八中、红一中、外语学校、人民一中、华师附中的主义兵，在八一中学开会，决定先砸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然后再砸五中、六中的对立组织。他们宣布了行动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私人财物；讲文斗不讲武斗；作好打的准备。

他们对前来劝阻的空军联络员说：“我们决心都下了，谁说也不能改变。我们已开过会了，人都通知啦。珠影太坏了，我们抄这一次珠影就垮台了，以后就不抄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主义兵砸珠影东方红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几名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成员向驻公安局军代表低头认错

军代表提出四点意见：一、你们自己来，我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二、你们在公安局所作所为，要很好交代，要承认错误；三、在公安局拿走的东西要送回；

四、军管小组随叫随到，不得违抗。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至六日，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三日，警司主持召开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

有 150 个群众组织、市、局、公司及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由警司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领导干部组成。这是领导全市生产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警司在中山纪念堂、省人委礼堂、省科学馆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万人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警司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

清晨 4 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 15 个人，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八百多人，包围了珠影东方红。

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 6 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散会后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 7 时 30 分结束。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均奉命整风。

广州一司、三司、华农东方红公社、外语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中山医东

方红公社、华工红旗公社、中医学院三〇一大队、广东艺专学校东方红公社、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广医红旗、广工红卫兵、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先后开始整风。而尚未有动作的单位有暨大、华师、行政教育学院和美院。

整风的办法，通常是先用一周或半月时间，进行动员和学习文件，然后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检查整改步骤，进行整风。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广医红旗召开全体队员会议，

负责人公开检讨，承认反对军区的错误，“向毛主席请罪”。解放军联络员在会上发言。广医红旗无话可说，随即派代表到军区请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警司宣布取缔中大红旗等一批造反派组织

中大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

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

与此同时，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

解放军开进了省委大院。

广医思想兵、继红军等组织，派出汽车上街报喜；

华师一月风暴等组织，也派宣传车上街广播；

中医三〇一打电话给军区祝贺说：“解放军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由解放军接管广东。”

广州三司表示：“通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东方红派代表到电台检讨，暴动纵队也派人到工程兵司令部承认错误。

3月1日，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开始整风，大鸣大放。据军区文教组反映，“各群众组织对东方红公社意见很多，主要是：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没有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群众要求解散监督小组，彻底闹革命。

对中南林东方红参与了冲击电台、冲击工程兵司令部等活动，要求公开向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广州一司开除广医红旗，并在社会上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陆续撤离广州。

至3月12日之前，全部撤离广州的有：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驻穗联络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北京工业大学驻穗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之声”、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赴穗点火队、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等33个组织。

撤离后尚留部分人员的有：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穗联络站，留下八人办报纸；清华井冈山驻穗联络站，留下四人办报纸；哈军工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警司留下16人交代问题；武汉三司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这类组织共12个。

还没有撤离广州的，只剩下一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共三十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广州一司、三司中学部等单位发起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五千人参加的大会，表示支持解放军

会上有 12 个群众组织代表发言，七中红旗等四个单位代表则“向毛主席请罪”，并声明过去他们所攻击军队的传单、漫画、标语等，一律作废。

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

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学开展军训，准备开学。

在省体育场召开有几万师生员工参加的“中学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市十二中、二十二中、三十四中、省实验学校、铁中等校的学生，纷纷回校报到，参加军训。

当时中学开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教员与学生关系紧张，被斗过的教师不愿在原学校工作，要求调动；武斗过教师的学生怕报复，不敢回校；二、组织涣散，领导班子难以形成，夺权组织管不了事，学生生活散漫，不接受管理，下厂学生，工厂不放；三、思想兵与主义兵矛盾很深，势不两立；四、公物损坏严重，桌椅缺损相当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地总也发出“当务之急——开门整风”的号召

总部以及所属分区、分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整掉队伍内不自觉地滋长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根据）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总部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纯洁组织”。

地总是和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之一。他们兴高采烈地把 3 月称作“东风浩荡的 3 月，成绩辉煌的 3 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广州一司发表公开表明，对他们曾在电台围攻军管小组，表示认错

声明称：“对于受我们攻击过的电台新领导黄业同志及其他解放军同志，我们诚恳地表示向他们赔礼道歉。其外，驻电台小组在撤离电台时，为了掩饰我们一司参加电台‘一.二二’夺权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印发的《一.二二电台的夺权是革命行动》的传单，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此，也一并声明作废。”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

黄永胜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第 1 号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公安厅二办开始对省直站下属 102 个群众组织（其中重点组织 27 个）展开了全面调查。

同时结合调查的有暨大东方红、暨大工人大队、中南林学院教工红卫队、省中医学院反迫害大队、中南科学院等，

另抽调七八名干部负责调查中大红旗、八.三一等组织。

初步调查结论，把 27 个重点组织分了类，定为一类的（条件是“三冲一抢”，搞白色恐怖，干坏事多的）群众组织十个，1670 人；定为二类的（参加“三冲一抢”，但问题一般）群众组织八个，1693 人；定为三类的（有一般活动，但问题不大）群众组织九个，801 人。所谓“三冲一抢”，即冲公安局、冲军区、冲电台，抢文件。

对一类组织的头头，无论是幕后指挥的、为首的，还是转入地下的，都要严厉打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省市军管会开始打击“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

和“非法组织”

凌晨 1 时，省公安厅和警司派人到广州远洋分公司，逮捕了“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的三名负责人。

清晨 5 时，警司在市公安局配合下，突袭“老红军总部”，拘捕了九名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二办领导小组开会（专政小组寇庆延、马芳、鲁少泉等人参加）研究“省直站”的性质问题

初步认为“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属于反动性质。但又觉得定为反动组织太重，故初步定为非法组织。最后省直站被划为“内定反动组织”，不戴帽子，列其罪责，宣布取缔。

所属基层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进行取缔，或不定性质勒令解散的有 17 个。其中省政协分站、粤剧院在险峰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文化局东方红、广州海关革命造反总部、粤剧院东方红、省话剧团东方红、省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分站、南海水产研究所 1110 兵团、省化工机械进出口公司革命造反大队、省政协东风战斗兵团等被划为反动组织；中南公路工程处修配厂联合兵团被划为右派夺权单位，勒令解散。除此之外，还有六七个被列为重点组织，“接近反动组织边缘”。人员方面被列为打击的重点对象 15 名，其中准备拘留五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州日报》在翌日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祝贺，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了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广州市军管会就“镇反”问题召开会议

江贤玉在会上说，“目前，对敌人打击不力，反革命气焰未打下去，与广州军区首长要求还差得很远。”

他提出目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解决干警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使广大干警认识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对敌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内外反革命复辟，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第二，“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为了适应当前要求，打破关门主

义办案，各级领导要深入第一线，不要在机关批案，要在那里抓人，就在那里批判斗争。”第三，“加强宣传工作，教育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第四，“下次战役行动主要是解决打击敌人不力的问题。”

初定 4 月 2 日为第二战役的日期。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大武装部以召集红旗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为名，在驻中大部队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拘捕九名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

（三）中央处理广东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

广东是边防地区，还有两个口，香港、澳门可以自由出入，它们随时可以钻进来，要依靠群众和军管建立革命秩序，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不是推迟，更不是代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

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组织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指华工红旗）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三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斗争到底。

华工“八·一八”：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

三司：介绍，略。

总理：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总理：广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

广医“红旗”：举出与其对立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曾经夺权，但搞错了或有严重错误通过军管解决（象广东等）

广东本来想通过军管促进一下，但开了五天会，看来还会有所反复。

“1·22 夺权”大方向还是对的，这夺权的方法当时的作法是极严重的错误，逐步地脱离群众，又上了旧省委的当，我看还是上了当，没有经验，急于夺权。

广东“1·22”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省革联”夺权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不论参加或支持省革联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请罪问题，而应自我批评。

军管前发生了从冲后勤部开始到冲击军区。这分两部分，一部分从军队院校内部开始，由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一起，串联一开始，就都到北京等外地串联，所以一下命令回来后，带着一些余波，要烧一烧军区，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到二月七，八号就开始冲击军区，这件事本身是错误的。冲军区，地方同志也没进去嘛，除了个别的刚才说的以外。

公安局夺权是另外一个情况，先夺权的是外来的进去的，而且还有北京政法公社参加的，军管后证明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做得是不大好的。这个不责备他，

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安全送走了嘛。

广播电台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广播学院的几个同学揭露出来的，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摸了以后证明这两个少数人的造反派不仅成份不纯，主要是作风，他的做法、方向都错了。北京来的广播学院同学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站在它对立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群众把他们揭开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形。

在这里军区也跟着犯了一些错误。军区宣读了军委两项命令（指二月八号军委来的命令）后，虽然逮捕多了一点，但比起其他地方也不严重，共逮 450 人（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组织头子，其中最多的是八一战斗兵团）已放 169 人，在押 281 人，广州以外，逮捕 238 人（已放），交易会开始前，于三月廿二日至三月廿八号一周拘捕了 508 人（数目大），放了 280 多人，过后还准备放一些，总共三次捕了 1196 人。

四大事件：“1·22”夺权，“1·25”反夺权（公安局）、冲击广播电台、二月七号、八号冲击军区，军区并没有把这个做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

《颠倒》一文文章发表很早，是发表在《新北大》广州版上（二月廿八号登的），在小报上也没什么，当时没有闹出事来。错误在于南方日报三月十二号转登（有删改），三月十四号广州日报转载并加了按语。文章没有做阶级分析，没有一分为二，如“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也没肯定。压了革命造反派。

“一声春雷”（指铁路局夺权经验），一声而已，不那么响亮。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不那么够。但还是想搞三结合，方向还是对的，革命造反派有一部分没有吸收进来，无产阶级权威的确也不够，但可以改进嘛！

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还没有成熟，但也不必解散。工人组织分成“工联”（即誓师保卫毛主席工人大联合造反总部）、地总、红总、红旗工人赤卫队、广东红旗……、广州工人……、六种组织，应该承认“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赤卫队分裂成两派，但总的还是革命造反派；广州工人……、广东红旗……，看起来应该也是革命造反派。“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

支左工作没有完全做好。但支左对广州军区则是七大任务之一（七大任务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作战、备战）。军区支左是有成绩的。但也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如左派摸得不那么准，但可以改嘛！

既然“1·22 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省革联”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可以改，就不要去责备“省革联”。认为支持“省革联”就是错的、就是反革命，反对“省革联”就是革命，这都不行。这还不在于“四大”事件里的，还在以外。这种标准都是错的，不应该成立，应该取消。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以上，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

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

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常委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也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贯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够，没能正确地识别和坚定地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军区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晚，情况不了解；介入时，正值一些革命左派在省革联夺权，市公安局反夺权，冲击军区和军管广播台中犯了错误的时候，正值粉碎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的时候，当时我们对造反派的错误看得过重，许多同志带着对某些革命造反派极不好的印象，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对待省革联夺权和冲击军区等“四大事件”的态度去鉴别左中右，而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例如对于一时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左派，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不适当地取缔，解散了一些群众组织，错误地抓了一些人。反之，对于某些偏于保守的组织，则认为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没有参与“四大事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压抑革命左派的作用。正如一些小将批评的：“你们对一些革命左派的支持，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对一些有保守倾向的组织，态度暧昧，脚踏两只船”。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

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康生对广州军区黄永胜等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和解放军报记者

24 日晨，总理单独接见了广州“红旗工人”、中南局联络总部和解放军报

记者各一人，谈话主要精神：

1、广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为核心首先联合起来。可以分三步联合：(1)基层战斗队的联合。(2)中层分部的联合。(3)各总部的联合。

2、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 2—3 万人，双方签订的四项协议是靠不住的。

3、总理指出：“春雷”（是铁路系统的老保）已走向反面。

4、造反派不要介入他们（公安局）的问题，要依靠他们自己解决。“125”的确是个大杂烩，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但不要推到保守派那儿去，要团结大多数帮助教育他们。

5、总理指出先孤立分化瓦解“地总”、“春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交红旗”、“红旗工人赤卫队”可以争取。

（来源：1967 年 8 月 25 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 132 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州赴京代表团时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周恩来就广州各派执行“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发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广州“贫联”去参加了“地总”举行的工革会，介入了武斗，打伤打死 180 多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州“贫联”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要有独立性，要有独立位置，成立独立组织。

打电话回去通知广州，1. 不要开大会，“九·五命令”发表后，发生武斗是不对的，刚刚发生武斗，你们又开大会，这样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2. 把留在军区警卫营大院内的贫下中农劝回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黄永胜在接见广东各地代表时的讲话
具体解决几个问题：

1. 要为韶关“八一工农兵总部”平反。谁出面的就由谁出面平反。如果军区出面的，那就由军区出面为你们平反。

2. 要派部队（带枪）到四会，保护你们（造反派）回广宁。要把被关的人都放出来。

3. 海南那个冒充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要调查。你们把他抓起来，送交军分区，我们责令他们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广州“旗派”五名代表时的讲话
极左思潮不光你们那里有，全国普遍都有，你们也受了一些影响。

主席视察后，集中地提出了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是主席回来时在列车上找三派谈话，什么道理都讲了，最后送给他们四个字。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工交红旗”和“地总”代表的讲话

军区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两件事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改了就行了，比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

要破旧立新，把不合理的制度要打碎，要革命化。

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广铁分局两派关于维护广铁分局军管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双方代表的谈话

总理高兴地说，广州三个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了，十万人大会不要延期了吧？

革筹小组还是五个人，陈郁同志不是主要的嘛，孔石泉同志在下面搞得还不错。革筹小组就这样定了，你们要是相信中央的话，就是那五个人，我们发扬民主够多的了，先成立起来。

现在两广要赶快赶上来，两广都在前线，你们广东我本来已向主席报告，月底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又拖了十天。

主席最近指示，“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承认错误，认真改正，得到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站出来，重新站到革命队伍的行列里。”

今年夺权斗争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月份激进的一部分组织先夺了权，但很多没有夺好，没有联合另一派来夺权，一派夺了权，把另派排除在外，这是搞不成的，从一月份到现在，取得了经验，就是推动联合。现在存在的问题，两派中有一派是偏于保守的，当然，这个联合中有的可能激进些，有的可能保守些，都是群众组织嘛！不和群众组织联合和谁去联合呢？以左派为核心是肯定的，但不能以哪一派为核心，自封左派是可笑的，是愚蠢的，一定要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考验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执行自己签定的协议。以前保守现在不保守了，前进了就好了。左派不能吃老本，老同志几十年的老本，几下子就吃光了，你们才一年半的功劳，不是一下子就吃光了吗？

主席最近批示：什么叫牛鬼蛇神呢？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二、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三、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提到形势问题，最近有这么个估计，总会有人这样想，认为形势不那么好；但多数人认为形势还是大好的。说这种话的人，是急躁的、有派性的。这些人想那一派还在，对立派还在，这是从派性出发。悲观论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你们回去批判悲观论。虽然有走资派，特务，美、蒋间谍，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存在，但是大局已定。所以，对形势不能说不好。不能

听走资派，特务分子，坏人的挑拨。

把你们过去的什么“广老谭”、“一小撮”等错误口号全部肃清。我们反对象“揪军内一小撮”这类极“左”口号，但不能让右的思潮复活，即不能让老保翻天。再有不能让坏人复活，兴风作浪。

是什么原因解放不了一大批干部呢？最重要的是有走资派象赵紫阳等挑拨，和其他因素。赵紫阳是叛徒喽！第二种原因是地方主义，这次认识多一些，以×××为首的一小撮，把中央批的人，排在外边，南下的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好的。不能拿缺点来否定主流。地方主义不应该翻案。批判地方主义，就是批陶铸的，不然陶铸怎么能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怎么能叫他两面派呢！受地方主义影响就容易造成小资产阶级派性。第三个原因是坏分子，例如郭风、黄士民挑拨你们。他们不把你们向好的方向引导，而故意挑拨，这不能怪群众，怪他们。

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们！欢迎你们！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地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不这样作，就不能搞斗批改，就不能搞大批判。

康生同志：文件上讲，我五月份到广州，去是去了，那是接受中央专门任务秘密去的，没有什么重要指示，因为当时不能公开，只是最后在夜间，临上飞机前才与黄永胜同志谈了谈，因为是专门任务去的。文件这样写，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向同志们抱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十二条协议

贰、本节简论

一、造反派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

这次夺权有很大的缺点：省委把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其他革命左派，也没有结合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一部分军队院校学员、文艺团体的成员，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一部分地方造反派也参加了冲击军区的活动。

二、军区混淆敌我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的某些领导人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直接下了两道命令，支持广州军区抓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由地总、红总发起的偏向保守大联合筹委会发表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提出广东立即实行军管，毛泽东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至三月初，主义兵四处出动，一口气砸了几十个造反派的总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省革联垮台，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省市军管会开始打击“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和“非法组织”。

三、周恩来指出军区错误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指出：军区也跟着犯了一些错误：逮捕多了一点，但比起其他地方也不严重，共逮 450 人（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组织头子，其中最多的是八一战斗兵团）已放 169 人，在押 281 人。广州以外，逮捕 238 人（已放），交易会开始前，于三月廿二号至三月廿八号一周拘捕了 508 人（数目大），放了

280 多人，过后还准备放一些，总共三次捕了 1196 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黄永胜与造反派代表座谈，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四、各群众组织之间争地位，直至武斗，长时间联合不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这说明，广东问题也深受“二月逆流”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的讲话中，周恩来总理称：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这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一节 吉林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长春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红革会，二总部、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群众组织共同组成第二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这几个革命群众组织，退出了二总部。并串连工人组织共同组成长春公社。

省军区认为这是搞“分裂主义”；组成的长春公社是“分裂主义的产物”，不予承认。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长春公社在吉林省军区门前集会游行，表示对军队支左工作有意见。

吉林省军区认为这是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派人上街参加辩论，印发传单，以及在广播和接待来访中，散布“长春公社大方向错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长春市发生“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林军区派部队参加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散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吉林省军区对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负责人和肇事人，

一时许多群众被迫打着白旗请罪，长春公社也被压垮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下旬，吉林省军区在组织地、工、光整风时，提出“三个彻底”（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使“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组织解体了。三结合筹备工作也没有吸收他们参加。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先后恢复了组织。省军区认为他们还在继续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我们支持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红革会，二总部，这是对的，但是压制了另一个革命造反派——地、工、光、野和他们串连革命工人组织等成立的长春公社，这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又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给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感到十分痛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中央认为，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同志和“红革会”、“二总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贰、本节简论

关于吉林省的文化大革命资料，收集到的很少。

吉林省军区虽然也受到“二月逆流”的影响，压垮了“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三个造反组织，但比起其他一些地区来说，所犯的错误就轻微多了。

经过几个月，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检讨起来确实是：“痛痛快快”的，

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二节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福州部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有人冲击大会、妄图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
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先楚两天两夜。

“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
福州军区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有人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

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

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召开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
康生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福州召开声讨大会，
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
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
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州军区作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三、中央着手处理福建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廖海光：对 1·26 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 1·26 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 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 12 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 1·26 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 300 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 74 人，福建中医学院 400 多人抓了 11 个，扣留了 14 个，3 月 26 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当时 2·11 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

们 2·11 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 12 个同学，2.13—2.22 开三次全县大会，到 3 月 5 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 12 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 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 1·26 好得很！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 1·26 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 1·26 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 28 日来的，26 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柯纠耿：1·26 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 1·26 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 8·29 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 1·26 事件及 2·7 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题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

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

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总理：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解释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韩先楚：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

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总理：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贰、本节简论

福建军区的问题也是受“二月逆流”的影响。

1，“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行为过激。

2，福州军区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认友为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方向错误。

3，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火上加油。

4，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立即响应。

5，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慌忙出错。

6，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军区召开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一错再错。

7，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也是一错再错。

8，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六点意见：（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5）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6）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开始扭转。

9，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正式结论。

10，韩先楚承认主要错误有三点：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态度较（许世友）好。

2011年9月2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重点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你们不要把矛头不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也不指向反党集团。比如现在斗争的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而不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同彭真一样。有反党罪行。斗争的矛头一定要对准。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深刻地批判主要人物。肃清他们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说成是什么“圣人”，一直用反动的孔子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孔子思想成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解放以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在革命阵营里的代理人，为了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千方百计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维护和散布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他们还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毒害劳动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公开地鼓吹“尊孔复古”，便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大罪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能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孔子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立身之地。不把它们连根拔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建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铲除反动透顶的孔子思想，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一批红卫兵小将们当了大破孔子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密切配合下，在这方面已经敢

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倒斗垮斗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一、狂热地歌颂、美化孔老二，恶毒地污蔑、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大肆宣扬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

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辱骂党的领导。

四、妄图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打扮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五、鼓吹人与人“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妄图模糊阶级界限，抹煞阶级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按：早在 1950 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 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二) 一九六七年三月重点批判刘少奇包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

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在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

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不会分散力量、妨碍夺权斗争呢？不会！恰恰相反，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把他的罪行充分暴露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开火，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更好地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彻底批判了这一小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划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界限，划清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执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的界限，从而促使更多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大推动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的文章：《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社论：《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我军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等项光荣任务中，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所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的反扑，打垮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掌好权，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把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那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减弱和分散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判的火力。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干部问题是当前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绝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正中目标；这个批判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毫不相干”，而是关系大得很。

有人大嚷什么“革命派是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又有人在胡说什么“我们执行了压制群众的反动路线，你们执行了打击干部的反动路线；我们保护了一小撮，你们打击了一大片，大家彼此彼此”。对于这些谬论，必须痛加驳斥！

有少数人，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作任何阶级分析，不区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笼统地区分什么“群众”和“当权派”，认为“凡是当权派拥护的自己就要反对”，“干部起来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去积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极端错误的。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大批判的谈话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写的二段话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

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修养》一书的关键是什么呢？

它的关键，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关键是背

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

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杆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

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支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

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指出：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社论《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不能！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公开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指出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和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

周总理说：我给你们供给一个材料，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运动是湖南省委去领导的，主席全部历史都清楚。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跟我说过几次，（对姚文元）跟你也谈过几次吧。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从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去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是安源，还有上海，还有广东，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广东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

我听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为有什么名堂，总是程咬金那么三斧头，当时还不会想到八月以后的情况。批判刘的根子要从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判刘的话，二十年代很多可批。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

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②④。“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②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几段批语
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八）一九六七年九月重点是发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同这条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所谓桃园“蹲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是假四清，真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黑经验，由王××在北京、天津吹嘘放毒之后，接着，他们又到许多省市兜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发全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一、把社会主义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形势看得漆黑一

团，也把桃园大队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在给王××的信中硬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基本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王××也说：“桃园这个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二、大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疯狂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作社会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还说：“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只有扎根串连，他们不怕了，才能讲话。”

整个的“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她一人独断。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

三、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相对抗，胡说什么：“四清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王××到桃园也说：“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她还说：“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连结在一起。”她污蔑桃园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在动员干部交代问题时也说：“你是忠于四清，还是忠于四不清？”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论问题大小、性质如何，都用“四不清”大棒加以打击。

四、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

她胡说：“干部的四不清是普遍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问题，不可相信。”“不论干部好坏先斗他几次再说。”

桃园大队原有大小队干部四十七人（包括“四清”前下台的在内），在“四清”中挨批斗的共四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王××在大整干部的同时，又借“群众洗澡”之名，大整社员。全大队有一百五十五人作了检查，搞得桃园大队人人自危。

五、保护一小撮，扶植坏人当政

六、大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七、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美化桃园，对抗大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腐朽不堪的“文采”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

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时而显得极右，时而装作极“左”。批判陶铸，批判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对于当前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部署。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目前，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从极“左”的方面和从右的方面来搅乱斗争大方向的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迫使一小撮阶级敌

人，经常改变他们的做法。目前，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面目出现，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妄图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的、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一切革命同志，务必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的文章《炮轰陶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在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前进》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群众，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要懂得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斗争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地加强敌情观念，牢牢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斩断敌人的黑手。对于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搞阴谋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须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群众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最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敌人从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常常从这里寻找弱点，冲破缺口。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

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制造武斗的祸首》
中国赫鲁晓夫导演的臭名昭著的桃园“蹲点”，是采用法西斯手段，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丑恶典型。

在这方面，他们搞了许多野蛮的做法。“燕飞”（又称“喷气式”），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王××一手创造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对大批判的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

（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

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护和发展富农经济，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疯狂地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广大贫农、下中农。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中央狠抓革命大批判，推动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中就指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要把矛

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指向反党集团彭、陆、罗、杨；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肃清他们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大批判的谈话指出：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指出：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指出：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指出：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和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但是，一些“造反派”热衷于打派仗，一些保守派热衷于玩逍遥，真正能够老老实实坐下来搞革命大批判的革命派，不是很多。

2011年9月2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四节 抓叛徒

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布署

（一）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

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

调查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打倒叛徒哲学》

（二）中央关于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三）中央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

二、有关抓叛徒的几个具体案件

（一）关于把瞿秋白定为叛徒问题

1，周恩来关于瞿秋白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周恩来在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2，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关瞿秋白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中央第十二号文件中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3，瞿秋白：《多余的话》

4，陆定一访谈

大约在 1990 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5，一九八〇年中央纪委的复查报告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一、被捕经过

二、受审情况

三、拒绝劝降

四、从容就义

五、关于《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这本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有些人说成是瞿秋白同志“叛变”的主要根据。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

由此可见，把《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同志叛变投敌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的谈话

毛泽东说：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六) 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 1969 年 11 月 30 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三) 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四) 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示一些干部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将回复中共西北局的电报送毛泽东批发时附的信

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信电报

2，红卫兵的调查揭发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

“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

“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

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一九六七年四月某日，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

杨献珍说：“我有罪，我有罪！”这样就交待了他和高仰云都是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罪行，并交待了与他一起写“反共启事”的有安子文、薄一波、廖鲁言等九人。

一月二十九日，他（王鹤寿）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打急电：“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同志：请即从电台用急电（或通过中央组织部李楚离同志）帮助转告北京市委冯基平、陕西省刘文蔚、华东局魏文伯、赵明新、天津南大高仰云、吉林赵林等，如果红卫兵他们问我和殷鉴在监狱中的名字时，务请绝对不要告诉他们。”

3，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肯定薄一波等人出狱属于自首叛变性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康生讲话

江青说：“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讲话

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李富春接见国家计委同志谈斗争薄一波

自首叛变 61 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

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贩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

洞里爬了出来。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4，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

“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华国锋的批示

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一、“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同志。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反共启事”是敌人事先拟好的，内容相同。

四、六十一人出狱的情况

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对于他们出反省院前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交代。据查阅的档案材料证明，赵林等十位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自传中，都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和经中央、北方局指示履行程序出狱的情况。赵林等十六位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填写干部履历时，多数同志填：党允许、北方局决定登“反共启事”出狱或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履行程序登报出狱；有的同志填北方局营救出狱。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陕西省委写材料证明同狱人刘聚奎这段历史时，说：“刘一九三六年出狱，系根据党的（北方局）命令，履行出狱程序出来的。所谓出狱程序，即是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个手印，这件事是经党组织（北方局并中央）指示办理。”这些情况说明，薄一波同志等对他们的出狱情况已作过交代，不存在“长期欺瞒组织”，“串通一气，互相包庇”的问题。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七、调查的结论的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的处理意见是：

(一) 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四) 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的通知

（六）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泽东的一次讲话

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郅中复的父亲郅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

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七二年七月，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把瞿秋白定为叛徒问题

关于瞿秋白的被捕问题，虽经复查，但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说：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写的什么内容？

二、《多余的话》究竟是不是瞿秋白写的？六十年代初李克农告诉陆定一有真迹存在（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陆定一为什么不经请示就一口回绝：“不买了”？后来他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后也说：“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可是为什么复查还是认为：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

三、争论的焦点还是在对《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本身怎么定性。其实，瞿秋白自己在文章中已经说了：“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何时把陶铸定为叛徒？又何时正式为他平反？这些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材料。

（三）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关于彭真是否叛徒、特务的问题，既然中央没有审批，就说明证据不足。在中央没有审批的情况下，康生就急急忙忙向群众宣布，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四）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关于六十一人案件问题，争论之点在于：

一、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关键在于：“敌人规定的手续”是怎样的一种手续？刘少奇向中央究竟是怎么说的？据张闻天交待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可是，实际上，“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

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这样一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二、从北方局后来执行的情况看，刘少奇等北方局的领导人对这个所谓的“简单手续”的涵义和内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对出狱的人履行这样的手续并不表示异议。而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成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所以，这件事刘少奇负有主要责任。

张闻天虽然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这个决定，但他并不清楚所谓“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而且他也没有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张闻天负有重要责任。

事后，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此，他们都只知道这批人是：“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出狱的”，并不知道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复查报告反复强调：毛泽东早就知道这件事，想以此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查这件事，是毛泽东出尔反尔，用这件事来整人。但事实说明，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有红卫兵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然相信原来的说法：这些人只是履行了一个“简单手续”出狱的，中央知道这件事，说服红卫兵不要纠缠这件事了。可是，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红卫兵查出了当时这六十一个人分九批在报纸上刊登的《反共启事》，以及一些人在审查中交待的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中央在掌握了这些新情况后，才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作出批示。

出狱的六十一个人虽然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北方局的决定，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他们个人不应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同狱中，有的人如刘格平等就采取了拒绝执行的态度。这就说明，个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复查报告说：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人。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

三、复查报告说：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一个革命组织难道为了保存力量就能够命令它的成员在敌人面前叛变吗？一个革命者难道能够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就向敌人自首叛变吗？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每个人自己就不可以按照保存力量的原则向敌人自首叛变呢？这样一来，还有什么革命气节可言呢？

第二，如果说这一批人是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叛变的，可是其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叛变的，而只认为他们是个人的行动，既然如此，其他被捕入狱的人就有可能效法这些人的行动，引起雪崩一般的叛变潮。

第三，这批按照组织指示叛变出狱的人，由于他们共同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就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特别是与刘少奇之间的依附关系。这就成为刘少奇搞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人员基础。

第四，这个案件提供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革命组织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吸取。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以及个人的行为，是完全有理由的和必要的。

2011 年 9 月 22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七、九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通知陈再道
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
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

”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说：要给山西六十九军和陈永贵等打招呼，他要闹就让他去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指指林彪，说：你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毛主席环视到会的军队干部说：你们都是将军。不能只看军令，还要看政治水平。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按：原山西省军区司令，很早起来造反的）也不行，要罢刘格平等人的官，不要中央罢，让红卫兵去罢。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他说：张达志、冼恒汉从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

毛泽东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主张，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毛泽东说，南京居民反对武斗，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派，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

“内蒙训练的军队都回去了吗？”毛主席说：军队还是听话。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除外发 72 元（按：那时战士每月发 6 元津贴），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

提到湖南，毛主席对当时控制湖南的人不让“湘江风雪”、“六号门”等群众组织成员当民兵想不通，他问：这是为什么？并说：要四十七军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等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两派都来人，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

谈到干部，毛主席说，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嘛！武汉的“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

毛主席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说外国人不拥护我，中国人也有不拥护我的，北京就有人不拥护我。毛泽东同意公开点罗瑞卿的名，并说：彭（德怀）罗（瑞

卿)黄(克诚)谭(政)都要拿出来斗，要见报。

对于我们党的状况，毛主席一方面指出：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另一方面也不同意重新建党，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种程度。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并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陈再道书生气，要帮忙，并准备在武汉游泳。

毛主席讲了以后，与会者大多数不赞成他去武汉，周恩来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矛盾斗争激烈，考虑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

林彪也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主席自信地说。

“武汉比较乱。”不知谁冒了一句。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总理说：“成武，你出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周总理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会后，周总理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专门研究毛主席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周总理反复交代：“武汉东湖很乱，上述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会议结束后，当晚周恩来先飞往武汉，为毛主席安排住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 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

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

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

二、毛泽东周恩来着手解决武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召集会议

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周恩来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

此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

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

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

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

12 时，武胜路电车公司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

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

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谢富治、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

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

谢富治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

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
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

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

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

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到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王力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 立即停止武斗；2. 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 3506 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

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尽管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周恩来 15、16 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

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早些。

“三新”、“二司”（湖北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

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

“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毛泽东对军队在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不满意的。他明确主张政府和当权者应当少抓甚至不抓，由群众自己去抓。他批评武汉军区的司令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这下动脑筋了。但又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并不把干部的所谓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他多次声称：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毛泽东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

说完，他又重复一句：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对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毛主席想得很周到，他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

训怎么样？毛主席问到会的人。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毛主席并不相信这种回答：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毛主席问汇报情况的同志。

“他们提出，全线反击。”汇报组的人回答。

“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心情，毛泽东还是指出：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搞一个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毛主席对群众提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刘培善”的口号，提出：“不要太看重。”“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毛泽东的话里，是有倾向性的。

毛主席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县的干部，也要找一些谈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周恩来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

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

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 18 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三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

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 17 日看过。

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会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毛主席一见到陈再道、钟汉华就和他们热烈握手，亲切地招呼他们坐在主席的身旁，然后问道：你们怎么样？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随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 1 月 21 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毛主席看看坐在身

旁的军区领导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比，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1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造反派又得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了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约束了，下了命令了，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谢富治汇报他们到了武汉那些革命群众组织总部时，毛泽东当即批评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王力说。

毛主席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嘛，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回答。

毛主席一听乐呵呵地说：“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陈再道听了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之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主席不同意陈再道提出的处理方法，并指示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指陈、钟）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快快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急了。”

毛主席给陈司令出了个好点子：“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在“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陈再道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讲话。”

王力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于这种情况甚是明白，指出“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中央文革的人）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讲到这里，毛主席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思想工作。

会上有人谈到“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似乎有点冷淡，也有点慌的样子。

毛主席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的，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不能说他们都是坏的吧。”

毛主席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说到“百万雄师”内部很大部分是工人时，

毛主席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招待所（指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进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市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立即插了一句：“后来推迟三个月。”

毛泽东说：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招待所）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解放”、“油炸”、“全线出击”哟等等，不能全信。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

会上谈到湖北省的干部，说江毅影响好、赵修问题多、徐道齐可以、杨锐可以时，

毛主席明确指示：“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有什么罪？王任重申辩说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些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去批。”

这时，有人插话：主席说的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自己承认了，谁给你平反呢？王任重死抱着自己不承认。

毛主席说：“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同陶铸关系很密切，有些人等打

起仗来就可以看出怎么样了。”

会上有人说到新华工学生都是戒备森严、全副武装时，毛主席感到有点惊奇，说：新华工还这么森严？江西为什么基干民兵可以有枪，为什么红卫兵不可以有枪。毛主席有点为红卫兵鸣不平，他说，如果刘培善有气魄，就把民兵的枪支收回来发给红卫兵。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和湖南。

会议最后又集中到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

毛泽东指示：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下边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军队就是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毛主席明确指出，抓朱鸿霞不得人心。叶冬初有点水平，受一点压迫好。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人受一点压迫好，蒋介石压迫我们，就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一绝食就紧张起来，才不要呢！到现在绝食没有一个死的。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绝食的，我说因为社会主义不完全，还要革命，要部分推翻，不要全部推翻。1月21日军队支左介入，以后搞了八条，对这个八条如获至宝。军队抓人多了，以后呢？搞了十条，正是夺权介入，八条的时候军队锻炼一下好！

毛主席当着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的面，指着谢富治、王力等人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一个‘百万雄师’，军队机关，怕他们造反。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他们内部也可能发生内战。”谢、王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总理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总理在讲话时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主席还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

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世界上的事情，这几个月来，一年来什么怪事都有了。章伯森、刘瑞林有些什么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不这样，那我就瞎了眼。

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对军区领导同志说：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空军、兵种都冲过。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这个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结束。杨成武当时认为开得很好。毛主席把解决武汉问题，从方针、原则到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参加会议的人，对毛主席这样安排，都表示赞同。

陈再道、钟汉华尽管对要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看到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因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散会后，他们向毛泽东敬礼告别时，毛主席还很客气地送他们到走廊。

在走廊上，遇到几位招待所的服务员，毛主席立刻把他们招呼过来，笑着向他们说：“认得陈司令吗？再不要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主席并要他们和陈再道一一握手。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

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

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在就被泄露了

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

（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

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

蔡政委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

传达会议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上扬。

牛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

面对干部的不满，蔡、牛要求“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周忠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

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19 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 8 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及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武汉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杨成武找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传达了 18 日晚的会议精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

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

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

谢讲了二个多小时，

王讲了三个多小时，

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

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

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

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一些人冲击武昌东湖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

下午四时左右，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

独立师的战士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

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

19 时，又有 8201 的 49 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 120 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22 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23 时半，8201 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 200 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 日 24 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 日晚上，（师）370 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 12 点带领 3 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

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 8201 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

“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19 日晚上 10 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

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

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

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 100 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 8199 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 3 点左右，8199 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往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 8201 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 8201 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凌晨，8201、8199 军人及百万雄师人员殴打、架走王力

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 27 辆卡车和 8 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

这时，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7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

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

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 8 车 8201、8199 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 8201 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

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

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

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楼 3 楼 46 房，

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 的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

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 8199 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在这个过程中，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 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 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 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 8201 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 29 师政委，调 87 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

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

当晚，叶明、韩东山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原来，7月20日下午，叶明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命令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张昭剑对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四、独立师的一些人及“百万雄师”搞武装示威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使唤

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以 8201 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 8201 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章迪杰承认：“‘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

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20 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 20 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从凌晨 2 时开始对武钢围攻

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 33 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 100 多人。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 200 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得知消息，从东湖宾馆转移到专列上

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下面的情节摘自师东兵的记实文学，仅供读者参考：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

电话不知谁打的，毛泽东“啪”地一下摔下了电话，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宾馆。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难道陈再道今天想效仿当年张、杨二将军，让我当蒋介石第二不成？

门被“咣”地一声推开，毛泽东一惊，警卫员小高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事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小高，你别怕，跟着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荣的。”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毛泽东爱怜地抚摩着小高的头，给他正了正军帽，泪水盈眶地说：“傻孩子，到哪里躲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小高突然想起总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刘丰的电话，把话筒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军装，满头大汗。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已经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问道。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恨恨地吸了一口烟，“我撤离延安的时候还给胡宗南留了点纪念品。现在，我离开武汉，这里的东西都不要了，统统留给陈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说完，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连拖鞋也未换。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走下楼梯，来到院内，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战士们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毛泽东冲汪东兴感激地点点头，向后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看，原来因没换鞋子，只穿着一双拖鞋，被草丛中的荆棘扎着了。杨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自己穿了毛泽东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三人继续向前急走。

“站住！什么人？”树丛里传来一声压低声音地猛喝，并拉了两下枪栓。毛泽东、杨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杨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护住了毛泽东。光束在杨成武的脸上照了一阵，只听“哎呀”一声，电筒光熄灭了，几个军人从树丛里跑了过来。

“对不起，原来是杨代总长！我们是武空警卫连的，在这里负责警戒。今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奉命来保卫这里。”一个军官向杨成武举手敬礼、报告。

杨成武和小高松了一口气。杨成武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任务，同小高搀扶着低着头的毛泽东匆匆地离开了。

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翻过了一个斜坡，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周围寂静无人。小高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然被拧开了。毛泽东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是真正地走后门呀！看来前门走不通走后门也是个好办法嘛！”

穿过小门，三人来到了东湖西岸。老远就看见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双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那人迎了过来，小高上前轻声问道：“是刘司令吗？”

“是我。”刘丰迟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几下眼睛，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代总长杨成武时，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带着哭腔说：“毛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员的班房，尝尝滋味，可你们不让我尝。算了，让别人尝去吧！”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没有引起任何笑声。

“主席，上车吧！”刘丰说。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刘丰的话，他双手叉腰，回过身去，久久地凝视着前方的东湖宾馆和他住过的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一言未发。半天，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说道：“陈再道真是一头蠢驴。他要是派一支兵马把守住后门，我还能逃得出来吗？看来，这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赶到了戒备森严的“专列”上。）

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 8341 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

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 17 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

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五、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

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飞赴武汉。

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 15 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百余 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

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

8201 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

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

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下午 3 点 54 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

飞行途中，吴法宪对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

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

40 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

这一情况由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 5 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 8341 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 8341 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到达山坡后，周恩来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

“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周恩来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36 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同意离开了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总不能让老人家在车上等着吧！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他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主席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亲自组织平息事端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以后，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

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

二十一日上午，叶明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具体位置。武汉军区只得向总理汇报，说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

这时，武汉空军的刘丰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立即赶到二十九师。对张昭剑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

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于是，29 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 15 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当晚，支左的空 15 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

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

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 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像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蔡炳臣稳定军心

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

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

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百万雄师”在 3506 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

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的权……”。

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

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 8201 为核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
(下午三时)

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二至三天。

(引自 1967. 7. 24 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 3 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

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

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 3 点多钟，周恩来等到达山坡机场。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为安全起见，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 7212 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 7 月 22 日凌晨 3 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 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凌晨 5 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山坡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 8199 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8 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

后来才知，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怎么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他对杨成武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的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说：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师参加？

毛泽东说：这类事情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说，如果能在内部解决武汉问题是最好的了。

毛泽东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会调动农民，占领三个学校。

他说，解决武汉问题，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说：“派兵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办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两万多“百万雄师”的人，要做好工作，让他们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

毛泽东说：“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呢。”

在谈到周恩来提出的武汉问题处理意见时，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因此毛泽东同意把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

武汉和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到了中午 12 点半，毛泽东又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他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以免受害。

毛泽东说，三方面一起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

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毛泽东又说，如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又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

杨成武离开梅岭一号，马上给周总理挂通了电话，并把毛主席上午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传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约 50 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 1500 辆，继续在全市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回北京

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

下午，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

北京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

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

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 12 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深夜，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

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 3 点钟，陈再道、钟汉华收到了以中央名义调他们进京“开会”的电报

此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续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

武汉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陈再道、钟汉华去机场时，游行队伍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 15 人。

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

三军“无革派”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

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 60 万人抵抗；组织 10 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8199 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

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

武汉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工总”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的。这组织号称四十万人，实际也有二十万人吧！被逮捕了五百多人，被迫解散。这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我们到武汉去，要为“工总”平反。

九·一三也是一个造反组织。

钢二司虽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由于是“工总”的观点，受到压制。这是一个学生组织，是一个造反派组织。

“百万雄师”有三大派力量：

(1) 独立师（番号××）带头。这次主要是独立师搞的。它以前是××部队，有×个纵队。

(2) 人民武装部。××个大厂子都有人民武装部，有枪杆子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九个头头，其中四个是人民武装部的。

(3) 公（公安局）检（检察官）法（法院）已被军管，但是，是独立师军管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百万雄师”。

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了许多谣言。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才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的。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要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几天，看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杨成武说：“他们不会反对你的。”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三个对。

他转而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

“不清楚。”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带着毛泽东的指示，飞回北京，向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也向陈再道传达了这三句最高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

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人把陈再道、钟汉华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陈再道、钟汉华的安全。总理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谢富治出面做做以后，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

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

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

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

徐向前的标语口号。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还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到京西宾馆，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会议还决定 7 月 25 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凌晨 5 时，“百万雄师”出动 38 辆卡车、3 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 25 日上午 11 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一支又一支的空 15 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 8201 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 8201 战士，痛哭失声。

（按命令于 8 月 1 日将防务移交 15 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有个方针要解决武汉问题，好人坏人都请来了，小将多，北京的革命派要紧跟中央作工作，这些天大规模游行，明天开大会，表明我们支持，这件事不能只看成谢富治、王力，特别是谢富治，

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矛头针对武汉一小撮，百万雄师一小撮、军内更是一小撮，不要面很大，要懂政策，明天下午五点要开一百万人的大会，学生、工人、农民、兵，中央首长出席，井冈山也讲话。在天安门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有一件事告诉同志们，坏人来了很多，再厉害也没关系，但不要抓。将来开了会，需要的话作面对面的斗争。需要的不打就不错，但要有组织的找几个学校，百万不要讲百匪。听说北京有，要集中起来，军队由陆空解决，中学、工人不要去，红代会组织一下。矛头对准陈再道、牛师长、蔡政委、王任重，将来凶手搞出来。军内已经集中了，大学红代会找些人把他们集中。将来还要请一批来，一切都要按中央文革指挥。我们这次出去带红卫兵，是主席当面给我讲了两次，但他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挂帅不行，一挂，就压垮。但要带徒弟。因为他们只有一年革命历史。再没有主席那样爱我们工人、学生、工代会。这回想当头，连自己厂都管不了，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只这一点慷慨，谁要来顶我，我明天就让。武汉这一次离不开大批判，离不开刘、邓、陶、彭真这个大批判。要搞到明天，促进大联合，大学毛著这个锐利的马列主义武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

武汉“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份人，他们要打倒谢副总理、绞死王力，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他们反对总理在政治上不利，但实际上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付主席。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那些人，还有武装部、独立师、军区机关、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我们相信武汉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受蒙蔽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了。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交给群众斗争”等等。王力他们回来了，我们隆重的在机场迎接。

六、北京及全国各地支持武汉革命派，声讨“七·二〇”事件的制造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给毛泽东、林

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参加天安门大会

下午 3 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

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 4 点多钟，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

周恩来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师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

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

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 8201 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 8201 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3 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

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〇”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

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拚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

周总理、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北京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 与“百万雄师”

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

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的谈话和决定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 15 军或 2 个师（指 44、45 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 15 军部队或 29 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820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 40 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

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 8201 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 4 个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

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

革命派

“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

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

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

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玩火者必自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红司新华工代表聂年生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钢二司代表杨道远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指示：

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 44 师、45 师、29 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 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上午 9 时，周恩来在钓鱼台 5 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

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的考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张贴武汉军区 1967. 07. 26 公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刘丰：《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

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

八月四日，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为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驻得太久了。

毛主席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

还有今年 2 月 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

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

毛主席说，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

他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

（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解放军各单位批斗陈再道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条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伟大教导。应当加强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支持军队的同志，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在处理军民关系中，也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不要不许革命。

“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军委各单位斗争陈再道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是他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

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

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

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

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在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四）好人斗好人。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

七、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朱鸿霞夏邦银等《永远忠于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武汉是反革命暴乱。

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

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

独立师（即 8201 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

“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

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 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

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武汉警备区的命令

为了解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

大群众”的伟大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持社会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现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警备区机构由七二五〇部队兼任。任命方铭同志兼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同志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张绪同志兼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同志兼任警备区副政治委员，并从八月十八日正式办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8201 部队干部揭发《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8201 部队干部揭发：《“七·二〇”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曾司令员：

1) 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〇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

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部署，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

十月八日晚上 7·30 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刘首长，警备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二十个组织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周恩来谢胡在武汉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康生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

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要作斗批改的模范，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同学都要回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你们要复课闹革命，也要结合大批判。

现在主要是在本单位斗批改，可以说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搞。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主席说，现在是大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七个省，包括青海。六、七、八月一下子就解决了八个省，有湖北、河南、四川、江西、浙江、内蒙、甘肃，这说明速度快了。过去一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但还有些反复，如黑龙江。

我们正在解决十一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在十月、十一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廿六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

还剩一个年头，明年六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丰接见湖北三司革联代表谈话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钢新之间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陈再道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玉华关于湖北形势问题的报告

北京“五·一六”是个反动组织，对武汉肯定有影响，武汉肯定有几个人，但不能夸大大。扩大化不行，要犯错误。运动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关于武汉红代会问题的电话指示

13日晨4:50，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并传达此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

‘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七·二〇”事件

1，一九六七年湖北“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

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但它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

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散。

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

陈再道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2，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提出的中央关于处理湖北文革问题的四点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说明中央对湖北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3，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思想始终没有转过弯来，表面检讨，实际放弃领导，消极对抗；独立师政委蔡某某、师长牛某某对抗中央指示，在官兵中煽风点火，实际上起到了幕后操纵的作用。

4，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中央代表团驻地及武汉军区大院，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实属叛逆行为。

5，中央对“武汉七二0”事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6，十月政变后中央批准湖北省委为“七二0”事件平反，是完全错误的。

2011年9月24日修改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 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 9 时。毛泽东在风光秀丽的武汉东湖召集周恩

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郑维山、杨成武开会，听取派往西南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汇报云、贵、川和武汉地区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 8 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林彪起草了一封信，写给毛泽东的。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中午，杨成武接到电话，说邱会作要来武汉，有重要情况。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了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封，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二、毛泽东到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 11 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杨成武接到了周总理从武汉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主席；武汉的事情对外报

道，要含蓄点，不点名。

最后，周恩来说，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不受伤害。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的批语。

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电如下，请酌定。”

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上午，杨成武又一次飞往上海。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问题。

3 日下午 5 时 45 分至 8 时 50 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毛主席听后，首先表示：“乱了就好，同意林彪同志的看法。”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审阅一个文件时，批示：“已阅，照办。”命令规定不许抢，不许发；已抢的限期归还。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上 10 点 25 分，毛泽东在会议室时，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杨成武等人谈话。

会议从 10 时 30 分开始，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10 分。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形势怎么样？请你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三、毛泽东到江西、浙江、湖南、湖北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上午 9 点 40 分，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着军装。

程世清首先汇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95 命令后十几天的时间，收到了群众交上来的枪达五万多枝，他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汇报说，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 8 月 10 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说，抚州发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中国有没有内战？有没有武斗？这就是内战，这就是武斗嘛！

程世清说，周总理说，抚州事件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说，对的，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又问，过去他们也是两派对立？是否过去的对立领导上批评了他们？这次要从教育入手，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已经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当他们汇报到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一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就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不同意向红卫兵和战士开枪。

毛泽东说，对这个政委要保，他听话嘛，看到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就听话了嘛！在紧急关头他就坚决不同意开枪，不同意打嘛！

“造反派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现在对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处理也要注意，不要坏对坏，他对我们坏，我们对他也坏。”

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席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照办。传达到群众以后，群众很快就变了，拥护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说，各省去凑出一个协议来吧。

他又问起一些他知道的干部，他说，黄志珍、白栋材怎么样？你们要多争取几个人嘛！他们有错误是确实的，能改就让他改……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明确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人不多但能量很大，与社会上的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做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

“过去我们有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好多个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嘛！”

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有的学校造反派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江西的同志汇报说野战军在江西威信高，旗帜鲜明，已有五百多人被右派打了。

毛泽东说，右派打你们，左派不打你们，这个阵线很清楚啦！

说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江西省一级还是要站出一些干部来，要消灭造反派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到部队去挑拨战士与干部的关系，说你们战士和干部不一

样，干部钱多，生活好等等，这是不能得逞的，很多人想当兵还难呢，军队是个学校，每月还有六块的津贴费。

他又说，军区搞“四大”不能搞得太苦了，要文明些，我是对那些不雅致的做法翻案的。把我们内战时期斗土豪劣绅的一套来用，是不对的，这是干部嘛！过去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十几年来从未曾要人武部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集训一次，现在你们先集训一下，中央也应该开集训班。

“内蒙独立营训练后很好，回去后就支左了。有些右派你们也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极少数，训练后可以转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包括左派。现在到处揪赵永夫、谭震林式的人物，哪有那么多呀！保守派，右派，他承认错误了，自己又回来了就加以保护。

最后他对江西的同志说，你们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现在的理抓在你手里，为什么你还这么凶？这样你就输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午 11 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 5 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 5 军和 20 军要互相学习；20 军向空 5 军学习，20 军为主嘛，空 5 军

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

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云：“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 20 军和空 5 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 5 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 62 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不

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说：“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

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了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

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 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 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 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 250 亿斤至 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 180 万担，去年是 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

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晚 6 时至 8 时，毛泽东在他的武汉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 9 月 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了。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班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分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 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地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 年我退居二线，1959 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 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 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 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 8 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恩来、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指示，要杨成武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我们今后的战斗任务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产。

充分发动群众，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深刻的改革，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除了对工人阶级作了重要指示外，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

当前，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我们

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来一个大破除，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把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便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统统改掉。这样，就会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反修、防修就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更好地批修，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狠斗“私”字。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破私立公，牢固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修正主义产生的条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大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大联合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学习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

青讲话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毛主席视察各地讲话的通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长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形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

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是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

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心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关于宣传工作的四点指示”

目前，全国各地正流传着许多谣言，这些谣言对我们的领袖的健康表示怀疑，非常明显，这是某些别有用心阶级敌人故意散播出来的，意图蒙蔽人民，动摇革命群众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信赖和支持的决心。为了使广大群众认清阶级敌人的面目，揭穿敌人的阴谋，兹作四点指示如下：

- (一) 毛主席身体健康，应积极宣传。
- (二) 坚决杜绝一切不负责任的谣言。
- (三) 最近传出去的关于毛主席不办公的消息是误会。
- (四) 禁止宣传或张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奋勇前进》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就要牢牢掌握“斗私，批修”这个纲，把它贯彻到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中，用它来统帅一切，带动一切，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就要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就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

就要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观点，发扬民主作风，反对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要平等待人，到群众中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就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做到统一指挥，协调动作，克服各自为政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完成本单位的革命、生产、教学和工作任务。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依靠本单位、本组织的群众，把混杂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清除出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革命干部，参加到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发挥他们的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是当前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关键。革命干部，一般来说，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较高的政策水平。只有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挑起担子，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才能建立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权力机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大任务是，让大批革命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不再坚持而又认真改正的革命干部，参加到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大胆地使用他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

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接见郑维山滕海清高锦明时的谈话摘要

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把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地学习一下。比如形势，主席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这是主席概括的，我们学习不够，这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形势好还是不好，远的不说，从五八年、五九年就就有两种看法。对人民公社、大跃进，一种认为大好，一种认为不好。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对，基本出发点是大跃进搞糟了。那时有个缺点错误，彭德怀利用这点向党进攻。三年困难时期，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把形势估计得黑暗得很。说要八年才能恢复，这个影响散布很广，毛主席到处视察后，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讲了三条：一形势、阶级和阶级矛盾，击退了单干风翻案风，那个猖狂得很，后来发表了公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首先在形势问题。主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社教时又有这个问题，刘少奇说只有王光美那一套行，其余的都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形势的看法也有许多不同，今后还会有，形势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去年五月主席对谢胡同志讲，今年二月同卡博同志讲，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失败，走资派胜利，一是我们胜利了，走资派失败了。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条？主席总是这样辩证的看问题，他是为了引起警惕，防止骄傲、麻痹大意。这是主席的一贯办法，主席总是把困难估计得足足的。他对卡博同志讲，你在中国再呆几个月吧，呆几个月就可以看出

眉目来了。当时我对眉目也很不理解，大概认为会有革委会成立起来，实际上主席说的眉目是大局。今年国庆谢胡来了，主席讲，看出眉目来了。第一是胜利，但也不排斥失败的可能。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主席是从战略上看的，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大局已定，现在就怕思想跟不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对“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的解释

看形势，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立场，就能看到主流，看到本质，否则你就只能看到支流，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是大好形势，主席思想深入人心。

乱得越透，解决得越快越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把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才好解决，反过来乱得不彻底，乱得不透，掩掩盖盖，反而解决不彻底。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了，群众也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

毛主席这个话是在九月份讲的。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七个省市（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现有八个单位在北京把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就是内蒙、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甘肃）。以上一共有十五个省市到年底再解决十个单位（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北、宁夏、天津、陕西、辽宁），这样就共达廿五个省市，全国剩下四个省、自治区（西藏、新疆、云南、吉林了）。整个部署到年底，都能看出来了。目前十个省市的代表也已到了北京。看来明年初春就初步解决问题了。×××首长说：到明年五月就解决问题了，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主席指示最近可以发表几篇教育革命方案。主席又对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最近提出了党的问题，吸收新党员的问题，可公开宣传，处理党员，

恢复党的生活，就不好公开宣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并作重要指示，

是实现中央关于“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伟大战略目标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这次巡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问题。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由于“二月逆流”的影响，全国不少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驻地野战军部队，在支左工作中发生了错误。特别是发生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一些左派组织认为，全国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提出在全国开展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有的甚至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通过视察，毛泽东说：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中央认为，根据当前的形势，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央关于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的布署。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问题。

进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各地的群众组织大体上都分为被军队支持的和被军队压制的两大派。这两大派往往是在初期共同批判省委走资派的错误路线，以后由于在某些问题如干部问题、斗争形式或策略问题上，立场不同，而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加之，在群众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少数头头中，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思潮，形成两派的激烈斗争，后来发展到一些省区的严重武斗。

通过视察，毛泽东提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一个工厂，形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关于干部问题。

当时，各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遇到的障碍，除了大联合的问题外，还有三结合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一种是认为领导干部都有问题，找不到一类干部。另一种是，只愿意结合支持自己这一派的领导干部，反对结合支持对立派的干部。

通过视察，毛泽东说：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

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

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次视察所作的指示，是在全国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严重进攻面前，担心文化大革命遭遇挫折，而采取的一项退却行动。致使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看法并不合乎客观实际。文化大革命也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可一味地盲目冒进。

2008年8月8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27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壹、本节概述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会上大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

会议作出的决议说：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他们的反周活动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

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

方面的动态情报，他们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抛撒传单时还动用汽车。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农口各局和各院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 516 红卫兵团散发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传单说：

“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另一个司令部”是什么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五·一六四名成员被群众抓捕

唐亦安、郭海燕等 4 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 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在 24 小时内把被抓的 4 人放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被抓的 4 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 4 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

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 5·16 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

（二）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 月 17 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两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

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王琪、黄金琪的谈话

如果象“五·一六”兵团恶意地采取这样的态度，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批判。批判少数坏头头和他的后台。对于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我们不要去指责。

“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精，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

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

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轰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

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中央首长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戚本禹同志：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后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一些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 8 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

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说：

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

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一六”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就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扭送秦化龙给北京卫戍区的信

〔秦化龙：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53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四）通过批判‘五·一六’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

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央通知中关于警惕极左的一段话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

防止坏人，提高警惕。九·一、九·五、九·一六至九·一七，总理、中央文革同志们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江青同志九·五的讲话，指出“五·一六”的危害性……为什么中央很重视它呢？因为这个组织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样一个支柱……对毛主席司令部，现在有一种来自极“左”的，或者来自右的。“五·一六”就是来自极“左”的，它是反革命组织，是秘密的，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接见毛里塔尼亚大使前后对外交部工作人员谈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

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来源：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然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新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根据以上精神，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彻底地把这伙反革命挖出来。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十月上旬在天桥、王府井、外交部驻地发现这类反革命传单，是油印的，刻写的，用的天津光林纸，通过邮局寄的，几个城市都寄了，都收到了，这部分复制品，不能再复制翻印，可以在群众中研究，到破案后再收回。这部分传单通过分析有以下的特点：一、对外事部门、统战部门、公检法部门、文教部门很熟悉，因为传单中有很多×话。二、会刻写钢板，刻写和寄出封面是同一个人写的。看来这个人有油印机。三、这个人懂古文，用了不少旧

词成语。四、这个人毛笔字很有功夫，看样子这个人练过柳体字，所以估计象混进党内的旧知识分子或“五一六”兵团的后台，但他比五一六分子还坏。五、这人对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对群众运动不满，对文化革命很不满，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人想为右派翻案，看来对反右是不满的。六、是自己用面粉和的浆糊。七、是用四月十三日和四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糊的信封。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讲话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

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驻外使馆代表的谈话

比如对“五·一六”的处理，北京就搞得比外地好，按主席思想，除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抓起来外，如张建旗，扣留起来，对群众要做工作，以便孤立少数。刘令凯这个人，我们保过他多少次，还是这样，他反我最早，而且是因为我保陈毅同志，这我很难理解。只要是善意的，贴大字报，提意见，甚至打倒都没有关系。是善意的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外红旗大队把他扭送公安局、是我命令把他放的，他倒反过来说是派人搞的。他到现在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多学校批他，我和文革小组同志给他解了围。我听他批判陈毅同志好几次，就在这里，不到天亮是不散的。我把他的意见转告了陈毅同志。

“五·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先念在财政部座谈会上谈五·一六

“五·一六”问题，出了个刘振玉，刘振玉并不是“五·一六”组织里的，是和陈大伦联起来了，通过操纵，出了点主意，这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甚至再出一个二个三个刘振玉，都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大联筹和使领馆等代表时的谈话

外事系统是有坏人破坏的，你们年轻，不要以为“非常委员会”反革命案件的线索破获了，就完事了。还要发动群，继续追下去。外交部总是有些嫌疑的。外事系统要擦亮眼睛，王焕德搞出来后，机要局就搞出几个人的小集团嘛！

“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轰总理，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

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

“五·一六”分子仅指“五·一六”的头头，不要把一般受蒙蔽的人都叫做“五·一六”分子，不要搞群众。“六·一六”也是几个头头坏，下面的群众总还是革命的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董枫同志谈“五·一六”等问题

〔董枫同志：周总理联络员。地点：北京商学院 85 兵团总部。〕

“五·一六”中央已经宣布是个反革命组织了，“五·一六”不仅是反总理一个人，总理是主席身边的，毛主席说的话，通过总理来贯彻，反总理不光是反总理，是反中央，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理很多讲话是毛主席讲的，但是总理不能说那句话是主席讲的，针对总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财贸口（5.16）直接对总理，实际不仅是总理一人，实际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反中央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

总理上边是毛主席，很多地方，单位总理都要管，外事口总理也要管，总理的担子是很重的。外事口总理为什么管？因为夺权夺出了漏子。

“五·一六”是坏组织，不仅北京有，外地也有活动，还散发，寄一些反革命传单。中央已经表态了，大家（指商学院）抓“五·一六”是对的，因为中央已经说话了，这是反动组织，要把它揭出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五·一六”也不是那么多，现在抓了多少人，都是群众扭送的，几个人么！张建旗、程镇华、郭海燕等七、八个头头。这些头头主要是学生，真正是“五·一六”的重要成员是大头头，小头头。外国几个参加活动的发现不多。最坏的还是在后头。我看坏头头不只是在后边，青年学生知道的事情少，好多材料都是干部提的，学生一看问题多了，敢“造反”么！“五·一六”人不多，问题更严重的是在后头。出谋划策，提供材料的幕后。

一个思潮的问题。极“左”思潮，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坏人就利用这些极“左”思潮，利用这些东西鼓动起来，前面是青年学生，没有青年学生可利用的，就自己出面干。当然学生也有坏的，中央已表态了还想干，中央已表态说“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了，有的还想干，有的送了卫

成区还坚持反动立场，当然这是极少数。

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坏人不多，最坏的是后台，不能把有这种反动思潮的人都当“五·一六”打，你们学校是根据地，的确历史比较悠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 5.16 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 5.16，哪里有那么多 5.16 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 5.16 的帽子。

（来源：1967 年 12 月 8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 63 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关于抓 5.16 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 5.16 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 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 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 5.16 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 5.16 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 5.16 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 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活批评是

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 5.16，5.16 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有人说：3.10 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 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 5.16？看是什么联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

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讲话

北京市抓“五·一六”比较健康。不要因为“五·一六”就老保翻天，反“五·一六”就是二月逆流的发源地。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

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

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

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

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

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

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

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

陈伟回答：“没有证据。”

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

（《王力回忆录》）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群众大会

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师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早上 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〇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

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文章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文章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中央会议

他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

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日，毛泽东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

余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文章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文章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文章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文章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文章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文章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师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师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出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

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说：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〇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烈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对煤炭部在京单位群众组织代表的指示

总理指出，现在有一种呼声，什么第三次大串联，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自由外流。点一点火还不够吗？又把自己的派别观点带下去，制造紧张局势，很不好。自由外出的，一律不算下矿人员。全国形势很好，不能乱搞。

煤炭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7年8月17日（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

《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

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了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 1959 年 8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红旗》杂志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一文

8 月 19 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 8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 9 月 17 日出版的第 14 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话

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摘要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

她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

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

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的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周总理：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三、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一）一些群众组织冲击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刘晓发表了“三月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发表了“打倒陈毅”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提出了“打倒陈（毅）、姬、乔”口号。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

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要大中小结合，

要彼此打个招呼。

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

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

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

周恩来：

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

周恩来：

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

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

（二）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姚登山同志交谈

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

传达后，群情激昂，高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

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

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

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力给姚登山的一封信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

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的谈话

〔时间：凌晨三时，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被接见者：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北外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

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 19 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四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 10 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你们现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严肃的阶级斗争，你们一个学校都没有团结起来，你们还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回到学校两派三派联合都不容易，还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谢副总理插话：这是一个梦！）这是

一个黄粱美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的讲话
〔摘要。“财联会”代表也出席〕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还不满足，和我们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意见，我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话嘛。我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两次小会，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算太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一个学院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消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外贸部本来做得不错，一派又搞成两派。

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们就此止步。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的。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开了会。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顶了回来。

姚登山到处做报告，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制造混乱，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评了他。

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刘邓陈了吗？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他用这个口号给驻外使馆打电报，人们不懂，是哪个陈啊？你们总是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周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翻译的谈话
一、“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二、“外联”核心组与“6.16”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参预了“五·一六”的活动，过几天我要去揪人，我有材料。

三、我现在不到外交部去，我要是去讲话，外交部联络站就垮台了。

四、北外红旗大队打姚登山是错误的，但姚登山把红旗大队比作卡比卡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姚登山要一批二保。

五、外交部目前进行的四大是正常的，外交部乱的不够，还要大乱，但不许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讲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

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

〔时间：晚〕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谁打、砸、抢谁就犯错误。

二、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要保证绝对安全，如发生问题，立即报告总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 34 个战斗队的群众。”

总理说：“对 516 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改正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 1 点，周恩来在钓鱼台五号楼，找刚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谈话

讲了对 16 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 8 月 7 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就让他走了。

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

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

毛泽东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

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凌晨，中央文革召开生活会批评王力、关锋

批评王力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提出王力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毁我长城；

第二，反对周总理，以王力的八七讲话为代表；

第三，反对中央文革，主要是反对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个人

第四，王力是“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

陈伯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吴法宪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

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总理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最后，由江青作了总结；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并宣布：王力请假检讨。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

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

（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

（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

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

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

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把王力、关锋转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转送到西山一座别墅。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他说：“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不久，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中央打击极左思潮的问题，当时和现在都存在许多争论。

一、关于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问题。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在北京是否存在一个所谓“首都五·一六兵团”？从现

在看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这样的一个小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周恩来。无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和参加者的出发点、主观愿望如何，它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分裂、瓦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取缔这个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骨干分子，由群众组织扭送到公安机关，基本上就瓦解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请假检讨”以后，吴德在北京市借口清查“五·一六”、清除“王关戚”的影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搞了一次大换班，把一些人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这就已经有了扩大化的迹象。

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一个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何时成立？主要任务是什么？进行了那些工作？似乎都不清楚。

二、关于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问题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有的人借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个错误口号，就把一切批判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活动，都说成是“揪军内一小撮”，因而都是错误的，因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就是错误的。

有的人把“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既然同意“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也就是赞成“揪军内一小撮”。

有的人甚至认为，“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来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因为通知中就有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就从这段话说起。

众所周知：中央五·一六通知中的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时亲自加上去的，是整个文件的精髓、灵魂。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意在强调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仅混进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

导机关，也混进了政府机构、军队机构、以及各种文化机构。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突出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思。

以后，对这样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由于一些省军区打压革命造反派的事件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武汉七二〇事件暴发，在一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了“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实质上是突出了“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所以，“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曾经同意过“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但是，在处理七二〇事件的定性及方针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的人是有区别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中第一次提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提到：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师参加？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

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中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吴法宪在中央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的发言中，根据叶群的示意，把陈再道的问题与徐向前挂上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说：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

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提议几个元帅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这就是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突出了“军内一小撮”，这样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当前打击的主要对象。由此，就会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的一次反革命暴乱，陈再道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后面有某个老师在操纵或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正是在“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一些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某几个成员，特别是一部分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认为：目前全国形势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到处都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以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就开始检讨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并批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

这就说明：“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三、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王关戚的问题究竟是谁提出来并向毛主席汇报的？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周恩来通过杨成武汇报的（杨成武说）；一种说，是江青通过张春桥汇报（陈伯达说）。很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

当时认为王关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看来主要是两条：一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毁我长城”；二是煽动在外交部夺权，“反对周总理”。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王关戚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他们。

当时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信的批语说得很清楚：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就是说：他们是犯些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仍然称他们是同志，处理的办法是“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当时对王关戚三人的看法和处理是否有区别？

很明显，是有区别的。首先请假检讨的只是王力和关锋，四个多月后才是戚本禹。就王力和关锋来说，江青明确地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二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三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不同：

戚本禹一九八三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在公开表态中，从未贬损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锋一九八三年虽然免于起诉，但仍被开除党籍。他出狱以后，对过去的政治、现实的政治都不愿公开发表意见。是桃花源中人式的？还是张春桥式的？令人费解。也许有一天这个谜底会有人揭开吧？！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中有一篇对关锋的的访谈录，标题中有句话是：“对我的失误和过错，我不想回避”。

王力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一部反思录就说明了一切。他说在请假检讨以后就开始反思，他反思的结论是：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的两次讲话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几乎都参加了起草，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所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

这就证明了江青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四、关于中央批判极左思潮的评价问题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打击对象上的微妙变化。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不是向敌人继续进攻，而是采取退却，从此，文化大革命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其实，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多次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战略部署是：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开始，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新阶段。

由于“二月逆流”的干扰，影响到相当大的一部分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与过去一些地方的走资派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区别的。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个省一个省邀请各方代表到北京谈判的办法，先后解决了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北京、四川等等省市的问题。

进入七月，中央正着手解决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问题。总的来说，革命形势是好的，运动进展是顺利的。

不意，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发生了省军区独立师少数人与“百万雄师”少数坏头头相互勾结，煽动一些人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恶性事件。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武汉军区领导人有意策划的对抗中央的行动，而是由于领导人犯错误的影响下发生的少数人的“叛逆”行为。由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坏事变成好事，加速了湖北省问题的解决。

但是，有的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发生了偏向。他们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标志着全国形势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各省军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后台的支持和操纵下，用武力对抗中央、夺取权力。因此在各地提出了“揪陶铸式的人物”、“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夺军权”、“夺外交大权”等等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方针去做，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打乱了我们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有力的措施，纠正这种极左的偏向。为此，不仅在外部的要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而且在中央文革内部，也要“消肿”，清理极

左思潮。

事实证明，在中央文革内部确实存在着“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形左实右的王力式的人物。

事实也证明，纠正极左偏向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然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2008 年 3 月 2 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29 日修改

第五章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刘贤权在青海省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个别人怀疑中央决定，认为“决定是假的”，“没有盖章子”；极少数的坏人，趁机造谣惑众，说什么“中央不完全了解青海的问题”等。还有的群众组织去京告状，实际是告毛主席的状。这是极其错误的。

八·一八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and 先锋，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准了以王昭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要是：

（一）六·三社论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斗争的主要问题，一方以八·一八革命组织和外地学生，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彻底为六·三社论平反；一方以王昭等为首，勾结“保”字号组织，反对平反。这个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持续时间很长。事实证明：前者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斗争中很多群众被欺骗、蒙蔽，上了王昭等坏蛋的当，有些群众组织起了保护王昭的作用。

（二）炮轰省委、火烧王昭的口号也是八·一八和外地学生提出的。在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并见之于行动，没有高度革命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当时一些群众组织，并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相反地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相对抗，提出新的省委是革命的，炮轰省委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等，为王昭等人解围，向省委报喜，特别是把青海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都归于王昭，流传什么“王青天”！王昭确是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革命组织这一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三）王昭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毛纺厂工人到省委静坐示威，李家庄孤儿问题，迟迟不处理，还调农民进城以及以后几次调贫下中农进城，围斗工人、学生等，都是在王昭的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严重的是有些问题发生在主席批转王效禹

同志的保证报告以后。

（四）围斗、排挤外地学生。在“胡天申事件”上，他们大搞“慰问”，夸大病情，假报病危，扩大了事态；组织写传单，到处散发，企图搞臭和镇压外地红卫兵；组织写起诉书，写反击大字报等。搞得西宁满城风雨，一度出现了“捉拿凶手”的白色恐怖，有的学生连袖章也不敢戴。白天不敢出门。而王昭则自以为得计，说什么这一下抓住了他们的问题。严重地造成了本省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

（五）徐国源同志第一张揭露王昭的大字报，刺痛了王昭，他便布置许林风、薛可写反驳的大字报，到处张贴，扩大影响，并在西门外几百人围斗徐国源，进行压服，甚至张贴揭发王昭和省委错误的大字报时，有人就当场提出质问，要把人家轰走。

（六）“民和事件”，查明确有“黑材料”，八·一八作的非常对，而红卫兵总部等，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则千方百计为省委开脱，大肆攻击八·一八盗窃了党的机密，制造了“民和事件”。

（七）王昭重用坏人，结党营私，谁要给他提意见，就打击报复。生活上拉拉扯扯，极不正派，伪君子，假装正经，乱搞男女关系。

（八）王昭同三反分子罗瑞卿的关系极为密切，六六年四月即有人揭发，但始终不作交代；同王仲芳互相勾结，攻守同盟，企图达到包庇罗瑞卿、王仲芳，使自己蒙混过关的目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

关锋同志：

青海事件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第一条，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军区副司令员）夺了党在青海军区的军权，推翻、扣押了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

第二、他篡夺军权后，又勾结××部队，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多人，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事情，军内也没有的事情。

最近青海出现了大标语，要欢送刘贤权，打倒刘贤权，（刘贤权同志是中央调至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内蒙是个大军区，刘贤权现在不能去，由别人去代理，

以后去。

戚本禹同志：

你们其中一些人还在进行对抗中央的指示，写“打倒刘贤权”的大标语，攻击八·一八大方向错了。

二、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为庆祝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诞生，《青海日报》六月二日发表了题为《把〈青海日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的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

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公告

一、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由刘贤权同志任主任，由张江霖等同志任副主任。

二、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

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四、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六、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

七、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

八、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往所发出的一切公告、通令，

必须坚决执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文章：《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

三、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解决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省委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由这一决定而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省委还对解决青海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全省的十一个遗留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如宣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青海是占主导地位的，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是好的，是革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前的第四届省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受到全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符合全省各族人民愿望的决定，把功过、是非分清了，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

一九八几年，中央军委作出结论：赵永夫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逝世。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以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在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大传播、

大普及，革命大批判如火如荼，革命大联合日益巩固，革命三结合空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全省一片红，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整个青海高原呈现着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当然，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勾结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秘密串连，幕后策划，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否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大方向。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也伺机反扑，妄图否定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绩，大刮翻案妖风。

斗争仍然在继续。

2007 年 10 月 4 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29 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呈中央并华北局会的报告
报告说：最近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乌兰夫翻案的传单。证明一小撮坏分子在幕后积极活动，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挑动蒙族（主要是土旗蒙族）群众，反汉排外，为乌兰夫翻案。有的黑帮分子也借机翻案。对此，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极为愤慨，并对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区党委在斗争乌兰夫反党集团上，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的保护乌兰夫，奎璧，吉雅泰。许多同志质问区党委“为什么保住乌兰夫不让斗”“为什么不敢放手让广大群众斗争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等，反映很强烈。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群众对中央保护乌兰夫产生了误解，怀疑“是不是刘邓搞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中央这样保乌兰夫，内蒙古党委又不敢放手斗，是不是过去搞的有问题了。”

请中央把区党委关于乌兰夫问题的报告迅速批发下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请示中央批转“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 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电报，和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滕海清谈内蒙古目前形势

“八条”下达后，方向明确了，四·一三到五·二六，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反党集团制造的反革命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五·二六以后，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彻底粉碎了反党集团的阴谋。五·二六以后“八条”在内蒙古各地得到了认真的普遍地执行这段时间里较好的，呼市比较平静，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其它各地方也逐渐好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总指挥部文章：《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四、积极发展资本主义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领导权

六、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一

七、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抹煞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

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九、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彻底革命，积极推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

十、极力美化宗教，主张“和平共处”

十一、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十二、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十三、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四、乌兰夫是贪生怕死的大叛徒大特务

十五、乌兰夫是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大王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高锦明在内蒙古自治区批判乌兰夫大会上的讲话以乌兰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大致有三种人：

(1) 老搭档，老班底，多年来与乌兰夫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像金璧、王锋、吉雅泰。

(2) 拉进来的封建上层人物，他们是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小股份公司，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活动，这一部分人以哈丰阿为代表，包括封建上层，叛徒、卖国贼、间谍、外国特务。

(3) 近年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小撮骨干，包括蜕变的“老干部”、“走资派”，李贵等。

三、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滕海清高锦明时的指示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等中央首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接见滕海清、高锦明同志，做了如下指示。〕

1、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经成熟，同意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不仅是内蒙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全国对内蒙都很关心，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会有很大影响，对修正主义也是个打击。

2、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一定要求得那样完善，人数不可过多，机构不一定那样完整，是个过渡，要在斗批改中逐步完整。在斗批改中通过实践，需要的机构建立起来，不需要的就去掉。革命委员会是个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搞个成熟的架子。要在斗争中逐步改进，逐渐成熟。

3、军队方面：人要适当多一些，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干部解放得多这是好

事，但不一定都参加三结合，可作工作，各盟市不一定太多，呼市可以多一点，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将来可以逐渐扩大，付主任中可以有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可以搞得小一些，照主席的教导，在斗争中逐渐成长。

4、革命委员会，从机构到人委都要有个革命化，都需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

5、各盟、各旗（县）条件成熟的可以搞革命委员会，你们可以先抓几个典型，把经验报上来，还不够成熟的，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斗争中考验，锻炼干部和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大搞挖肃运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滕海清在内蒙革委会上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过去没有打死什么人，最近打死了一些人，国家的机器、枪又被抢。究竟怎么看待？毛主席说主要是：

- (1) 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
- (2) 群众里有坏人；
- (3) 无政府主义。

东三盟这三种情况都存在，内蒙的情况也符合全国的情况。这里告诉我们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另外加强队伍中思想建设。敌人不甘心死亡，主要手法是操纵一部分受蒙蔽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内蒙处于边疆，有苏蒙修、日、蒋特务，在这时要插手进来捣乱。他们可能和走资派联系起来破坏文革，社会上地富反坏右乘机钻进来，也打着造反有理，甚至钻进我们造反派内部来，大造谣言，破坏文革，因为我们空隙很多，造反派中的派性是最大的防空洞，敌人肯定要钻进来，国内外敌人就是找这样场所。造反派内部不能那样纯洁，造反派内部争名、利、权起了很坏作用，这些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滕海清谈内蒙形势

当前内蒙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及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蒙修特务，互相勾结起来，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一些坏家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暴露了，有些正在暴露，这是件大好事，只有让他们充分暴露出来，我们才能消灭他们。

东三盟（呼盟、哲盟、昭盟）武斗正在发展扩大，阶级敌人暴露得还不充分，现在我们有很多地区，很多单位，有这种情况。乌兰夫黑帮分子放在那里不批不斗，对这些人还恨不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偷偷的保乌兰夫及其一伙。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还逍遥法外，还有大批判、斗批改搞不起来。一方面领导不力，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另一方面，里面有阻力。也就是有部分人，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在内蒙廿多年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很好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吴涛给内蒙古革委会各常委同志的一封信

信

文教口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必然要涉及到其他方面，这是又一次从文艺界开始的更加深入的革命，当前面不要搞宽，防止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把乌兰夫的黑线彻底挖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内蒙地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要充分地注意到，乌兰夫在内蒙廿年的统治，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乌兰夫这条黑线还没完全彻底挖掉，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我们同乌兰夫的斗争就算完了。没有完，他们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这一套东西根子是很深的，就是连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也还没有全揪出来，内蒙揪出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锋，军区揪出了乌兰夫在军区的代理人××、××、和黄、王反党集团，并不等于全内蒙的黑爪牙和黑线全部挖出来了。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军区机关、部队整顿整训结束了，好像矛盾解决了。

必须看到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很复杂，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要防止右倾，甚至麻木不仁。

有些地区阶级敌人刮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还有的人把黑手伸得很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其他弱点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插手到造反派内部，利用造反派的派性，瓦解造反派的队伍，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制造造反派之间的思想紊乱。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区机关有的人还在背后搞鬼，有的人耍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也披上左派的外衣，混水摸鱼。实际上他们蒙蔽了很多群众，从极“左”或右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干扰和破坏对乌兰夫的批判。

四、开展挖肃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教育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

话

一、不抓阶级斗争，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

二、一定要彻底揭开教育界阶级斗争的盖子。

最近几天有些人公开讲，保乌兰夫是保定了，一定保住；还有人讲；内蒙二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如果成绩是主要的，功劳是乌兰夫的。……公检法是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许多坏人。王再天一手把他包庇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很多真正革命同志受迫害受打击。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滕海清说：

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你们这里摇摆性很大，呼市也有摇摆，呼三司摇摆很厉害。包头学生摇摆，工人坚定。

吴涛说：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挖肃斗争中钻到造反派里的人，完全有，特古斯在去年就是个造反派，还是响当当的，进革委会时都叫他进，那个时候抓他，群众有情绪，让群众自己抓出来嘛，我们从党内、军内挖出了一批走资派，是打击谁了？再纯洁也纯洁不过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是也挖出了揪出了坏人？

滕海清说：农村牧区划阶级，不要搞挖肃，大批判就是肃流毒，农村划阶级斗牧主要搞，有坏人也可以揪出来。发现新的地主可以划。

滕海清说：老保是有想翻天的，但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们怎么也翻不了天，有些地方复辟了，我们慢慢地有计划地总要搞他。有人说，公检法百分之八十是

坏人。其实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看大方向，看基本的，大多数是好的，光看支流问题，钻在里面就会出不来。阴暗角落总是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会有。有人说我们压制造反派，真正受压制的是假造反派，或者根本不是造反派，是资产阶级造反派。对真正的造反派我们怎么会压呢？我们只能支持。

滕海清说：

你们前段走了一段弯路，你们在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时，发生了动摇。

把反击右倾翻案与挖肃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为乌兰夫翻案。不是有人大肆宣传呼市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这是什么人说的，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会这样说，内蒙、乌盟各个旗县都成立了革委会，人民当家作主，他说是复辟，这不是敌人吗？不是替乌兰夫宣传吗？

革委会被牵着鼻子走，你们被什么人牵着走的，为乌兰夫翻案的人牵着你们的鼻子走，你们糊涂就糊涂在这里。

群专问题，不少旗县两派，出了很多毛病，你抓我的，我抓你的，互相抓，这样不行，要很快纠正。

上一段批评了你们的错误，也是对全区其它地方的教育，如果都这样无政府主义还行，我们是有政府的，报社、电台不得了，一点不能出乱子。

乌盟报纸是错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有的是好人犯错误，有的是坏人插手。还在那里为乌盟报辩护，现在还明目张胆地到外地宣传，为乌兰夫翻案，不得了，什么想不通，群众通了，坏人一辈子也通不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听取内蒙察右中旗汇报後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权星垣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有的没有发挥骨干作用，说什么“自己好容易结合了，可再不能犯大错误了。”

有的人，人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贴过他的大字报，他叫人家检查，

有的人却说什么“那时我看他们就不正派，看现在真的揪出来了。”

有的人说过“如果保守组织胜利了，也在挖乌兰夫黑线”，

个别有翻案的，例如公安厅就有。公安厅造反派有右倾思想，曾一时对王再天的面目没看清，于是就有人说(原红革联)“造反派不对了，保了王再天”，

有人说：“我们组织不该解散，那时解散坏了，如果不解散，现在还不和咱们联合，还不闹个席位。”

有的干部不是挖敌人、肃流毒，他趁这个机会否定造反派，说什么：“看，那时不是看准了吗，他们里面就是有坏人有牛鬼蛇神！”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文艺界的挖肃斗争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了。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基本上揭开了，主要的坏人我看基本上是挖出来了。也可能还有。

文艺界的造反派应该自动地按照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办事，向阶级敌人进攻。但是在特古斯揪出之后，一段时间有反复，以后又有一段反复。反复的原因，一个是敌人在那里顽抗，我看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领导同志思想右倾。

文艺界因为有些同志捂阶级斗争的盖子，有些群众就拉出来，新组织了其他战斗队，有些同志很担心是不是又乱了？毛主席说要搞大联合，我们搞分裂了，有各种谣言，各种看法。那种乱不是乱我们自己，是乱了敌人。那样一分，有些同志就头疼啦。其实我们老造反派思想保守，促了一下，这样一促就把敌人暴露了，我们老造反派当然有点功臣自居，一促对他有帮助，这样老造反派就转过来了。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同新杀出来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真正地把坏人抓出来。

我认为文艺界的挖肃斗争和内蒙整个地区一样，现在首先就是要继续抓阶级斗争，以抓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为中心内容来办毛泽东学习班，来提高大家的两条线路斗争的觉悟。其次，挖出了这些敌人，应该把他们的流毒，他们反动的罪恶肃清。

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

下一步干什么呢？应该是斗、批、改的问题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乌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一切残渣余孽。

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正确的。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

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煽动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出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要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了“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出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今年一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全区目前“三右”主义仍然是运动的最主要的危险。当前主要是反右，反形“左”实右。要注意有人以反“三右”主义为幌子搞“三右”主义，以反右倾翻案为幌子搞右倾翻案；但也要防“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哲盟《×××》、《×××》从去年到今年四月，错误严重得很，你们是造反派，犯了错误改了就行。哲盟革委会和《×××》压了你们不对，我们是批评了他们。你们《×××》也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告诉你们，赵玉温不要打，你们不听。肇那斯图、阿古达木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你们就不打。那时我们不揭你们的底，可能你们是受蒙蔽。革委会成立了，还是那样，一直搞的不像样子。我这

并不是说哲盟革委会压你们是对的，革委会压你们是错误的。《×××》、《×××》广大群众是好的，犯错误的是头头，你们带头冲革委会，那怎么是正确的呢？你们犯错误改了就行。不能说你过去正确，现在正确，一贯正确。没有那样的事嘛！不能否定过去的错误。《×××》不能压《×××》、《×××》。《×××》的大方向是比较正确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从三月二十六日乌盟小报出了问题以后，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把这个盖子揭开。实质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乌盟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人在那里搞了一套班子。实际上，乌盟革委会是两个中心、两套班子。他们不是搞两派的派性问题，而是搞了一个黑班子，搞反动的“多中心论”。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 1946 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 年 4 月 20 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 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

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二十多年来，“新内人党”疯狂地进行了民族分裂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已经窃取的权力大肆宣扬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公开叫嚷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大量散发“三五宣言”，提倡民族自决，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打着民族特点的幌子，叫嚷要“踏出自己的路”，拼命推行“三不两利”，“稳、宽、长”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他们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搞民族军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分裂祖国、实现内外蒙合并、复辟资本主义，做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乌兰夫等“新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为了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利用合法身法，大搞宫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大搞反汉排外。把“新内人党”的骨干安插在要害部门掌权，阴谋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目的。

五、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纠正清队等中的错误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人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比如盟市一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一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三、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

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 共 中 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概要）

1969. 12. 19；中发 [69] 85 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 85 号文件，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协助前线指挥所工作。

“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最后以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杜

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黄振棠（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四人组成，郑维山为书记，杜文达、黄振棠为副书记。

六、七八年以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七七七月七华国锋等同意内蒙党委a七八年以后
意见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中共中央批示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的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达这一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_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

十一、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全盘否定对乌兰夫的批判及内蒙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

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先进地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在国内外都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作走了

弯路。重工业的发展过快，畜牧业的发展被削弱，影响了全区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关于批判乌夫兰的错误问题

关于乌兰夫的错误，是于一九六六年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处理的。由区、盟监委和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开了两个月，他先后检查了四次，刚开始态度极不老实，最后一次他检查了，还很诚恳，他表示要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要让在实际行动中看他。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在此前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中说：“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先进地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在国内外都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作走了弯路。重工业的发展过快，畜牧业的发展被削弱，影响了全区生产的发展。”这就全盘否定了一九六六年对乌兰夫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地区对乌兰夫及其他一些的人历史问题进行审查，提出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问题，中央并未审查批准作出结论。因此，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一大冤案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关于二月黑风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众对内蒙军区有意见，组织人在军区门前静坐。二月五日中午 12 点 15 分，内蒙师范

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希望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出来辩论。正在这时，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两枪。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体内。抢救了五个多小时无效死亡。内蒙军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第一个向群众开枪的军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事实确凿，何来什么“内蒙古二月逆流”一大冤案？！

三、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错误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党内清查“新内人党”；二是在革命造反派内清查“坏人”；三是在牧区划阶级清查“牧主”。

一九六九年初，中央领导人多次对内蒙的错误提出批评，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内蒙主要负责人就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错误向中央作了检查，并着手纠正。

华国锋、胡耀邦等人都只抓了一个内人党问题大做文章，而对遭受严重打击的革命造反派，不但没有平反，而且变本加厉地以种种罪名继续进行迫害。

2008年8月31日初稿

2011年10月1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群众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发生“八·二六”流血事件，

1966年8月26日，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天津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是向文化大革命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参加；

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参加。压力不大，会后，万晓塘自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万晓塘逝世。

天津市委组织五十万人参加追悼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

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张淮三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

中央派解学恭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二、取缔“野战兵团”，成立五代会，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淮三在公安局“政法公社”夺权
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驻军按毛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郑维山到天津搞调查工作，听郑三生、肖思明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

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姜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办理为宜。

一九六七年三月，天津市召开了五个代表大会

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批复取缔野战兵团

李雪峰、解学恭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

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

××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选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江青讲话：

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

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

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

康生讲话：

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

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

周总理讲话：

“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

“北京 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 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颀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万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一段话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戚本禹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于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

戚本禹说：我再讲两点意见：

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

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今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要去搞武斗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天津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港口封锁要解除，护港大队解散。对国计民生的事你们要有责任感，几十条船停在那里，每天要付出多少英镑，合人民币四百万元，相当 50—60 万农民一年的生活。重要的是妨碍工厂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政治影响。

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不能说我是造反派，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可以吗？（双方代表：不可以。）那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上海的造反派，港口堵塞几十万吨都一下子解决了，这值得你们天津学习。如果对港口不负责任，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造反派。

我对港口哪一派都没意见，不是责备哪一派，要很快的把港口疏通。天津的革命派，你们两派要帮革命之忙，帮国家之忙，帮人民之忙。我和伯达同志很关心港口、铁路运输，任何人不能封锁港口、天津港口关系到北京，关系到全国。

天津军队要帮助港口，中学生不要去港口，大学生也不要。他们写大字报还厉害。要让搬运工人去，要把港口迅速疏通，这是最大的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家要顾全这个大局。这几句话是不是毒草啊？可以当面批评。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戚本禹讲话：

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

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

江青讲话：

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就是一个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总是讲工人阶级嘛，没有讲工人派别嘛！你们现在搞了两大派，势不两立，我同一个地方的两大派讲过，你们都抱住一块大石头，把这块石头当作宝贝不放。抱着这块大石头就走不动路，怕丢掉了这块大石头，就低着头走，就迷失方向，这怎么走呢？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有些人还得意得很，把这块大石头当宝贝，被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很高兴，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闭着眼睛。

你们打砸抢搞的太没味道了。太没有意思了。你们干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们，害得你们不能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

（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工厂本身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

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題？“大联筹”的同志？

（“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

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

（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

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

（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

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

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

众答：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

三、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

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四、中央文革判定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

（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

姚文元同志讲话

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

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一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门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广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

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江青同志讲话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一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

一九六七年的五、六月，天津市话剧团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陈里宁案发生在湖南

陈里宁是湖南省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办事员。

(1) 陈里宁批评刘少奇的问题

根据陈里宁在 1965 年 11 月 10—11 日写的一份交待：

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1. 1950 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

2. 1956 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1962 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3. 刘主席在 1959 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 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4. 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 1959 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5. 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1962……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6. 1960 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一九六二年，陈里宁开始研究刘少奇的问题，与别人交谈并写日记。

一九六三年初，陈里宁的日记本被人偷去。

一九六三年四月，陈里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湘潭市人委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陈里宁写信给毛主席谈到了他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于陈里宁仍然坚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改，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经医院鉴定：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不久又出院。

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陈里宁写了几十封信给一些单位和个人，谈他对刘少奇问题的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陈里宁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医院作出结论：

结论：(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公安部派人将陈里宁从湖南精神病院“秘密逮捕”押解至北京入狱。

一九六五年八月，陈里宁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查体：一般情况佳。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2) 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

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

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二）陈里宁案平反在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里宁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

主管大夫金弘敏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她否定了以前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写给中央文革的信件发出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联合医院的造反派，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造反派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公安部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

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群众。负责人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群众误入监狱。群众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

这时，侯虞铿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

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周恩来总理要负责人接电话，负责人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

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

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

负责人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做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谢富治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并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

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

负责人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

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并宣布陈里宁自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向王广宇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陈里宁发言：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会后，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以后又转到历史研究所。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说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

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

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

戚本禹派人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

（三）《新时代的狂人》出现在天津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王广宇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王广宇的问题时，把这件事当成他的罪行之一）。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他们去看演出。办事人员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

（四）围绕陈里宁问题的两派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戚本禹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戚本禹交待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

戚本禹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陈里宁回到北京，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中央文革办事组关于陈里宁问题的电话记录的传单

戚本禹为了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大致内容是：“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

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 至 3：55，地点：人大会议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

因此不能说他是有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贰、本节简论

一、利用群众示威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天津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说：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周恩来在当时也指出：

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

万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

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二、群众组织阵线不是十分鲜明

开始天津市委少数人支持的“红卫兵野战兵团”，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这个组织被取缔。

新的天津市委（直属中央）成立以后，推动大联合，筹备“五代会”，又出现了一下子吸收偏右的群众组织过多过快，同时又排斥了一些造反的群众组织。

在造反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中，混进了不少坏人，他们热衷于搞打砸抢，甚至抢劫财物、强奸妇女。

三、中央文革处理天津“两黑”（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问题出现偏差

关于黑戏问题，目前看到的材料不多，就江青、姚文元讲话来看，不能说明这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究竟错在哪里。

关于黑戏问题，虽然没有看到《新时代的狂人》的演出剧本，但是，它所表现的原型——陈里宁，确实是一件冤案。

一九六二年以后，陈里宁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行，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很正常的事。当然，要注意方式方法以及场合。

一九六三年，湖南省湘潭市在处理陈里宁的问题时，只是认为他神经有问题，把他当作精神病人强迫治疗。

一九六五年，公安部插手陈里宁问题，把他作为政治嫌疑犯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一月，群众组织为陈里宁造反，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插手陈里宁案，把陈里宁释放出狱，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北京市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利用陈里宁问题作为筹码，搞派性斗争。

戚本禹为了调和两派矛盾，再次把陈里宁收监。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把陈里宁问题，与王关戚问题挂钩，断定《新时代的狂人》是黑戏。

此后，中央专案组断定：陈里宁是“假反刘、真反毛”，把陈里宁定为“反革命”。

就这一件事来说，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就太多太多了。

2008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4 日修改

第五章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批判江西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和新疆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我看确实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开个大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给地、县级干部传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联，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当地工农传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它地方，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

二、批评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两次集会，研究夺取江西省党、政领导权。

魏厚庆在会上说“上海夺权有几天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会议公推他为夺权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按照计划，同时在省人委和省委两处举行夺权大会，宣布“接管省委、省政府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召开批斗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大会。这股夺权风很快传遍全省各地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赣州红卫兵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五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十七时二十分，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一次电报指示

你们进了《江西日报》的同志，望能立即退出，以利报纸立即出版。至于《江西日报》的报头问题，因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以不改为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二次电报指示

据悉，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同志尚未完全撤出，报纸至今还没有启封出版，对此中央十分关心。

一九六七年五月，江西大联筹的万里浪、张羽等人提出“五项要求”，在省军区门前“静坐”。

“静坐”持续两个多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江西军区文件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及他自己的指示

总理指示：

1. 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

2. 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

3. 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4. 刘培善先作检查，军区那个检查，你们（指军区）自己研究。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严令：立即释放舒北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南昌军分区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南钢 6·29 事件。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四日，赣州发生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打死 168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大联筹的电报

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晨，新华社南昌记者站及时准确地报导了江西保守派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

总理传达主席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而是强……是要流血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七月份把局势稳定下来，迎接“八·一”，要把斗，批，改搞好……从广州、福州调一部分部队来江西，稳定局势，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全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总理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确实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查，要比六月七日检查要深刻要坚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一些人策划火烧萍乡煤校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周恩来送审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这个稿子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

主要内容是：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给新华社江西分社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

联络总站派温圳的张勇布置，动员农民，用机枪，火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五人，打伤七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话记录
总理：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我就是怀疑你派的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那里的武斗制止？刚才说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军分区，武装部确是不象话，放纵了几个月，已经成了习惯。

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对造反派）以你们造反派为核心，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跟亮相的领导干部商量，现在军区威信不够，你们信不过，所以夺枪，这是在南昌等地。另一些地方联络总站力量大，联络总站相信军区，那样搞联络总站又要反对，我们希望联络总站能够觉悟，马上转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在赣州军分区头头李胜的支持下，“反复辟大军”残杀造反派，打死 223 人，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赣州。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并以此为借口冲 6013 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四人（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战士），打伤五十七人，重伤七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进驻吉安的广州 6182 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二十多名战士毒打野战军战士。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

周总理说：

今天我把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请来了，济南部队是从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去的，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部队。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个部队的军政委程世清同志、副军长杨栋梁同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出的队伍，谁要说是刘少奇派出的，是污蔑，谁说的，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

第一，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现在赣州、萍乡、宜春、南昌、波阳、抚州、九江、上饶、景德镇都派了部队去，我有一个要求，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其他地方部队，应当对野战军抱欢迎的态度，搞好工作。

第二，无论如何，既然达成协议了，首先在北京要执行，不要互相谩骂，互相打人，捉人，抢东西。

第三，江西问题快到临近解决了，军区党委要改组。现在有条件成立筹备小组了。

三、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3 号

此件看过，照办。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

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温道宏、鲁鸣、罗元炆，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四）各革命组织及江西省广大革命群众，应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铁路等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勇于揭露和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革命造反派，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摆事实，摆道理，进行耐心的、细致的、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的行列，决不可采取打击报复、歧视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实现以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有独立部队，本来两个营，一个福州派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原来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联络员到前面联络，由副团长去联络；但是进驻的人被绑架 28 个人。新任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打到抚州军区说，把联络同志都绑架了，姓刘的参谋长他不承认，要他释放，他也不承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抚州军分区一些人发动军事叛乱

八月二十四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他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

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凡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搞农村包围城市，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

有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

三、筹备、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视察江西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到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

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组织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子、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人家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受蒙蔽的。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俱，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 6011 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发生武斗以后，省大联筹和极“左”派互相攻击，形势比较紧张。

革筹小组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次武斗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革命派提高了觉悟，从而稳定了局势。

一九六七年九月份，极“左”派借口为“三大户”平反，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

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视察江西时所作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以后，当部分极“左”派在坏人的策划下不断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时，革筹小组又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不受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深入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对极“左”派的群众耐心讲道理。

长江航空工业学校，是极“左”派的主力之一，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到这个学校大讲特讲毛主席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小将们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感动地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这个学校克服极“左”思潮以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不参加武斗，主动交出武器，百分之九十的师生和工人，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高潮。

一中红八团，就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检讨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南航井岗山因该校东方红首先挑起武斗，他们便用武装进攻东方红，要东方红缴械投降。

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些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活的政策教育。

南航东方红也自觉地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极“左”派的活动达到高潮

程世清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在省革筹的教育帮助下，广大革命工人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排除了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极“左”派的后台黄霖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

经过群众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极“左”派组织的大部分群众看清了叛徒黄霖的反革命真面目，纷纷表示，要和黄霖划清界限，彻底肃清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发动群众，大搞“三查”

商业厅系统的商业厅战斗团（属省大联筹）和商系总指挥部（极“左”派所属组织）之间长期对立，不断发生武斗，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省革筹小组把两大组织的全部常委集合在一起学习。商业厅战斗团揭发了坏人幕后操纵商系总指挥部的罪恶活动。会后，两派逐步消除了对立，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轻化工业学校发生武斗纵火事件

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拘留了武斗纵火事件的策划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现将江西省革筹小组如何正确对待极“左”派的材料一件发给你们。这个材料中总结的经验，在全国一部分存在这类矛盾的地区和单位，是有参考意义的。

希望你们自己也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需要我们经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目前，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已作出指示和规定时，尤其需要具体的经验总结。如有比较好的典型材料，望核实后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社论说：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始终把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组织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深入地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受蒙蔽的群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样，他们就以迅速的步伐，实现了全省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成

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四、批林批陈 批判程世清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以来，程世清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

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

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

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

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

林彪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

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为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

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到江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对许世友等人）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以及江西省的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白栋材、李登云、于德馨、黄知真、陈昌奉、熊振武、张志勇、邹文泗等十一人，先后到达北京

从这一天开始，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江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的“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进行革命发动，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会见涂烈，谈话三个多小时，指出：“斗争从你的信开始”。

涂烈一回到南昌就召集群众组织代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揭发批判。会内会外结合。

六、江西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烈、蔡方根等人在南昌市西湖路二十一号集会，传达王洪文的指示，组成以涂烈为负责人的“七人”核心、以蔡方根为负责人的“二十一人”骨干组织和以“江卫文”为名的材料班子。一方面建立“武斗小分队”，一方面搜集印发省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右倾翻案活动材料，大造革命舆论。

七、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一审宣判：

判处涂烈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判处万里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张羽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魏厚庆、曾凡珩有期徒刑各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八、李九莲案件的始末

（一）一封恋爱信引起的风波

1969年2月28日 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

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 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 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 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由冶机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师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其中一则日记如下：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注：此处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注：此后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

（二）在一打三反中，李九莲以反林罪名判五年徒刑，后改免于刑事处分

1970年1月29日 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认为处理太轻，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1年1月5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鉴于林彪折戟沉沙，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三）在批林批孔中，李九莲要求平反，得到一些个人和组织的支持，被判十五年徒刑

1973年5月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 年 4 月 4 日，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

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1974 年 4 月 13 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 年 4 月 14 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14 日 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 年 4 月 16 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

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 年 4 月 17 日 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19 日 李九莲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 年 4 月 20 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李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 年 4 月 22 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25 日，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 年的 4 月 25 日 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 年 4 月 26 日 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 年 4 月 26 日，“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 年 4 月 30 日 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30 日 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

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 年 5 月 2 日，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

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发表讲演。

1974 年 5 月 9 日 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 4 月 24 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 年 5 月 10 日 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 年 5 月 11 日 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 年 5 月 11 日 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 年 5 月 12 日，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

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

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 年 5 月 18 日 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 年 6 月 1 日 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 年 6 月 2 日，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各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 年 6 月 1 日 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1974 年 6 月 7 日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 年 6 月 10 日夜，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

接着，1969 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6 月 11 日 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1974 年 6 月 13 日 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 年 6 月 14 日 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 年 6 月 17 日夜，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 年 6 月 29 日，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 年 6 月 30 日 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4 日 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10 日 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1974 年 7 月 12 日 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1974 年 7 月 23 日，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

1974 年 8 月 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 年 8 月 8 日 《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

1974 年 8 月 20 日 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 年 8 月 21 日 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 年 9 月 15 日 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 年 9 月 30 日 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等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 年 10 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 年 10 月 22 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 年 10 月 23 日 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 年 10 月 25 日 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 年 10 月 29 日上午，朱毅贴出《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

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 年 10 月 30 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974 年 11 月 1 日 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 年 11 月 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1974 年 11 月，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

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

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年11月29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散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人被当场拘捕。

1974年12月3日，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

关于李九莲的问题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

李九莲的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

关于李九莲调查委员会问题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麼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

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

领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

4、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等等。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

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 26 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

方道球同志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

1975 年 1 月，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 10 月 22 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 年 5 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22 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 年 7 月 3 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 年 9 月 27 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

刘庭荣（后被判刑 15 年）、管佑龙（后被判刑 15 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 7 年）、林锋（后被判刑 5 年）、罗斌（后被判刑 15 年）、邱彩云（后被判刑 10 年）等 16 人被拘捕。

1975 年 12 月 20 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 年 5 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

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四）十月政变后，李九莲以反华罪名判处死刑，“李调会”被定为“帮派体系”

1976年12月28日（另一说，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同文中也对邓小平“颇有不敬”。

1977年初，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

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 年 4 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 1977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1977 年 12 月 8 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1977 年 12 月 11 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判处死刑。

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 年 12 月 14 日，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

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二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1978年7月2日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78年4月30日，赣州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坚持批评华国锋判处死刑

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

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昂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

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1979年4月，赣州中级法院复查李九莲案。

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

1979 年 4 月 16 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79 年 4 月 14 日 赣州地委同意中级法院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五）华国锋下台，李九莲“平反”

1980 年 1 月 29 日，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

1980 年 3 月 15 日，地区法院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 1969 年的拘禁、1974 年的逮捕和 1975 年判刑，以及 1977 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

1980 年 4 月 14 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1980 年 5 月 8 日，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

1980 年 9 月，江西高级法院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 年和 1974 年、1975 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 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1980 年 9 月 17 日 江西省委研究作出批复：“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1981年1月23日 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在赣州地委扩大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反革命李九莲和非法的李调会案是不能翻、也是翻不了的。”

1981年1月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坚持李九莲案不能翻。

1981年1月，新华社记者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其中指出：“李九莲由于两次被无辜囚禁，判刑申诉无效，自然对整她的前公安部长产生强烈反感，加之前后与世隔绝了七年之久，对社会上很多真实情况不了解，有一些错误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对华国锋的批评也并非一无是处。”

1981年1月25日，胡耀邦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年1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接到胡耀邦指示，当即给江西省委负责人作批示“（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1981年3月24日，赣州地委决定为李九莲平反，对因李案被冤狱株连者进行复查重处

1981年3月26日 赣州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刘玉瑞代表地委就李九莲案复查处理问题作报告

1981年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派员去李九莲家宣读对李九莲的复查改判书（并未作无罪宣判，留有严重政治错误尾巴），李九莲母亲向他们提出六项要求，他们回答：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1981年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

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指出：“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1981年5月9日 江西省高院审定作出对钟海源(81)刑二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被告人钟海源无罪。

1981年7月 朱毅、方道球、曾传华、宋德恒、康为民等近六十人出狱，但无一被宣告无罪，均结论为犯有严重(帮派)政治错误，尚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

刘挺荣、马军、罗斌竟被改判成刑事罪犯，(待)“刑满”释放。

1981年8月8日 李九莲母亲卢菊英要求原调委会人员帮助他们向上面反映自己的愿望，为李九莲平反昭雪。

1981年8月底 朱毅赴京上访李九莲案平反中的严重遗留问题，

1981年9月12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为彻底处理好就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的会上说：

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

《报告》说：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2 年 7 月 鉴于李九莲案及受株连人员近一年来未得到中央有关方面庄重承诺“再复查”，朱毅再度赴京上访，仍无果。

1983 年 8 月 17 日下午，赣州地委书记杜昭，指使地委保密委员会借口朱毅涉入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中央下发的(调整 and 落实政策)文件起诉，以“泄密罪”逮捕朱毅。

1983 年 8 月 18 日 杜昭借口打击刑事犯罪，一举刑拘了李调会骨干和有牵连人员数十人。

1983 年 9 月 2 日，曾传华、宋德恒、梁义贵等原李调会骨干十余人被五花大绑，和刑事犯一道徒步游行示众。

1984 年 9 月 李调会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七人被“泄密罪”再次判刑。

1987 年 4 月 由于杜昭退休，省委和高院干预，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被宣告无罪出狱。

2003 年， 赣州官方编撰《赣州地区大事记》

其中记：“1974 年 4 月 26 日，一些人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赣州市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揪斗、批判、拉山头、打派仗等活动，历时数月被解散（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后遭错杀，1981 年平反）”。

贰、本节简论

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收集到的不多，很多重要问题都没有反映出来。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

一、关于军事叛乱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中央作出解决江西问题的决定性以后，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为首的一小撮人，对抗中央的决定，在抚州农村，欺骗、挑动一部分农民群众，用武装包围城镇，占领了九个县。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

二、关于李九莲问题

其实、李九莲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它被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利用，搞得扑朔迷离。

（一）李九莲的政治立场问题

1966 至 1967 年，李九莲是抚州第三中学的高中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是第三中学红卫兵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

“1966 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这说明她当时确实是一个革命造反的战士。

1968 年高中毕业后，分到某工厂当工人。这以后，她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急剧地变化。一个曾经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为什么在九大以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上的怀疑、动摇情绪？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家庭、个人方面的原因。

促使她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从她自身经历的几件事可见一斑：

1968 年夏 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 年秋 看到青年熊辉被以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

1968 年秋 “清队”（“三查”）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同名者被“揪出”，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 年 3 月 21 日，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

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了一封未署名的信。

1969年5月1日，工厂保卫部门查抄出李九莲的三十篇日记。

从这一封信和一篇日记的内容来看，可以确定：

第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

第二，对刘少奇的问题产生怀疑：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

第三，对现行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

第四，对林彪产生怀疑：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第五，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这其中包含着对某些极左或极右的倾向、做法的不满，但总的说来，是一种严重的政治上的怀疑、动摇情绪。由于李九莲只是在私人通信和私人日记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应该确定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而不属于违法乱纪问题。

（二）在一打三反中对李九莲问题定为恶攻林彪属于敌我矛盾，在林彪事件后改为人民内部矛盾

对李九莲问题的定性处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并经保卫部同意，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交由群众处理；

一种意见，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认为，属于“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1971年1月5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由此可以看出；李九莲政治思想上的错误虽是多方面的，但程世清仅仅抓住李九莲批评、怀疑林彪这一点，无限上纲，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

因此，到1972年6月，林彪事件发生后，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又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由此可见；对李九莲问题的第一次错误处理，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把帐算到林彪集团身上。

（三）在批林批孔运动及抓整顿中，对李九莲要求平反问题定为反革命翻案活动，属敌我矛盾，李九莲判刑十五年

1973年5月李九莲开始上访，1974年4月4日，李九莲开始贴出《反林彪无罪》等六张大字报。并得到朱毅等人组织的“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支持。

1974年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即使按照1972年6月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见，李九莲要求平反也是应该的。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此时却抛开反林彪问题，抓住李九莲其他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无限上纲，说“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则是完全错误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一些遗留问题，又要稳定大局。不搞大字报上街、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应该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加以引导。

江西省、赣州地区的领导对“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一开始就采取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的错误方针。

由于矛盾双方都采取了对抗的行动，使得矛盾不断激化、升级。

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全国推行“全面整顿”，对李九莲一案的处理再次升级。

这实际上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怀恨在心，借机进行报复，坚持错误，不肯悔改。

（四）十月政变后，对李九莲以反华罪名判处死刑，“李调会”被定为“帮派体系”

1977年初，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12月11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反对华国锋、对邓小平“不恭”而被判处死刑。

1978年4月30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因书写“打倒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1978年7月2日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事实证明，李九莲、钟海源是在十月政变后，以反对华国锋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的。李调会成员二十四人是以“帮派体系”成员罪名，分别被判处五年至二十年徒刑的。

与此同时，在全国，因反对华国锋而判处死刑的有五十多人。因涉嫌“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骨干”而被捕入狱、判刑的若干万人。

（五）华国锋下台后，群众要求平反，官方不肯平反，最后羞羞答答地“平反”

群众以李九莲反林彪有功、反华国锋无罪，要求平反。

江西以李九莲造反有罪、翻案有罪，紧跟“四人帮”有罪，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不肯平反。

胡耀邦以李九莲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说明了其本质是好的，反对华国锋、对邓小平不恭是受了极左的影响，同意平反。但强调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最后结果，地方法院答复：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处理李九莲一案的历史过程告诉人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2008 年 3 月 13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7 日修改

第五章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批判省委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甘肃境内，以大中学校和铁路系统职工为先导；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随处可见。

从中旬开始，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5月20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文化革命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兰州大学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张，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

一九六六年六月，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就掀起一次斗争高潮，

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

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

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批判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

当日下午，江隆基去世。（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

（1978年1月26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一九六六年六月，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八月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革联派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汪锋呈报中央撤消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委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

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裴孟飞死。（文革后平反。）

红联派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汪锋被红卫兵追得无处藏身，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兰州“造反”群众组织红联派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三）不要出宣传车；（四）讲要派代表提抗议；（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针对革联派红卫兵横扫“四旧”造成的破坏，省人委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提出，凡属于中央、省级、县级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妥善保护，不要使其遭受破坏和损失，省博物馆、县（市）文化馆等事业单位所保存的历史文物或文物展览，目前一律停止开放。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成立了“工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甘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被兰州铁道学院“造反派”揪到该院批斗。

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一些领导人被兰州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轮番批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找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到西山去，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洗恒汉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洗恒汉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他，只是叫他们转好思想弯子。洗恒汉回甘肃后如实向张达志作了传达。

洗恒汉和张达志统一思想后，他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立据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甘肃省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 3000 余人，组成 200 多个“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地进行“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委会议的精神，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政治部副主任张 X X 就带头贴出大字报，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洗恒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洗恒汉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字报出来后，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 X X 同志站出来了。

在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 X X 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军区决定由张 X X 接替李虎担任文办主任，王 X X 接替高维嵩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

对洗恒汉和张达志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要洗恒汉交待同贺龙的关系问题；批判洗恒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派们给他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洗恒汉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竟一头栽下台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铁路工人群众组织“火车头”成立。

二、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宣布夺甘肃省委、省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两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查封。《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今后“文化大革命”实行分口分级管理。（一）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主管，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由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二）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省委文化革命接待室及外地师生接待站；（三）撤销农村社教办公室、城市社教办公室及城乡社教委员会；（四）按照工业、农业、文教、大学、财贸、党群政法及综合 7 个口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分别管理所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兰州 34 个“造反”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

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瘫痪。

此后，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号召“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红联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火车头”手中。

红联开除了肖泽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红联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三月，红联又开除了“红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驻甘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陆续进入全省厂矿、农村、学校，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任务。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 3 月 11 日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兰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驻兰州部队指战员 15 万人集会游行，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兰州地区革联与红联两派群众组织在甘肃日报社发生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打倒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均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兰州地区一部分群众组织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了办公室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二至五月，在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的支持下，“火车头”一派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不斗汪锋；

开除“七·一”战斗队；

开除“红战”；

把矛头对准军队；

又结合了王世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从“红联”中杀出来，另行组织了“红三司”。

从而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

“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三、中央发出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军委让洗恒汉回到兰州，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洗恒汉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

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与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洗恒汉和张达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洗恒汉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说：“张、洗是老实人！”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洗恒汉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他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他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洗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甘肃省军

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峰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照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兰州军区党委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

（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

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

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楼，并静坐至 23 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 4 万多人参加。

兰州一群众组织从是日至 30 日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并静坐“绝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市政府副省、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兰州军区发出第 5 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间，冼恒汉和张达志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你们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

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的具体指示，杨嘉瑞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到北京。

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去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压企图让中央改变五月十四日的四条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一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彻底改正错误，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同时也通知胡继宗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座谈会 7 月 22 日结束。

甘肃军区的不少人，还是错误的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要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汇报情况。

康生，关锋，杨成武，在几次听汇报当中，都曾多次指出詹大南的错误，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觉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首长甘肃领导同志

康生说：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一百天之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红三司成立），他们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甘肃二月五日到十日，五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

康老讲：另一个唯我独尊，不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二月十日，开除了肖泽民，十八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康生、关锋、杨成武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人，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

康老讲，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

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后，参加的人开小会，帮助詹大南进行检查，座谈回去以后怎么办，写出了纪要。并由康生和关锋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甘肃省领导同志

康生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

康生讲：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龙炳初、张忠等二十名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在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并直接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主席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家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端正了方向。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对于今后如何把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了充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

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洗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竟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洗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大家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张达志、洗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

组成了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兰州部队组织游行，支持武汉革命群众，反对陈再道。红联派一些人冲击流行的部队。

红联派联合革联派，企图打垮“红三司”。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兰州地区“群众组织”之间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召集各派组织商谈制止武斗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1967. 07. 29; 中发 [67] 229 号

呈主席批示

林彪七月二十九日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

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央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中央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甘肃省军区和当地驻军，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和《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并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此件连同《纪要》可发至连队和人武部干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中央转发甘肃纪要的批示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康生等人接见甘肃到会人员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转毛主席批准关于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一事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关于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冼恒汉回到兰州。

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决定：

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

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

陕西省由当时的 21 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

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

对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

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

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提出结合裴孟飞。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甘肃省军区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命令》：（一）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参加武斗的，由军分区和县、公社人民武装部立即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二）凡农民进城参加武

斗的专、县、军分区、人武部要立即查明原因，对策划的主谋者，严加追究；（三）军分区、人武部与当地驻军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甘肃日报》发表《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集中力量搞好三秋》的社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革命大联合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600余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甘肃省学校系统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兰州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

此后，各学校陆续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许多学校废除了教导处、教研室，取消了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将师生接班、排、连、营建制编队，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做法。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枪支等武器，致死致伤多人。

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洗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洗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兰州军区、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会见兰州地区第一批成立的 50 个基层革委会成员，要求革委会成立后，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甘肃工业大学 1966 届全体毕业生向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发出倡议：知识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兰州市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已经全部开学，绝大多数学生到校上课，各类中等专业学校也相继开学。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甘肃省第一个县级革委会——临洮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兰州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决定由驻甘肃地区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兰州地区贫下中农、革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甘肃省完成首次承担的印制 50 万部《毛泽东选集》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兰州召开甘肃省基层革命委员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革委会建设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兰州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兰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全省 27 个劳改单位也同时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某月，兰州军区常委讨论王、张案。

洗恒汉参加过两次会议。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兰州地区 10 万人誓师大会，“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吴金功任主任，王立有(解放军代表)，王莘夫、杨平定(学生代表)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洗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

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冼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付主任。

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由 105 名委员组成。革命委员会包揽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

是日，兰州 25 万军民集会，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 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五、甘肃省狠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了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以工程师的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并大量偷拍禁区照片的间谍案。

同时，还发现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彼德·迪卡特(西德人)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

15 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治·瓦特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宣布把彼德·迪卡特立即驱逐出境。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医疗卫生工作队队员去农村进行医疗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甘肃省革委会上报下发常委会议《纪要》，说“以裴孟飞为总头目的刘、邓第二套班子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又出来同我们斗争了。这个斗争由来已久。斗争的实质是谁掌权的问题”。

随后，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省革委会召开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誓师大会，要求各单位“要集中目标，集中火力，狠揭狠批，穷追猛打”。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兰州地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誓师大会。兰州地区第一批 1200 余人参加的“6 . 26 ”医疗队分赴农村、牧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白彦博任主任。冯国政(解放军代表)、陈启荣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四月，省级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甘肃全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接着追查“5.6 反革命阴谋集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全省审查干部达 30 多万人，原中共甘肃省委 19 名常委中有 8 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洗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决定从原省级机关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抓革命，促生产，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铁道学院、兰州医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 8 所高等院校及一些科研单位，领导“斗、批、改”运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由 105 名增加到 125 名；常委由 24 名增加到 35 名；增加王国瑞、朱培屏、谢金胜、李宗虎、李荣山、年继荣、陈建兰、高明芳、单秀为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兰州市首批 600 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全省 11 个专区（州、市）和 82 个县（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甘肃各地普遍建立“五·七干校”，全省先后有 1.1 万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或农村劳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民勤、甘谷、庄浪三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强调学大寨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

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向一切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甘肃省会宁县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后，甘肃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甘肃还“动员”大批职工家属下到农村。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关于电影《红河激浪》的调查报告。

称《红河激浪》是“反党分子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翻案的反党影片。

（1979年9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宣布撤销这个报告，为《红河激浪》平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美国间谍特鲁茨·封·汗林德（西德籍）有期徒刑10年。

特鲁茨·封·汗林德于1965年10月来中国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分为掩护，窃取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结束。

会议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求到 1970 年上半年，原有县以上城市卫生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的 50% 以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要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到 1970 年底全省农村达到普及，要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到 1970 年底每个大队要有 2--3 名“赤脚医生”。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并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 1964 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兰州军区派出了军队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 1969 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省金属材料公司干部袁自立、胡森成、刘显昭向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干部分配中存在的任人唯亲和派性问题。

省革委会以“攻击红色政权，攻击四个面向”的罪名，把三人打成“反革命告状团”。袁自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刘显昭自杀，死后又定为“叛党行为，清除出党”。

（1977 年 11 月 2 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给予彻底平反。）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第一批 2000 多人，分别到酒泉、金塔等 22 个县开展工作。

8 月 15 日，又决定派第二批 5000 余人，分别进驻敦煌、民乐等 22 县。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航天基地发射成功。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冼恒汉、皮定均、胡继宗、徐国珍、张忠、王国瑞、朱培屏、李书茂、龙炳初、胡定发、姚树荫、白明、商进

生等 13 人组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洗恒汉任组长，皮定均、胡继宗任副组长。

是月皮定均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〇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甘肃省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

一九七〇年，全省粮食生产达七十三亿斤（一九六九年前，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一九七五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

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六、甘肃省的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西北小组会议。

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

下午洗恒汉刚到会场，就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

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

洗恒汉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邓大姐、董老留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中共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开幕，17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 1098 人，代表着全省 43 万多名党员。

会议通过了洗恒汉代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的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68 名委员和 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

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洗恒汉为第一书记，皮定均、胡继宗为书记，作出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整风的决定》。

大会闭幕后，陆续增补宋平、张忠、年继荣、秦彦章、禹贵民、茅林为书记。

（1972 年 7 月 5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宋平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半夜给洗恒汉打电话，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

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他说：“洗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

洗恒汉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

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洗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

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

1971 年 1 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洗恒汉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 10 月 1 日不出铁，他俩从高炉上跳下去。

洗恒汉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 月 1 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

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做到了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

（宋平在 1978 年省党代会上也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 25 日至 30 日在兰州召开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

根据会议精神，甘南、临夏等地对平叛和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有步骤地作了处理。对绝大多数因被骗上当或裹胁参叛而被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宣布平反纠正；对错没收财物的，酌情退赔或救济。

（1983 年，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再次进行了复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 6 所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11 月 14 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分批撤出驻校工宣队、军宣队；高校各系一级不再成立革委会。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对甘南州委《划定资本家成份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对可划可不划资本家成份的坚决不划；对划定为资本家成份的（不含反动资本家），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尚未划定资本家成份的城镇，暂不划定。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五·七”道路育新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实行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公、检、法），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国营 404 厂、504 厂、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撤销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担任地方党委和革委会主要职务的暂缓撤离外，其余调回原部队。

一九七三年八月，洗恒汉参加第十次代表大会

洗恒汉看不上王洪文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中央副主席，他和其他很多人思想都不通。

周总理亲自做他们的工作。

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江”、打过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大寨走过的路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 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 23 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一九七四年六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1800 多人毕业。

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追悼会在兰州举行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全省高等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提出“要发挥工农兵上、管、改的作用”，“要充分估计高等院校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的严重性”。

六、甘肃省的全面整顿、反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

洗恒汉表示坚决拥护，他在常委会上说：“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派黎光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被黎光和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

黎光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甘肃省委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

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洗恒汉，叫他出面解决一下。洗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十七日，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洗恒汉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会上既没有汇报，也没有让甘肃省委谈意见。有关领导人说：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

中央把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洗恒汉看，并让他修改。洗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

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洗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洗大胆修改。

国务院联络员要洗恒汉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洗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说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一时，王洪文等人在北京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肯定了洗恒汉的意见。

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纪登奎和万里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洗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纪、万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洗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纪、万亲自同赵滔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

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洗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洗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

（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 1982 年 11 月给洗恒汉作的审查“结论”中说，这是洗恒汉“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洗恒汉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到兰州。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

（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全省 3.9952 万所各类学校，正在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教育界、科学界，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严重的影响；“铁道部以万里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兰州铁路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此后，《甘肃日报》连续数月，发表刊载了大量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三月，国务院文化部遵从江青指示，派人来到兰州铁路局，在省上配合下，创作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战长年》和电影剧本《主要战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兰州市七里河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庆祝大会。

七、十月政变后清查“洗家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洗恒汉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

洗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

华国锋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 2 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

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冼恒汉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

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

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

冼恒汉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

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

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兰州地区揭批江青集团万人大会。

会议特意安排兰州铁路局的赵滔、张恒云发言，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华国锋又把冼恒汉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他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他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

洗恒汉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直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

刘建勋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洗左右为难。在中央开会时，洗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华国锋对洗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

洗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他的信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以后，叶剑英曾经两次指示洗恒汉，让洗给青海的领导人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洗恒汉思想不通：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洗恒汉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他们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赵永夫获释时间不详，平反结论说：他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9日逝世。）

一九七七年六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洗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洗恒汉的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洗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洗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洗恒汉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刚才，听了洗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洗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洗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洗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

（洗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

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

（洗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

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

（洗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洗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洗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洗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洗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

（洗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

（洗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

（洗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洗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

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洗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洗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洗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洗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当然，对洗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洗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洗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洗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

（洗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师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

……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洗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

（洗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洗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

（洗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

（洗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洗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

（洗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洗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洗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洗恒汉同志，对洗恒汉同志是爱护的。

（洗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最后，中央的结论是：“洗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洗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洗恒汉当场表态：完全拥护。

中央决定后，洗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 3 0 1 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发出：“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韩先楚、肖华、宋平回兰州后，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洗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洗恒汉被扣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

在“结论”中强行划定的所谓“洗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支左”的人员。

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洗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他们被定为“洗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例如：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

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藺进生和曾给洗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洗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

军区副政委高维嵩，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洗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军区副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一九七八年，兰州军区党委发“四号”文件，说洗恒汉“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给王X X摘掉了帽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军委决定让洗恒汉回兰州最后解决问题。

余秋里洗恒汉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人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洗恒汉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他说话。

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洗恒汉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把他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就连他的孩子们来看他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他谈话说，他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

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他进行严厉审讯、逼供，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他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关于洗恒汉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其中说：“洗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发关于洗恒汉《免于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大意是：中央决定，洗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

一九八四年六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洗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

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贰、本节简论

看了甘肃省的文革资料，对甘肃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得到几点看法：

一、甘肃省的文革进程与全国大致相同；

1966年5月至8月，甘肃省委一些人执行了错误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打击一大片；

1966年8月至12月，广大起来革命群众、干部起来批判甘肃省委的错误；

1967年2月，以红联为代表的革命群众组织宣布夺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权；

1967年2月以后，红联内部发生分歧，甘肃省军区支持的一派打击不同意见的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造成内部分裂；

1967年5月，从红联中分裂出来的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红三司，省委代理书记胡继忠表态支持；红联与红三司之间矛盾激化，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把矛头指向兰州军区；

1967年5月至7月，中央着手解决甘肃问题，下发《关于甘肃问题》、《兰州军区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等三个文件；

1967年8月至12月，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精神，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三结合；

1968年1月，成立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社会稳定，抓革命促生产取得比较显著成效：

1，甘肃省在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扩大化的倾向，打击面过宽。

2，甘肃省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涉及的人和事不多，作了一些政策调整，社会比较安定。

3，甘肃省在全面整顿中，没有大的反复；主要是铁道部在兰州铁路局支一派压一派，翻了一次烧饼。

4，甘肃省在反右倾翻案风中，主要是根据中央华国锋等人的指示，在兰州铁路局把整顿中颠倒了的是非又颠倒过来。

5，甘肃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完成了一批国家在建的重大项目，如刘家峡水电站、酒泉钢铁厂等等。

总的来说，甘肃省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属于搞得比较好的，上面的中央和下面的干部群众都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省，管辖这样一个省的兰州军区，在这个省支左的部队，十月政变以后，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三、十月政变后，在兰州军区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洗家帮”

1，清查“帮派体系”的原则；叶剑英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叶剑英说的这一条原则，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党性原则，而是资产阶级的派性原则。

2，清查“洗家帮”的根据：所谓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的问题在于：洗恒汉得罪了政变集团的几个主要人物；

(1) 洗恒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甘肃省传达中央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精神的会议上，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尽管他是请示了华国锋的）；

(2) 洗恒汉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召开的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在华国锋看来：“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

(3) 洗恒汉在一九六六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叶剑英多次要他为赵永夫平反的指示。

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叶剑英；这三件事就证明了洗恒汉“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

3，清查“洗家帮”的将帅：在清查“洗家帮”这盘棋中：

(1) 韩先楚只是一个卒子，由于他在林彪一案中沾了一点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中又失去了三个第一，这一次他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充当了急先锋。

(2) 肖华是被派去的解决兰州军区问题的钦差大臣，他由于自己的过失，丢掉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好几年了，难得有这次复出的机会，当然要大买力气了。

(3) 叶剑英才是解决兰州军区问题的主帅，军队问题还轮不到华国锋插手。

4，清查“洗家帮”的结果：

(1) 结论：站在“四人帮”一边去了，但还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

(2) 处理：免于刑事处分，提前离退休，降低政治生活待遇。

5，清查后洗恒汉的“冤屈”：

(1) 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内乱、灾难，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政策，但这是党中央发动的，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我作为一个军人，只有服从，只是一个执行问题，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

(2) 我对“四人帮”一贯看法不好，同他们没有非组织的私下往来，为什么说 I 站在“四人帮”一边呢？

(3) 我对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的态度，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为什么说我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呢？

从洗恒汉的自述：《风雨八十载》来看，至死，这些问题，他都没有想明白。可叹，亦可悲乎！

2008 年 6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7 日修改

第五章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河南省军区某些负责人镇压河南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有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

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

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

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派”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

会议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学生唐伟贴出大字报：《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

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五九、六〇年老帐？

这篇文章被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

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

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上报武汉军区党委，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

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

“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及“红刺刀”等战斗队，全面否定刘建勋，把“御用工具”的帽子扣到郑大联委头上。并提出“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一口号。（四月廿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提出要“坚决打倒刘建勋”，说中央表扬刘建勋是“不了解情况”，“受刘建勋的骗”，还把“打倒刘建勋的黑后台谢富治”的标语贴上了街。把纪登奎软禁了四个月。把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斗了一百多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上午，省军区调动大批军队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

打着欢呼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的旗号，联合郑州地区的保守派进行声势浩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上午，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

几日内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郑州市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
省军区指使人暗地记录参加游行的造反派组织名称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
“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镇压反革命了”。

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实行了大逮捕，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军区不仅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闹天宫》独立纵队：《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得深思的问题》

文章指出：

郑州、开封、新乡、信阳等地有名的、斗争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新保皇派”和“反革命组织”；

极力排斥和恶意中伤被保守势力恨之入骨的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最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保皇势力大抬头，空前活跃，跳得格外高；“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

么》，含沙射影，恶毒攻击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抛出攻击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二十七个为什么》以后，河南省委的第二号人物纪登奎亲自“登门拜访”？

一些人口口声声喊着“炮轰省市委，火烧刘建勋”，而他们却在大街飞小巷、马路、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郑大革联”，“打倒党言川”之类的大字标语；

最近几日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二月一日上午也明目张胆地来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

一些人把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张耀东等隐藏起来，不交给全省革命造反派批、斗；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文敏生，长期住在河南省军区医院里，省军区却把文敏生保护起来；

郑州、开封、信阳等地的驻军和公安部队都直接参与了支持保皇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河南省军区在元月三十日上午调动大批军队，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最近几天省军区扣留和大批逮捕郑大的学生；二月二日郑州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时省军区不予支持。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

“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镞压反革命了”。

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实行了大逮捕，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河南问题的批示

（当时冲军区）

毛泽东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郑州日报》问题的批示）

准备查封军管，时机宜迟几天，让骂解放军的多骂几天，然后左、右两派各派数人来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 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
- 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
- 三、接管后停刊几天；

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五时三十分

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各方代表谈判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河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何运洪当着干部的面说：“谈判我还不准备去哩。去不去由我哩！过去没犯过错误，这次霍上犯个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驻开封的部队野战军一军开枪打死群众

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开了八枪，军队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在全省展开了大逮捕

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何运洪、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一次就捕二百多人。

并指使人整理了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革命组织的黑材料，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进行大逮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杨 X X 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

杨 X X 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了！”

公安公社立即行动，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给陈再道、钟汉华的报告中说：“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

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两派协商名单的谈判

党言川去了北京，派史文华、王月亭作为郑大联委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何运洪、李善亭借口郑大联委主要负责人没到会，两次终断会议，使名单协商无法进行。军区支持的一派向中央报告说：“郑大联委毫无赴京谈判诚意，党言川无视中央、总理指示，拒不参加谈判，甚至提出要单方面赴京汇报，并已非法派代表赴京，致使会议再次终断，建议中央文革敦促党言川立即返郑。”

党言川从北京返郑到军区参加协商，何、李又要了说党言川延误与破坏谈判，向党言川提出两个条件：一、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印十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二、党言川开上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党言川不答应。

三月三日，第四次谈判时，何运洪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就这样，使赴京汇报长期终断了下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军区宣布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

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何运洪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会上，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伟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

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何运洪说：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是冒然的”“是有根据的”等等，

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对此，赵文甫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军区宣布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

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何运洪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上午，党言川被绑架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的同学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

党言川说：“过去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正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广播车大叫：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并强行冲入搜查并把党言川架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

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 50 名联委成员中 3 人被捕，10 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 人被斗，102 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 40—50 人，写检查 113 份，4340 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40 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
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毛主席 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军区付政委余嗣贵在大会上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还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

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

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蔚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后来查明，仅仅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的有七十多个。

洛阳地区上报给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有一百多个(实际数目远不止此)。

郑州市郊十个公社就被解散了三百四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桐树洼大队二十八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二十四四个。

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的成员，大批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

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调查，有名单可查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

二、中央解决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内，在郑州砸了河医东方红等十四个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十大总部要冲击二七派绝食现场，五月三日钟生溢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对某人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陈再道、钟汉华对制止武斗曾给何、李有指示，大意是，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谈河南问题

五月五日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开会。

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同志问谢富治副总理：“河南问题怎么样了？”

谢：“你们红代会支持的二七公社是对的。军区的作法是错误的。”

韩：“为什么还不解决？”

谢：不那么容易，中央文革现在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外省了。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它牵涉到军区问题，不能一下解决，何运洪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

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正在省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强行架到汽车上，“抢”到农学院，通过摆事实、讲形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被“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

“予农红总”和郑州大学附中“红旗”一些学生又把刚刚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处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夜，纪登奎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

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两派发生武斗，打死打伤千余人，有名单可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纪登奎说：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八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三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们，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付书记（原公安厅付厅长）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一百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打、砸、抢”，把造反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

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查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

（农学院李天祥插话：“军区又向学校派了工作组，军区宣布说，工作组是经过军区挑选的。）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 344 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赵文甫、杨蔚屏跑出来说：“形势很好。”杨蔚屏在前一段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这时他便说：“我死到棺材里也要记住这件事。”省委机关干部大部分过去了，戴苏理也过去了，还骂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大杂烩”，还要出来“三结合”。何运洪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什么样子？公安厅的权交给了保守派，造反派炮打公安厅是对的。“河南日报”社也是这样，还有电台。准备“三结合”的付省长李庆伟是支持保守派的。叛徒齐文俭过去带着日本人到处抓人，也被结合起来了。“三结合”净搞“中间人物”，搞到底全部来个倒退。法院结合了一个伪县长，公安厅把权交给了保守派，报社也是这样，生产指挥部结合的李庆伟支持保守派，齐文俭是个叛徒。谈判前应该悔改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来中央，要把问题解决一下，带枪的不好办。

总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

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二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四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4、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对军事院校的同志不能有任何歧视，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武斗你负责。郑州、开封大武斗要劝嘛！能劝下来？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十大总部”和“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都是为了摧垮河南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在这些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中，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高大同、王维群、王庭栋、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公社

省公安厅付厅长高大同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公社。

从五月到七月，河南省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据一份“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的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 47 人，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 23 人，占此级别干部人数的 49%；同情二七公社的 2 人，占 4.25%；中间状态 1 人占 2.12%；支持河造总的 15 人，占 32%；支持十大总部的 6 人，占 12.7%；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分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陈伯达谈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总理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关锋同志说：

军区的同志检查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二、是不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

杨代总长：

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

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天津市防疫医疗队造反总部赴豫医疗队《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总理：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条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一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

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 94 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你们双方打电话，不要讲下去，算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黑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許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戚：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

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

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

么都正确，说你们这，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

第三，方法不对，所谓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二七：有）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代表的谈话

戚：河造总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是杀出来的，我的看法，你们都是造反派组织，但你们有错误，后来你们在军区问题上盲目支持军区错误的东西，军区在支左是错误的。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关于不准占领郑州邮电大楼的指示

〔六月二十八日晚总理联络员李杰同志传达〕

郑州邮电大楼是重要交通电讯枢纽，一旦中断，严重影响国内国际斗争，工作甚巨。不管那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必须确保该机关的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准随便占领和干扰，更不准打、砸、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六月六日通令执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何运洪：这次来京，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而且长期不承认，不觉悟，不改正，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经过中央首长的帮助，吸取了革命造的派的意见，才使我清醒过来，军区犯错误的责任在我，是错误领导的结果。我是有罪的。现在我向中央首长，向革命造反派检查错误，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中央指示各派赴京汇报。……

对二七采取了压垮、拖垮的办法，这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公开与毛主席思想对抗。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非法组织，起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流毒”。让他们上街请罪，军区接待站不仅不制止，还压制，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二、三月抓一批人，是从郑州开始的，被抓的大部分是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党言川也被关押，压制群众运动，破坏了“四大”的正常进行，此影响在全省造成恶果。造反派被打下去，保守势力抬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四月底传达了林总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省问题的决定，军委十条命令，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并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主观盲目自满，自以为正确坚持错误，把当时二七公社向我反抗当成是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操纵下的翻案妖风，所以四月十六日又重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并且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还登了报。打击了郑大联委，我们越来越被动，直到五月二十日才撤消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根本搞错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骄傲自满，不爱听不同意见，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徐文礼（一军）：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错误地提出了口号：“打倒八·二四幕前幕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二·八事件看得太严重了，军队开了五枪，还有三枪没查出来，打死一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 294 人到现在还有 15 人未放。三月十四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八·二四”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

第一、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省委负责人和各派组织，对刘、文、纪三人要作具体分析，

第三、对河南军区的要求和希望，要把立场和观点转过来，主要的在于领导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干脆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就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戚本禹在河南部队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检讨很快同群众见面，中央一批时间就不会长了。你们要做好部队工作，不需要层层作检查，主要是你们作检查。部队和二七公社对立情绪这样大，主要是你们过去宣传灌输的结果。如果这个工作作不好，就会出现内蒙的情况，就会有象张杰这样的人鼓动群众来北京。内蒙有人鼓动，四川也有人鼓动嘛！对你们河南，中央是有准备的，准备你们来十万人，别的省也可能来一些人。昨天告诉傅崇碧同志，准备一百万人的接待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戚本禹与河南省三派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及两个附件

1967.07.10； 中发 [67] 216 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

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附：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周总理：

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

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工作中虽然犯了某些严重错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当时在全国来说，都程度不同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要看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到北京工作，对自己错误作了认真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个革命的领导干部。

陶铸提议把刘建勋同志调到北京加强北京的工作，中央同意了。陶铸就利用刘调到北京的机会，把文敏生搞成代理第一书记了。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小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的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彭、刘虽然不在幕前指挥了，但他们是后台，下边出来搞，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揪住不放。后来刘建勋同志调进来，也是揪来揪去，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看了你们的检查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刘建勋接见河南各方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同志座谈纪要——供河造总战友参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江青同志：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

康生：

我建议明天一天，核心组要搞出协议来，这个问题本来今天就明显了，刚才有个同志写了嘛，主要是达成协议和贯彻执行协议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一）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查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这样五条建议，请你们商量，看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赞成，你们就回去平心静气搞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声明

在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先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错误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在全省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許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压制了群众运动；社会上出现了摧垮二七公社组织、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等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特别是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所作的重要指示，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毛主席、党中央二月要我们组

织各方代表赴京汇报的指示，中央四月关于安徽问题的五条指示，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自以为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二七公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二七公社，并且还压制打击了支持二七公社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豫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这就错上加错，越陷越深，给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些错误应由省军区党委常委、主要是何运洪同志承担责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总理：

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全国。林副主席说，武汉的问题，值得全国各个军区学习。大家来了，听到了呼声，不仅是北京、上海，而且是全国。实际情况你们看到了，明天报纸就出来了。只有毛主席的威信，林副主席的威信，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出现另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河南省军区党委有个检查报告，在北京起草，在郑州修改的，意见是否一致，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听陈桂昌同志讲，郑州连印的地方都找不到，河造总、八大总部不让印，当然不是广大群众，只是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头头，也不是所有

的头头。在武汉有些传单、海报纯粹是造谣，说要王力同志留武汉是让斗争的，有些保守组织的头头就是靠造谣吃饭的，这能吃几天？

康生：

那天晚上武汉事件发生，毛主席、林副主席讲，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解放军有很大教育意义。我们本来很希望省军区表示态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但没有得到省军区的反映。那一天晚上何运洪同志装病没有去。那么紧急的事情，何运洪不到会，我很不满意。我事后检查，何运洪没有病。对武汉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你们的正式决定和声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四天了，没有见到你们表态，到底为什么？不表态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表一表。你们军区直属武汉军区，你们过去的支左工作，支左方针，实际上是执行武汉军区那一套。

武汉问题的关键：

一个是部队的少数人拿他们的错误路线去煽动欺骗干部战士，八二零一部队的少数人表现很不好。这能怪战士吗？战士是好的。这一点河南军区要检查一下你们作得怎么样。最近十大总部、河造总开会有军队参加。四、五十人穿便衣，郑州市人武部的干部穿便衣指挥，这是玩火，玩火要烧到自己的。

第二个是利用公检法。从全国各省看，有的利用公检法干了许多坏事。武汉利用公检法镇压造反派，河南这一条从省里一直贯彻到下边，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教训。这次会议上，我们批评了公检法，他的代表就回去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公检法又翻了，可能要打倒我和戚本禹同志。何运洪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不参加会议，公检法恰恰在这个时候翻这个案。何运洪利用公检法，丁石、赵文甫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捉多少人，你们没有实际数字，连党言川也捉了。

第三个教训是利用人武部。省军区支持军分区犯错误，分区有没有支持县人武部？人武部有没有动员农民进城的？武汉少数犯错误的同志利用百万雄师把三新、三司、二司、三钢、工总等造反派压垮，河南利用十大总部、河造总把二七公社全部压垮。

第四个教训是利用地方机关的保守派。河南非常突出。河南省委省直总部实际上是保守组织。刘建勋、纪登奎有错误，但还是好同志，你们去搞。最坏的是

赵文甫，你们支持他，他支持军区。利用这个组织去打垮那个组织，河南和武汉是一样的。

因此，河南有武汉事件重演的可能。同志们要认识清楚，从武汉事件吸取教训。这个会议上，大家要好好把观点摆一下，把思想统一起来，不要讲的一套实际行动相反，言行不一致。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坚持错误，长期不改，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提高思想认识。在这里两个月，河南问题实际没有解决，所以经过这次会议希望能得到很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给驻开封七二四九部队的指示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时，七二四九部队靳师长电话传达：

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报刊公开称“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康生：

中央对河南问题已经有个批示，同志们已经看到了，新来没有看到的同志，可以发给他们看一看，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中央在批示中讲，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高呼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

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们通过后报告中央。对刘建勋同志，中央批示中也讲到了，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二七公社”文章：《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河南省军区机关《秋收起义战团》全体战士：《坚决打倒何运洪、李善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三、中央决定后河南的新形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刘建勋对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服务员的讲话

（一）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对待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问题。

（二）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的。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对于“文攻武卫”问题，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出来的，江青同志把它肯定了。当时，何运洪勾结文敏生、赵文甫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保守组织，挑起武斗，围剿、镇压赤手空拳的革命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是完全正确的。

（四）防止“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问题。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胜利了，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防

止骄傲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刘建勋王辉时的指示

现在有些人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与党中央看法不同，请你们很好地看看九月一日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恩来对开封武斗问题的指示

（九月四日晚九时以后，老保先后对我仪表、空分、阀门、拖电等厂进行骚扰袭击，叫喊要消灭六零九三和造反派，并冲击我高压阀门厂，使用黄色炸药。一军杨政委和杜副军长先后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九月五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河南省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组周成继同志来电：总理很关心开封问题。总理指示我们向老保明确指出：）

“必须立即停止进攻，放下武器，得到保护。消灭造反派和驻军是反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驻开封部队的电话指示

〔时间：凌晨一点十分〕

把九月五日的命令，读给他们听，劝说他们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毛主席的最新的最高指示。不准夺枪，不准抢劫火车，这样作是不对的。

可以告诉他们，双方派代表，组织双方谈判。把武器封存起来，不要再继续武斗了。如果开封谈不成，可以派一定的代表到郑州。如果郑州解决不了，可以到北京。应当就地停止武斗，就地谈判。总之，不要再在那里搞紧张局势，不要再继续武斗。要他们坚决执行命令，维护命令，执行最高指示。作耐心艰苦的工作，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如果发生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吴法宪在武装干部会议河南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康生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毛主席视察河南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毛主席乘专车到达郑州，火车停在飞机场。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毛主席离开郑州。毛主席在郑州共停留一天多。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同志。下边是刘建勋同志传达毛主席接见他们时的谈话纪要：

（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

毛主席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毛主席笑了，向着纪登奎）

毛主席说：“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刘建勋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

毛主席说：“何运洪那么厉害！何运洪干的好事！”

（当刘建勋汇报到调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

毛主席说：“集训也得去好人。”

（当刘建勋汇报到开封情况时）

刘建勋：“我们主张作政治工作，不打。”

毛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作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刘建勋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打抢、有时打死人时）

毛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都起来反对就收场了。”

毛主席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主要从理论上把他们批倒。”

毛主席说：“对。”

九月二十二日，当毛主席听完刘建勋同志汇报了河南的情况时后，陪同毛主席视察的张春桥同志又传达了毛主席沿途指示精神，内容（并非原文，刘建勋同志根据张春桥同志讲话整理成为四条）如下：

一、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七个省，基本上解决了八个省（包括河南、江西），争取今年再解决十个省，南方五个省，北方五个省，一共二十四，黑龙江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不能垮，是要支持。文化大革命七、八、九三个月大进了一步，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要纳入轨道。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级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糟？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都不要一棍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北京开武装干部会，不好的去，好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去，左派也要去、红卫兵也要去，红卫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训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教也不能诛。扩大教育面。主席在上海讲了几次，并在许多省都讲了，中央文革也认真讲了的。

三、大联合的问题。那条语录（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七月十八号主席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个话没有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主席反复讲这个问题。七月谈过、八月也谈过，在上海把这条语录给工人讲了，很灵。上海大联合的高潮就是主席这几句话搞起来的。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张春桥同志讲：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要工人来左右局势。因为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吗？”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要让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主席讲：“上海军、干、群三个方面的关系比较好。”主要是经常进行整风，三方面整风。这是以军队为主，下次以群众组织为主，依次轮流，请别的方面代表参加。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不再召集。

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说，绝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资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有些官做大了，坐汽车了，房子好了，工资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脱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刘建勋同志问：北京五·一六是什么意思？

张春桥同志讲：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它有三条：一是反中央；二是反解放军；三是反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后一段，关于革命委员会，就是主席亲自加的。

（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7年10月29日，第35期，第二，三版）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刘建勋在接见河南省郑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纪登奎在河南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有些人对形势估计很悲观，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等。把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到处“反复辟”，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在他们看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了，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错了。有的说：“现在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还要大乱”。

极“左”思潮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群众。他们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发展山头，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在干部问题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极“左”思潮的风，在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宣传以后，刹了一下，但是思想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有人主张要无条件地联合起来。还有些人搞翻案风，不管过去处理的正确不正确，把多少年前处理的老案子翻出来，把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子翻出来，把民主革命补课来个“彻底翻案”。

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县打内战，总有二十多个县吧！并且还有一种“内战不可避免论”，说什么“内战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前一段有一股极“左”的思潮，有一个学校发表严正声明，炮轰建勋同志和我，炮轰警备司令部。我到他们那里，我说，你批我们支持庆祝风，这个意见是对的，今后那里开庆祝会都不再去参加了。说我们没有抓大批判，这个意见是对的，我们今后要抓大批判。同志们批评对的我们都接受，都改正。至于对形势的分析，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呀等等，我们就不能同意了，你们可以保留意见，允许你们慢慢转。

有一个地方造反派分成了两派，一派先开枪打死了人，是没有道理的。解放军给另一派做工作，说他们不对，不要去报复，我们负责解决。但是另一派不服气，他就上去把人家围起来，又打，又抓，还说人家是“反革命”。这样搞就麻烦了，他比人家搞得还凶，本来有理的事情，你去压人家就没有理了。

现在河造总起来了，起来是好事。起来，我们就本着中央讲的精神，看一看他们的表现。他们现在贴出来了很多大标语：“支持戴苏理”，“纪登奎靠边站”，“打倒王庭栋”，“批判陈桂昌”，等等。还有“河造总越战越强”，“河造总是顶天立地的造反派”，“河造总好得很”，“河造总要起来抗暴”。他们在前一段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无条件的联合，不联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现在有的地方是学生领导一切，中学生领导一切，他们说了算数。这种情况要改变。大联合中要做工人工作，按系统把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在郑州，我们整整奋斗了两个月，现在联合起来了。总之，加强工人的工作，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发挥工人的主力军作用。有一个地方连第一线指挥部的指挥长也不要解放军当，要中学生当，那怎么会行呢。

省里准备成立筹备小组，条件成熟的地、市、县也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谈河南两派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郑州铁路造反派及各地在京铁路系统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郑州铁路局代表时的讲话

本来中央的批示已经写好了，准备用，用四个名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全国，现在看到你们这个协议，批示要修改了，如果你们回去要打仗搞分裂就不批了。如果回去确实搞的好，中央再批发，通报全国表扬你们。如果你们不执行协议我还要通报全国批评你们。今天我在中央文革开会还称赞了你们，但在会上听了你们的发言，看出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只管郑州，不管别的地方，郑州通车了，别的地方车不通了你怎么办？回去不要再发展组织，再发展组织就要闹磨擦。回去开会要双方共同开会来庆祝。军管会、省革筹小组可以去人参加，现在我不是对你们各打五十大板，还是看你们回去后的实际行动，已经达成的七个协议都算数，回去要努力实行。今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尖锐，不这样讲，刘建勋、王新同志回去为难。当然我对毛主席大联合的方针是无限乐观的，对群众也是相信的，但具体到一些基层单位和某些问题上就不一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郑州铁路局系统七个单位和西安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这是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私，批修”的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在河南，陕西境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铁路军管会（军管小组）和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

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夺取革命、生产的双丰收。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是已经联合的（如广州铁路局、柳州铁路系统），或者还没有联合的，中央也号召他们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达成类似协议，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就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及西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 7 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 14 个局（全国共 18 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刘建勋对河南两派谈周总理的指示

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六十六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 393 人，已解放 284 人，占 72%，其中第一把手 31 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王新向河南省大联委传达中央首长七点指示精神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5；中发 [68] 17 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地祝贺。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九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南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局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担任常委。

河南省有五千万人口，有许多现代化工业，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的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五、河南省的反右、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群众觉悟了。现在“革”与“保”的概念过时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主要表现是公与私的斗

争，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否则，就要落后，就会犯错误。

目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迅速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极大障碍。这是两条大毒蛇，被它缠住身就不得了。它腐蚀人们的斗志，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文化大革命。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灭亡，正在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刮翻案风的人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杀了一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

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么？！

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手了。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查，我不讲了，我的错误我作检讨。

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门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别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明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的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了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出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他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错误，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

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去年八月，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一男一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谣言。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

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零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

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一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一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通讯员《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

新的组织机构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军代表十二人）。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人员除参加革委会办公的以外，一部分留机关搞斗批改，一部分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工代会主任申茂功：《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党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全会发表的公报，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有的人说：你们光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指责人民解放军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革命委员会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省直机关集中了一万多人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下一步还要搞整党。工人宣传队一开进去，就出现了一种谬论，说工人阶级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普遍的矛盾。有人造谣说压了“红色公安”，压了造反派，解放军把“公安公社”的头头启用了。我这里负责声明：这完全是造谣，全部是造谣！有的人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头脑膨胀，利用种种借口，对抗工人宣传队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有个单位揪出个牛鬼蛇神，有人竟说，他在“二月黑风”中路线站对了，为什么你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工人宣传队进到一个学校，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他那里就写社论，说是否定了路线斗争。

上次开会，有的同志讲，有七个县少数中学生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按自己的意志左右革命委员会，一切都得服从他们，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当时说，这些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如果让他们掌权，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句话触怒了那些搞独立王国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到北京去澄清这句话，说刘建勋讲错了，问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掌权？

有的说什么“八月黑风比二月黑风还黑”，“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笼统提反复旧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新与旧的斗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红旗》四期社论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提出的“反对复旧”的，是完全正确的。笼统的提反复旧，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引向打内战。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

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我告诉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同志们看了那张大字报，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这个传单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公民，跑到安阳发表了一篇讲演，然后到一个煤矿去串连所产生出来的一支大毒草。

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复旧，我们第一承认，第二反对。我们天天反的，是要搞革命化的。但决不能接过革命的口号去反对“三红”，这是一个阴谋。有人指着鼻子问有没有复旧？我说有，经过斗、批、改，就是要反掉它。工人宣传队，就是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复旧，就是要破它，就是要破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新和旧的斗争还是存在的，一万年还存在。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嘛！问题是看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敌人借反复旧为名，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妄图一个早上把政权夺在他的手里。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他们说，你压制造反派。我们说，不是，我们压的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对于上了当的人，经过教育，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有些人作文章说我们是保守主义，责问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整党，不赶快吐故纳新。他们说：你们的党龄比我们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有的地方把革命干部都说成是“老油子”，“老狐狸”。他们说，老油子还不该进“五·七”干校？有人说所有老干部都要彻底清查。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们进来。他们到北京，造谣中央也镇压了造反派。

有人就扬言“造反派受压了”，“造反派受排挤了”，“这是对造反派没有感情”，“造反派没有掌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全面反复旧的问题，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三红”。这会引出什么后果？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这是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反“二月逆流”。

这是对当前形势看法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阶级敌人歪曲反复旧的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一个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一个是批判右的思潮，批判“不见得”派，要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增强军民关系，目标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谁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革命，形势发展的就快。项城县就比较好。有六十多个县属于这个类型，在那里毛主席的指示基本上能够畅行无阻；有三、四十个县属于一般；还有一、二十个县

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多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乡市革委会有些人是不敢斗争的，有个一般干部去宣布革委会对那个厂做的事件的态度，他敢于斗争。到了那个地方，又推、又揉、又揍，结果还是宣布了，无非是这样几条：一条是复旧是有的，但当成中心来反，一哄而起来反革命委员会是错误的；二是你们搞武卫队，不靠真理，靠武力统治，横行霸道，要立即解散武卫队；三是你这里是独立王国，不能整党，否则搞起来也是“派党”。有少数人不让他讲话，把麦克风夺了，可是他还是讲，广大革命群众鼓掌欢迎，少数人在角落里吹口哨、搓地板、跺脚。这个干部开始进厂时，遇到了刁难，不让他进去，说我们是保密工厂，又说是四机部的厂子，进去得经过四机部批准，后来又说得经过省革委、省国防工办的批准。这些理由被驳回以后，又说得经过工厂革委会讨论才能进厂。后来只许进去五个人，被围攻达四小时之久。

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有过一段造反历史，后来被齐林、王国佐这两个走资派拉拢腐蚀，给钱花，给酒喝，拍肩膀。说他是响当当，他就头脑膨胀，多次制造停车事件，周总理讲话点名批评后，我们进行了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人替他说好话，说他是老造反派。

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说是不是有复旧？我说：有。但是，谁要想转移大方向，掩盖这个矛盾，突出另外一个矛盾，说什么“反复旧是中心”，“造反派受压”，“革命派不香，保守派不臭”，这统统是阴谋。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在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

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党的原则？在你们县搞的乌烟瘴气。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四清积极分子受打击报复。四清运动中处理个别有出入的，可以在整党后期来处理。但是，你们支持翻四清的案，这是不允许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帮助他们克服错误思潮，执行毛主席“三不脱离”的指示，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王新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六、河南省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某月，河南省召开批林整风会议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河南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联系河南实际，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一日，河南省批林整风北京汇报会议

河南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参加了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

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 11. 04；中发 [1972] 42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七、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1976年4月初，临近清明节。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清明节这天，我当时所在单位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同志，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气愤之余，结合当时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小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现场观察群众的反映。当时看我们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十分拥挤，相比之下，二七塔下倒显得冷清起来。同时，我们的《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大字报，客观上声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反驳我们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厂传达室通知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来电话，让我们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我就是代表之一。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我们。他表情十分严肃，但详细地听取我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我们，他已将我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告诉我们，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我们没有作错。有的同志就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这个建议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

我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我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我们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看法。当时没有发生辩论，也没有阻拦。为保持花圈的原状，一车只装了十几个。本准备拉到厂里，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我们就直接拉着去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一位姓张的办公室副主任找来接待我们，怎么谈，就是不接受这些花圈。我们也就不和他废话了，自管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就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我们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和我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事后听说，省

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去告我们的状，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派部队支援我们。

我们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 厂等 72 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 4 月 6 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

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反革命的血腥暴行。这是 1976 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它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件”一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4 月 7 日晚，接上级通知，我厂党委/革委会集体收听中央台新闻，即中央决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央台的记者到场采访了我们，。在随后几天中央台报道各地拥护中央决议，声讨“清明节”事件的大规模游行中，其中有郑州肉联群众游行的电视镜头。在河南，郑州市革委决定将焦春亮同志追认为烈士。

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专政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事后知道，省委已将他们要判刘敬死刑的意见告知司法机关）。我们肉联加工厂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也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我们肉联这些人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

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

（直至后来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们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据说，连给焦春亮的年幼的孩子每月 20 元的抚恤金也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何远《尘封的记忆》2005 年 10 月 7 日）

八、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兰考抓的黑鬼却是张钦礼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一飞、周化民又首先拿张钦礼开刀。

运动一开始，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字报就是“保皇派”。

秦、周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给他打上花脸，当牛鬼蛇神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在反右派期间，由于赵文甫坐镇兰考，全县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打成右派。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组织部长王某。他们和赵文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张钦礼说，兰考的干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日时期的；二是部队转业的；三是土改时期的。他们对党并无二心，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事实，怎么突然之间都成了敌人？赵文甫批评张钦礼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是为右派鸣冤叫屈。张钦礼受到降级处分，从此“内部控制使用”。

在大跃进期间，张钦礼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一九六〇年，张铁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于十月二十八日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张钦礼恢复工作以后，焦裕禄被派来兰考，张钦礼与焦裕禄亲密合作。焦裕禄死后，张钦礼积极宣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

在四清运动期间，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某局周化民为副团长、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四清对象首先是县委机关干部，对准张钦礼。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这期间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特别是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铁礼。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小撮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焦裕禄

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请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

秦一飞、周化民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他们俩打报告，向省委要一百万斤粮食、一百万块钱、五百台八匹马力的柴油机补“窟窿”，被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当面批评一顿。

周化民说，“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

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看兰考人穷得俩人穿一条裤子。”

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人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动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张钦礼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

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一些人到兰考炮制出紧急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已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话通知不让印发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兰考革命派发出决不允许诬蔑焦裕禄传单

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土固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县委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月间，张钦礼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

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兰考县宣布开展文化大革命，保守派事先印好了攻击张钦礼的传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旬，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一些干部组织了所谓“卫东林”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

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见了X X X，X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要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月，兰考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斗争，又把保守派压下去，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二）造反派一月夺权，被军区逮捕入狱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革命造反派夺权，

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县武装部反说造反派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

造反派开会商议，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八日，晚，何运洪从开封派部队把县城包围了，来了三连人，老保带头逮捕革命派。

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把第一线全部逮捕了。

造反派派代表去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

部队派人来，说“你们是反革命暴动，我们是镇压反革命”。

造反派一万多人把三连人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还把司令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开卡车向外冲，造反派人多把车推得向后退，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

造反派问司令员：“你来干什么？”

他说：“支左的”。

问：“谁是左派？”

他说“不知道”。

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

他说是“执行任务”。

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

他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

造反派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

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人害怕了，不干了，说这是解放军，不同于保守派呀！；有的人说投降吧！还有人说，上北京告状，就这么三条办法。领导成员决定坚持。保守派和部队对全县大包围，造反派就反包围，搞游击战术，他们缩小包围圈，造反派就跳到外面去，周旋了二十六天。

保守派说，张钦礼过去打过游击，主意多。他是现行反革命，要通辑。见了张钦礼，开枪打死，要死的不要活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又来了一次大逮捕

前后捕了一千二百人，把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几个领导成员没捕着。他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不敢去车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张钦礼被捕

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到杞县

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同志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人吸引过去，这几个人都被捕了。其他人往西南冲，冲击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说话了。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包围了，被捕了，捆起来。

这时，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但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

把他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张欣礼的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

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

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开始审讯

两侧是手持冲锋枪的战士，还上了刺刀，

政委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

张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

他又要张低头，

张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张交待。

张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

他要张交出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

张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问张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

张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

他打了张一巴掌，打得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

他就给张带刑具，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

他说：“你交待！”

张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

他又给张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张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张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他们又用绳子把张身上缠紧，张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又审讯张欣礼

是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的。

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

张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 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 去掉刑具；3. 自由演讲。”

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

张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

他们的办法是用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张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张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张钦礼在监狱遇见刘师长

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

在监狱门口，张欣礼见到了对面 8 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 岁，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带了手铐，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

张喊着向刘师长敬礼。刘用铐着的双手向张鼓掌欢迎。

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看监房的人，就拧张胳膊，按头，屁股都坐到脸上，全身骨头发响。腿被打伤了，不能走。

张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

两个拿刺刀的战士向张逼来。张往前凑了一下，战士往旁边让开了。

张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

战士说：“不让你读语录。”

张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

战士说：“是。”

张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

战士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

张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

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

战士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

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用汽车拉着张欣礼等三个人去游乡

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 4000 余人的斗争会。喊口号，群众不举手。

张对旁边的人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

有一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

以后就再也不敢让张欣礼游街了。

在狱中审了张 53 次，上刑 27 次。

张欣礼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同住的人姓白，张作了工作以后，白说是派他来监视张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张讲话；2，不要让张死了。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有的问吃不吃得饱，受不受得了。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 50 多天的工作，在 16 个解放军里，5 个人同意他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他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军内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三）张钦礼出狱并当上了县革委会的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张钦礼听到中央表态的消息

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

一个班长对张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班长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了。”

张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张钦礼接到中央决定放人的消息

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子，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新华书店一个组织的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兰考老贫农为张钦礼喊冤

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下起，为张钦礼喊冤。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地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战士营救张钦礼

又送来一个条子说，保守派打算把你搞出去，在三天内暗害。我与那几个解放军商议。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时，让我从牢房小窗子爬上去，翻墙逃走，他们两个人掩护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夜三时，张钦礼出狱

那两个解放军已经下岗了，忽然门锁响了，张马上拿了一个铁盒，好作武器。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原来是指导员进来了。张问他：“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来看一看你。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出去。”

张看他今天的脸稍好看一些，就说：“你们不是要害我吗？等我穿好衣服穿好鞋。”

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开来，车门一开，两个人把张一架，塞进汽车就跑，架得紧紧的。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张说：“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要死在兰考，再开我就骂。”

他们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革命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兰考县十个领导干部：《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焦守凤：《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张欣礼到了北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兰考县张钦礼焦守凤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夜；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边会议室。〕

（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开始，刘建勋同志热情地向张钦礼同志招手，张钦礼走到刘建勋同志跟前，刘建勋同志让张钦礼同志坐在杨成武同志的席位上。当时杨成武同志不在首长席）

刘建勋（关心地）：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

张钦礼：是的。

刘建勋（对总理和张钦礼），控诉他！

（总理点了点头，张钦礼同志回到原席位上）

（会议中张钦礼同志讲话时，未讲完就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插话打断。张坐下。停了一会，总理走到张钦礼同志面前和张亲切握手，随即拉着张的手走到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有戚本禹，杨成武等同志。这时，刘建勋同志带焦守凤同志进来。）

刘建勋（给首长介绍）：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

（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同志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同志旁边坐下。）

周总理（关切地问张）：你什么时间到北京？

（张因耳朵被打坏，未听见。）

焦守凤：他的耳朵被打坏了。

周总理：你给他当翻译。

周总理（问张）：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

张钦礼：2月26日夜4点被抓。

周总理：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

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晨三点。七点由解放军同志送我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

周总理（关切地）：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

张钦礼：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二百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

周总理：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

张钦礼：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

周总理（生气地）：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

张钦礼：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同志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无限关怀地抚摸了它。）

周总理（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用手指张）检查治疗。

（总理联络员谢××上前问张的住处，并记下来了。）

周总理（气愤地）是谁抓你的？你在监狱里押了多少时间？

张钦礼：在监狱押了一百五十六天。逮捕我时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的。（周总理记下李地山的姓名）

周总理：开封军分区有人支持你们吗？

张钦礼：在提审我时看来，开封军（分）区的杨司令员和徐副司令员是同情我们的，兰考中队中一部分战士是同情我们的。

周总理：对他们，你们要区别对待。（并嘱咐张钦礼和焦守凤两同志）回去，你们要艰苦奋斗。

戚本禹：（问焦守凤）你妈妈来了没有？你还和她吵架吗？

焦守凤：她回去了，我没跟她吵架。

总理：好好作你妈妈和妹妹的工作，她们会明白过来的。

焦守凤：我一定照总理指示去做。（接见到此结束）

总理和张、焦二同志握手告别，张、焦二同志又走进双方汇报会议室。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张钦礼在首都革命派欢送河南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
《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钦礼为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做群众的小学生》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报道：《永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记兰考县革委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革命的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记者《革命先锋——记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记实》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下放干部的好榜样——赵新贞》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县支左部队坚决按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教导办事 深入细致地做好已解放干部的教育工作》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抓紧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兰考县工作的新进展

张钦礼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期间，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文件。

（四）张钦礼又被王新撤职、关押，出狱后升任地委副书记

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张钦礼又被批斗、撤职

1970年，兰考县革委下发了一个《奖励生产成绩卓著者》的通知，内容是“生产队达到每人年产小麦500斤，奖励马3匹；大队达到这个标准的，奖励东方红拖拉机一台……”。

被为省委副书记王新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物质刺激”、“标准的刘少奇生产党”，“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干部到兰考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一九七一年初，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

张钦礼在信阳地区革委会挂了个副主任的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省公安厅副厅）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

张钦礼在兰考的家数次被抄，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

他们还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在山东的老家，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通过了种种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秦、周二人为此还出了一期“敌情简报”报告给王新。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呆了几个月。

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兰考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周总理再次接见张钦礼

1971年11月10日，周总理再次接见张钦礼。他说：“张钦礼同志，你受委屈了，你的事中央全都知道了。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老熟人了。你治盐碱，治涝灾，很有成绩嘛。”

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张钦礼、杨贵）？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一九七二年六、七月，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张钦礼参加了省委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与王新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 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 是他逝世十周年, 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 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 谁想在这块土地上, 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 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 但是, 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 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 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 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 只能放到以后。

一九七四年二月上中旬,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 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 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 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 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〇年七月起, 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 踢摊子, 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 其中, 除调走七人外, 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 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 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 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 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 大整基层干部, 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 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 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 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 开大会, 游行, 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 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

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

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五）十月政变后张钦礼又被逮捕入狱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戴苏理找张钦礼谈话

戴苏理已经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左右，张被捕前，戴苏理把张钦礼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张钦礼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刊登新闻：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

贰、本节简论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颁布实施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河南省的领导干部在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带动下，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比较早，也比较多。这种情况对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十分有利。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河南的革命造反组织也准备向一撮走资派夺权。

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颁布军队支持左派的八条决定，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思想保守，对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以及支持革命造反的领导干部，抱着严重的对立态度，以支持还是反对刘建勋划线，支一派压一派。采取了发声明、组织部队上街游行示威、在报社搞夺权等一系列的行动，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何运洪又以群众把矛头对准军区为由，对革命造反组织采取镇压措施，宣布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逮捕其骨干分子，在群众中搞请罪活动。

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就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召集对立的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何运洪对抗中央指示，采取拖延战术，企图压垮对方，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领导才开始接见河南对立双方的代表。经过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先后八次集体接见双方代表，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才作出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成立以刘建勋为组长的河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

四、一九六八年一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

一方面，由于革委会本身的不完善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人接过“反复旧”的口号，打着“反复旧”的旗帜，把矛头对着革命委员会。这就错了。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对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是拆台，还是补台。

另一方面，由于一些跟着何运洪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加上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利用，打出了革命委员会“不见得”好、革命委员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旗号，把矛头对着革委会。

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由于资料缺乏，都不是很清楚。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开展这些清查工作的主要对象大多数都在原来的革命造反派中。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是与非、罪与非罪的区分，十分复杂。稍有不慎，就会犯打击过头的错误。还有一些地方、一些人本来对革命造反抱有仇视情绪，乘机打击进行过革命造反

和支持过革命造反的人。这种情况各地不一，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张钦礼的情况很特殊，他是在一九七〇年被王新以搞所谓“刘少奇的生产党”的罪名打下去的。

五、十月政变后河南省的所谓“揭批查”问题，主要不是“扩大化”、“派性”，而是镇压革命、大搞复辟。当然，河南的当权派又当了一次典型——坚决镇压革命的典型！他们获得了全国第一！所以他们受到上面的夸奖、维护。以后，河南的当权派还当了一次典型——镇压人民纪念毛泽东活动的典型！他们居然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的人判了几年徒刑，他们又获得了全国第一！

2008年1月11日初稿

2011年10月13日修改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说：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这个问题，我请示了主席。如果华北局书记处有问题，可以改组嘛！夺权不成。

代表：从已揭发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开批判斗争大会，可是书记处却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

代表：我们要继续贴揭发李雪峰的大字报，并要开揭发斗争李雪峰大会。

总理：可以贴大字报。你们把“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都贴到街上去了，李雪峰三个字都倒过来了。我每天都看到，也没有制止过。雪峰检讨不是不可以，最好时间晚一点。他也没说不给你们检讨。主席也说过，检讨检讨就够了，总是检讨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石家庄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代表

谢副总理：石家庄、张、宣、唐、秦地区经过双方协商和解放军努力，在陈伯达同志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的指示，

顺利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三个协议都很好，我们热烈地祝贺。（全场热烈鼓掌）。希望造反派，解放军同志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武斗不符合革命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武斗只能使敌人钻空子，只能使走资派地富反坏高兴。

陈伯达同志讲话：这个协议是大家努力，两派协作，能达成协议，这是很大成功，是我们走向胜利的一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谢富治第四次接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等地近来有些人，个别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些动摇。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个别人不怀好意，大家不要失掉警惕性。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张家口石家庄唐山等地代表讲话
伯达：我们担心你背后有人捣鬼。一个工人阶级不可能设想非要停产武斗才舒服，一定是有人告诉你们怎么干，在你们幕后指挥，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指双方）可能隔着好几层，我说你们这几个地区都要注意，这是肺腑之言。

谢副总理：现在有少数造反组织不纯的问题，有地、富、反、坏、右，甚至有杀父之仇的人。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起作用，特务、地、富、反、坏、右对我们有仇恨，唯恐天下不乱。煤矿停产，帝国主义、苏修、蒋介石才高兴，你们没有敌情观念。

在生产中坚持生产一直表现好的，不管他是哪一派，都要表扬和奖励。

你们大学生包办一切，大学生不懂生产的重要性，处处包办人家的事。

现在有相当的造反派，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生产的造反派不是好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河北省保定邯郸地区代表的讲话

保定成立革命筹备小组、工代会、红代会，联合起来，这件事联合起来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线，不联合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大批判，关键是大联合，这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最关心的，你们要立新功。到北京

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文件，最近特别要学习江青、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和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想一想是派性高于一切，还是党性高于一切。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天津附近天津的各派不管那派，也不管那个学校，如果到农村里边制造派别，制造武斗，抢收庄家，那是罪过，绝对不允许的。（严肃）郊区的农业生产，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那个生产队收购，一定要割好、收好、捆好、分得好，不能抢公家庄稼，如果那一派有动员农民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历史是不能宽恕你们的，大联筹要特别注意。

谢富治：下一步搞政治协议，根据江青讲话抓大方向，抓大批判，要搞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的讲话

谢副总理：你们鲁迅公社有几个问题，应提起高度注意，你们不改变态度，没有好结果，根本大方向得好好扭扭。一个组织纯洁性；二是对解放军的态度；三是斗争政策，方法是适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三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今天我只讲了你们，不是说解放军和另一派没问题。

陈伯达同志：河北的问题，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不想管，让你们吵去，闹去，总会闹出个头绪，总有一天不想闹了吧。现在我再给鲁迅公社提一个建议，我不赞成你们再存在。你们鲁迅公社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甚至谁也不认识负责人，跨行业的。我建议你们组织解散（谢：别的地方也要解散）。什么马路兵团、八五风暴等全要不得。你们（对红旗）现在不是有个共同的目标吗？（搞红旗及××），这个目标是错误的。（谢副总理：你们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其它军也是错误的。

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精神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最后谢富治

同志告诉清华大学，你们怎么不处理呀！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同志不要抓，还把他放回清华，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采取专政措施。事实上，他出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 414 就把他藏起来了，怕把他打死。如果把他打死群众就犯错误。不应该打，更不应该打死。讲这个故事，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习再学习。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席。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突出一个“公”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无产阶级的“公”字，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狠抓“用”字，就是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各级革命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立了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共为八十人，其中军队支左干部四十一人，

地方革命干部，包括生产指挥部原有干部，共三十九人。各组（部）的人数为：办事组十人，秘书组十五人，保卫组四人，政治部二十三人，生产指挥部将原有的一百二十人，减为二十八人。此外，另有附属、服务人员三十多人，包括炊事员、电话员、机要交通员和汽车司机等。

从革委会成立近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新的革命机构，同旧的观念、旧的不良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中央同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二日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希望你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设置工作机构时，都能参照执行。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贰、本节简论

关于河北省的文化大革命状况，也许是由于资料收集太少的原因，还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非常遗憾！

2008年9月21日初稿

2011年10月14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

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张体学同志书面检查”的批示

1968.01.30；中发[68]2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同意张体学同志这一书面检查。望武汉军区党委召开现在武汉的湖北各地区代表和武汉市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革命干部的会议，印发这一书面文件。在取得群众代表同意之后，张体学同志即可参加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在实践中认识改正错误，努力建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告武汉市三钢、三新各革命组织：

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八、中央解决湖北军队内部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

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〇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

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出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机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康老：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曾思玉在湖北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李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

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反党夺权。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的口。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我是7月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李以一贯正确自居，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了。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查。我找李迎希谈，他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〇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扬子江评论》创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北斗星学会”“命名的团体在武汉正式成立其精神领袖为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与冯天艾。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 1957 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既抨击了“搞什么鸡血疗法”的逍遥派，又针砭了“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司令”、“佛爷”（掌权者与造反派）。〈宣言〉表示，他们要做的是“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换句话说，他们要在官方报刊社论外自己寻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手段、方法的答案。〈宣言〉无论在思想上和语言上表现出了对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某种离心、反叛与挑战。

这一读书会性质的组织不久便被当时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思玉与刘丰公开指责为“一个奇怪的组织”，并在无形中迫使它解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日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么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于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 516 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 516。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决、扬”即“北斗星學會”、“决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 1967 年 11 月至 1968 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據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憶說：“北、决、扬”人員極盛時不過 25 人，由于認識上的差異，造反派鋼、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反對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強烈批駁其觀點。魯禮安（華中工學院學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工，再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于魯在“七二〇”事件前冒著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被抓後，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活動，但並非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鋼工總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營魯”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紅旗》雜誌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山東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政委王效禹在《人民日報》发表的署名文章《擊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全國最先搞“反復舊”，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汉造反派認為武漢就是《紅旗》社論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結合而不是革命三結合”。1968年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初期，“在革委會裡，基本上是軍代表說了算，干部代表和群眾代表不起作用。群眾代表只是個花瓶和陪襯。當時有一種說法，說群眾代表是‘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小車來。’”

武汉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學生大批畢業離開學校到軍墾農場、上山下鄉，隨著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准學習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為專案審查對象，軍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隊”來整造反派。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以奪取造反派在各級革委會中的政治地位。“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一九七九年初，單位的人來家裡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島，見到了青島市革委會主任楊葆華。促成胡厚民下決心回武漢發動“反復舊”。

胡厚民在協和醫院住院，請朱鴻霞、夏邦銀、郭洪斌（Z口區房地局工人、工總組織部長）、田國漢（湖北印刷廠工人、工總宣傳部長）等巨頭先後上門找吳焱金承認鋼、新之爭中的錯誤。“胡厚民出院後，邀吳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講了抓他的經過和青島之行，還反省說，當年你們揪‘武老楊’時，我們共同

對敵就好了。他還說‘反復舊’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三個人出面掛帥牽頭。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復舊”打頭炮的是武鍋的王光照。

王特地選了對工總大逮捕的兩周年紀念日一，在廠門口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列寧選集》中的一句話“我們決不半途而廢”，這與朱、李、吳署名的《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大字報，拉開了武漢“反復舊”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鴻霞、吳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講，講保守派怎麼回潮，造反派為什麼受壓，為什麼要“反復舊”。王光照在“反復舊”中，在全市各單位一共講了60場大型報告會，與他同臺演講的有丁家顯（武漢測繪學院學生，鋼二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吳焱金、朱鴻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軍宣隊拿“三條扁擔”、“三根繩子”壓造反派，“三條扁擔”是指“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條罪名；“三根繩子”是指造反派“想當官、想入黨、造反動機不純”三條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漢口工藝大樓街頭召開“反復舊誓師大會”。

大會由胡厚民主持，朱鴻霞和吳焱金分別講話，有數萬人參加大會，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揚眉吐氣”。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將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群眾組織代表接到北京京西賓館。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離造反派頭頭與群眾聯系，要壓制造反派捍衛“文革”成果的努力，臨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總武漢客車制配廠頭頭）當“反復舊”負責人，交代說：我們去北京以後，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寫信，你們在武漢鬧得越歡，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付廉返回武汉搞反復舊

付廉回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我当时在孝感花园，谢青云是团长。他找我谈话，说：老付，你根子正，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你有时候没有头脑，容易动肝火，这次本来是对你们有利的。安排

我在机关组，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固定的组，团部可以随便进出，我进去他们就谈天，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玩了几个月，说我是个幽灵，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悟县城玩，车子可以随便借。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权都在他们手上，当时都听军代表的，这个权力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开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我说都回去。在反复旧的时候，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厅里的干部对我说，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把那么好的一个斗批改搞散了，他要喝你的血。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朱鸿霞、胡厚民等成立所谓“反复旧”指挥部，搞“反复旧”运动，湖北武汉地区许多单位停工停产。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有人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和统一一直被看成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而且，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动乱之后，毛又强调自上而下重建集中和统一制度的必要性。但这个根本原则现在遇到了挑战，而且，另一个原则——分权与制衡——提出来了。如果实行这样的原则，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会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毛的绝对权威也可能会成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

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五月，反复旧的时候把谢保安打入另册

他们巴不得我早点走，免得留在武汉找他们的麻烦，就很快下户口，落户到宜昌去了。

汉阳区还特地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去宜昌，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交代。此后我就开始了在农村的生涯，其它人都陆续回城走光了，我就是回不来，当地农民推荐了许多次，都不行。最后宜昌县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刘兴举直接对我说，小谢，如果上面不做安排，你们就不动，推荐是一百次也是没有用的，这才知道当权派已经把我打入另册。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六九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付廉的学习班

航运局成立革委会，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召开什么党委会、行政会都不通知我参加，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完全是名不副实，我还算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坐的地方，牟登第也是副主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张蓉是主任。一次别人喊付主任，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说我骂他，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一直悬到坐牢为止。

1969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在复兴公司，先抄家再搞五不准，他们12个人对我一个，侯善生负责。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大瞌睡，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烟，不让他们谁。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他们一凶，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是对目标对准谁，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给他讲故事。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了一顿，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做做好事不要讲故事好不好？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整人起家的，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

1969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就把我解放了。张体学找我谈话，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你和杨爱国担任副指挥长。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我问赖指挥部设在哪里，他要我不要管，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派一个胖子盛工来协助我。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找交通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人蛮随和。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他年纪又大，就开始担心怕他出什么事，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在这个指挥部里，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不放心，到 11 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里，开始的架势蛮大，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说你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这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个性很刚，不怕他们。后来逐渐地松了，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利用小头揭大头，我们不是重点，还是他们利用的动力。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的军代表是个小孩，拿我们没得整，成天就是谈天，肉包子要吃十个，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吃胖了。我们 1970 年 6 月回到武汉兵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在兵站住了几天，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就各自回单位去了，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五、湖北省的“两批一清”运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

到十月二十八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

十月三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 10 条，从第 5 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

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此时曾、刘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 1000 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

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

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

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学习班的领导人对胡厚民特别“重视”，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一九七〇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

他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

他说：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

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

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

陈伯达越说越气地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把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日，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

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至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相玉等。

一九七〇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刘丰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一九七〇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曾思玉说胡厚民是“北、决、扬”的总头目与“五一六”合伙

曾思玉在湖北省“两代会”上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一九七二年，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三人单独关在省公安厅。

一九七三年三月，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等转移出武汉，到了咸宁。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一些人为杨道远翻案

一些人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二年，又一次办付廉的学习班

付廉回忆：“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

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蛟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二年，张体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

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刘汉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

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六、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

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 3 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 1974 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 4 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

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谢某）谈话：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命 8 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 5 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不出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 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到他在车站路 15 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

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 9 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武汉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准备谢某补台至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谢某从农村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五年底，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

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

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

七、湖北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省委通知挂职锻炼的群众代表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一些人继续为杨道远翻案，

一直都是写信给周恩来、江青、王洪文等人，后来就因此说我跟四人帮写效忠信，恭喜江青做女皇什么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三月，成立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等七人核心领导小组

参谋班子有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沈复礼、聂年生、曹承义。

胡厚民开玩笑说：“彭勋是摇鹅毛扇的。”彭勋说：“我是鹅毛，胡厚民是鹅头。”“鹅头”之称从此不脛而走。

胡厚民对到省委的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具体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这个班子是“钢头新兵”。

随后，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

号召全省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

口号大多数为胡厚民等参谋班子所拟订，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列席会议。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关于

各级党委补台、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等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

3月9日、11日，夏邦银、谢望春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研究转弯子的会议上，打电话出来“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胡厚民等人按其要求，部署调度群众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前往，省委负责人出面接见，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

（后来被说成：“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一些群众代表到省委、省革委會，听取省委負責人的答复。

（后来被说成：“3月19日冲進省委、省革委會機構，圍攻、控訴省委負責入）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

“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月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人山人海，群情激昂。

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

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中断了电话会议，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

据谢保安（武汉三中学生，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回忆：

我们进入省委办公楼一个个办公室找，最后我看到他们在那个会议室里，就把门一敲，要他们中断会议，跟我们一起去跟群众见面。宋侃夫说要有个值班的，刚好我今天值班，是不是我留下来，我们就同意了。

随后我们把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去。因为要等待汉口这边布置会场，我们就把车子沿着水院到广埠屯转一大圈。后来赵辛初说我们要解小手，我们就到龟山脚下的公共厕所，看着他们方便。因为当时担心如果万一

有人打他们一下，或者他们自己想不开，所以很紧张，他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赵辛初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我们到达武胜路之后，已经是人山人海。赵辛初他们一个个沿着长竹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他们还都算是做了明确表态。

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是田学群主持的。

会议结束之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就把他们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他们接回去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他们一一护送到家。

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完全是不得了，说我们中断了省委领导的电话会议，造成全省革命和生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

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 1975 年)“六四”报告。

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 1/3 的单位搞起来。

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

“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 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 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

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

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

胡厚民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想调顾建棠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

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顾建棠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群众代表提出省委、省革委补台的具体意见

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

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他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

夏、朱、胡提出：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

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夏邦银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

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中共中央委员）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勛到宣传部当副部长。

当时，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指示，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

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八、政变后镇压造反派

十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实行镇压、翻“七·二〇”事件的案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 8 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

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省委向省直机关传达“四人帮”被抓

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谢保安听到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的消息

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

“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 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 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 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 Z 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 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波澜岁月》179 页至 183 页，自费印刷，2003 年）

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胡厚民被關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 45 號看守所。

一同關押的还有楊道遠、夏邦銀、朱鴻霞。原來因“北決揚”案件被抓的人也都關關在這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 4 人逮捕。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

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〇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

张立国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夏邦银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北决扬”问题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另一说：“决派”的组织有数千人登记）。由于他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在上面发表他们的观点——一个不大的文革不同政见者流派在武汉登场了。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〇”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首先集中在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上。他们认为：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宣布：“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放到了‘决派’肩上。”什么是他们要建立的新政体呢？那就是“公社”，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建立这一新政体呢？“决派”主张“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通过对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还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政治与阶级状况的分析中。

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更深一步，他们还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在中央，则是以1967年开始转而批极“左”，迫害造反派的文

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北、决、扬”断言：“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中心任务。”

与他们异常激进的阶级、路线分析相反，在对待中共及保守派历来重视的干部与群众的“历史问题”上，“北、决、扬”却表现出了特有的宽容和理智。早在1967年5月20日，鲁礼安、冯天艾便以“红司新华工敢死队”的名义贴出一张题名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文章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现在又能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即使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历史，基本上仍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把他们仍称为变节自首分子，硬将他们塞进‘叛徒网’之列。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革命干部，就是挑拨干部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

与上述分析相随的是，“北、决、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决派”——“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换句话说鲁礼安等人准备建立新的政党取代已经腐化的中国共产党。另外，鲁礼安等人还按照马克思关于“废除常规军”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要求消灭人民解放军，代之以人民武装。

“北、决、扬”这一自视为“造反派中先进分子”的认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中有更为完整的阐释。该文认为文革中所有派别可分为六种：极右势力、保守派、革命造反派、中派——考茨基派、形左实右派、决派。作者认为，一般造反派与决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造反派不仅普遍漠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且也很少认识到他们的敌人已形成了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文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某个走资派，所以不去反对革委会。相反，他们在革委会相互争权夺利。‘决派’却不一样，他们完全理解，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紧张化决定了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必要。这就要求推翻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一个民运分子指出：“北、决、扬”等人”要彻底推翻“革委会”，推翻并重建腐化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北决扬”所反映的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候，一些省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和流派，如上海的“炮打”派，湖南的“省无联“，山东的“翻案兵”等等。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根据湖北省上报的不真实的材料，断定：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其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从而，错误地把“北斗星学会”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湖北省又把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一些学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并判刑。

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

二、关于“反复旧”问题

1，一九六八年二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三结合的架构在组织上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很不完善，往往形成军队干部一家说了算的局面。在一些地方、基层单位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感受最深的是原来的革命造反派。

2，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九六九年初，苏联加紧了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并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造成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央为加紧备战，稳定内部，推进文化大革命，积极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3，当时，在一些造反派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认为，全国的形势仍然处在一种非常严重折危险局势中，而中央某些领导人，在“七二〇”事件以后开始右倾了，甚至认为毛泽东本人对方向路线错误的斗争也发生倒退了，由严肃处理军队支左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转到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而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就是一个标志。

4，湖北省的一些群众组织代表，由于自身的一些感受，加之不同程度地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全省发动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在当时局势下，这样做显然是与中央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

5，中央对湖北省“反复旧”运动错误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是把湖北省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请到北京，周恩来四次接见做说服教育工作。然后，中央“五·二七”批示指出：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批示一方面指出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开展“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此后，所谓“反复旧”运动也就停止了。这个问题也就算是解决了。

三、关于“两批一清”问题

到了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以曾思玉、刘丰为正副主任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搞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材料上报中央，致使中央发出《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而他们又利用这个指示去打击革命造反派，把一些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都打成“北决扬”的总后台、幕后黑手、五一六分子。人数达六十万之多，时间达四、五年之久。受打击最重最深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带头人以及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揭露和清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中，发生扩大化的错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四、关于群众组织代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起伏问题

随着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湖北省一些受打击的群众组织代表企图乘此机会，揭露过去一段时间反文革倾向的错误，求得对革命造反派的公正待遇。但是，由于与运动总的要求不合拍，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如此，但一些领导人自知理亏，对个别人还是作了一些释放、补台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搞整顿，造反派又成了挨整的对象，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都“滚”出了革命委员会，下放到工厂农村。

一九七六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湖北省这些挨整的群众组织代表又闹腾了一阵，随着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政变，他们敏感地预见到最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

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成了“四人帮”在湖北省的骨干分子，被关押、批斗、逮捕、判刑、坐牢。

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性。只是在湖北省这方面的材料揭露多一些，其它一些地方还封闭得很严密。

2007 年 12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14 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加强管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他们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盗卖国家资财，炒买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工业品，盗卖票证，金银，外币，毛主席象章，甚至贩卖枪枝，弹药，毒物，汽车，私设地下工厂，雇工剥削。他们抗拒管理，活动猖獗，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而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纷纷出现，乱摆乱卖，哄抬物价，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较重的生产队和社员，弃农经商，擅拿产品进城，高价出售，扰乱了市场秩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市场上尖锐斗争的反映。

目前市场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獗。各地务必要重视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这个工作。对于投机倒把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给予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主义市场阵地，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各地纷纷请示，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搞，还是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搞；农场职工是参加工代会，还是参加农代会，有些农场职工为此事争论不休，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国营农场是以农为主，而且许

多农场是场社合一，因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以参加农代会为宜，当否，请复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批转广东革筹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一月二十五日报告悉。同意你们的意见。

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

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彪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三、广东省的批林整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根据讨论精神写成的纪要：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 2 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 3744 人，有 78% 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

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 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 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四、李一哲的大字报事件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

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

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

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五）谈反潮流

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

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二、限制特权

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

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

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

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

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贰、本节简论

关于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收集到的很少，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资料，就更少。

一、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与其它省相似。

所不同的是，在夺权阶段，赵紫阳搞了一个“让权”，中央采取措施对广东实行军管。

军管以后，军区又把参与夺权、冲击军区的群众组织打成非法组织、反动组织，逮捕“反动头目”一千多人。

二、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事件，是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

（一）李一哲文章的作者

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据说，“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是王希哲自己说他们与造反政治立场不同。

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

（二）李一哲文章发表的过程

“本文”写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这时，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3，8，24-28）刚刚结束。

“序言”写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连同“本文”贴上街头。这时四届人大即将召开（10月11日中央发出通知）。

（三）李一哲文章的基本思想

王希哲在一九九四年说明过他们当时的基本政治态度：“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

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

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久远，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

王希哲认为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的方向走去了。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1994年12月，第18页。）

（四）右派文人对李一哲文章的评价

有的人说：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其次，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李一哲

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宋永毅 孙大进：《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有的人说：“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

有的人说：“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1976年版）

（五）对李一哲文章问题的处理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共广州市委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批判李一哲。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三月，广东公安机关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及其支持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及其支持者被平反。

从李一哲文章的发表到最后平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一哲的文章是当时右倾翻案风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8年3月24日初稿 2011年10月19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十二月九日报告收悉。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教育革命先在本校，本地进行的意见。目前，大、中、小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串联。为了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

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应当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作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工作，提出改革方案。报纸也应加强对教育革命好的典型经验的报导。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吉林省军区《关于吉林省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

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成就，中央同意并支持这个协议，希望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保证落实。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中央希望吉林省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各地的革命大联合和吉林省的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康生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时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你们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要成立了。你们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达成几个协议。你们吉林成立革命委员会，不经过革筹小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还是比较先进的。你们虽然占十五、十六位，但有新的创造。

干部问题你们经过讨论有几个解放了。有几个干部这一派那一派有些意见，阮泊生、郑季翘几派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还有对宋振庭、宋任远的意见不一致。长春公社要解放郑季翘。红革会、二总部要解放阮泊生。

阮泊生问题，你们说有个党籍问题。光看这个问题不行。要看他的整个历史。我不认识这个同志，不能光看一时一事。阮泊生三八年总入党了吧，填表是真的吧，四八、五八、六八、三十年，三十年你们不看，就咬住那一个时期，这是不对的。

郑季翘我接触过几次，这个同志是不是没缺点，没错误呢？那不是。人只要做工作，总会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要看他的大体。他大体对陆定一的中宣部，对周扬的批判。他有他的长处，同志们，你们知道罗，他是批判了周扬从苏联贩卖来的形象思维论的。他和陆定一阎王殿中宣部是有斗争的。

赵林是个老叛徒。

富振声，这是我知道的，我在莫斯科，他去，我审查的，这个人不但和陆定一的关系很恶劣，我估计他个人历史上也有问题，他从东北到莫斯科这一段有问题。

还有李砥平，是叛徒。

粟又文，省长，这个人是个“民主人士”，我接触过，问题很大。

宋任远我不认识，据说他在统战工作上反对李维汉、徐冰的路线，也执行过也反对过。

宋振庭这个人我有接触，是延安鲁艺的学生，这个人说过错话，写过杂谈式的文章，据说还有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罢了官，这不要去看，我们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他好的一面。五八年我到长春，他专门向我汇报了长影的问题，他对长影的斗争是坚定的，当然这是吴德同志领导的。这不但是对长影的斗争，这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另外，他对陆定一宣传部和教育方面都作过斗争的，这个人你要抓他的错话错事随便都可以抓到的，但从大节上看，基本上还是反对阎王陆定一的。这个人大概是这样的。宋振庭这个人反右斗争时他会是一分力量，反“左”时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就是了。从这方面看他不是三反分子。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会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中禹、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钊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飙、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乌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家英、姚美玲（女）、许肇昌、周文贵、朱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担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两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经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

长白山麓，辽松平原，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们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吉林省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问同志们好。今天由我读一读中央的批示，同志们，大家都收到了吧？（读批示全文）

总理讲话：

第一件事，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不能站在一派的利益上，一派的主张上，就都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应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合乎的就改嘛。

第二件事，要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吉林省是多民族地区，汉族是大多数，还有朝鲜族，西部白城地区还有蒙古族。

第三件事，加强敌情观念。

第四件事，生产问题。汽车厂在全国很重要，不仅国内重要，还有战备、援外任务，我们希望汽车厂要带头，希望你们计划要订得高一些，因为你们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机械化程度最高、最先进的工厂。要求你们在生产上，第一季度过两个月了，第三个月要转入正常生产，第二季度要跃进，吉林省在工业战线上打响这一炮，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你们有没有信心？（众答：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

〔按：文革中，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单奎章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支持下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百六十六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百一十一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贰、本节简论

吉林省的文革资料也是残缺不全。

一、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革命群众批判吉林省委执行错误路线的材料，基本没有。

二、一九六七年二月吉林省长春市的革命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第二总部和长春公社。

吉林省军区及吉林的驻军采取了支持第二总部，压制长春公社的方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一九六七年八月，经过中央的耐心教育帮助，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发出《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

四、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二月，资料缺，大概是两派继续斗争，甚至武斗。

五、一九六八年一月两派达成三个协议；二月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

六、一九六八年二月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以后的资料又没有了。

七、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说：文革中，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单奎章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支持下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百六十六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百一十一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这件事怎么看都叫人难以置信！

2008年5月22日初稿

2011年10月21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反派宣布夺江苏省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和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关于九项问题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第二次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南京大学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江苏造反派宣布夺权。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挤一派，夺权派应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单位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召开庆祝大会，三十万人参加。

南京八·二七去了五万人参加大会，照顾团结，把夺权斗争推向前进。

夺权派找了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台发言，批评了南京八·二七，说他是站过来了。

大会提出“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

在《新华日报》上登了：“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直登到二月十八号，还在登，还有文章，长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
周总理：

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学毛著必须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才能活学活用（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

这一段（指第三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

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首先造反派是政治上占优势，现在有些单位是人数上也占优势了。保守派在瓦解。造反派人数上占优势后，就会骄傲了，包办代替了，当然这只是苗头。希望你们警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到三月二号，省军区主持开了个农业生产会三天，，有省、地、县三级参加。

“抓革命、促生产”也委托军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二、关于“亮相”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三、关于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五、关于宣传工作

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还有“砸烂×××有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本。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争取、团结、教育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二六”之后打、砸、抢发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不仅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

决定公安厅，公安局军事接管。外部造反派都退出，内部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出新生力量。

报纸是党报。造反派夺权之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成了派系报纸。里面有些口号是错误的，是很错误的，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当然，最好是协商，改组，现在看来不行，还是军事接管。外部的都要退出。内部若有力量，能够很客观地报道，就出报。否则就停它一个时间。

工厂方面，特别是军事工厂，很长时间搞两派斗争，生产搞得不好。工厂怎样军管，正在考虑。用哪种形式还在考虑。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队保卫。不叫外面去串联，看情况。

杜方平表态：错了就改，没有跟得上就再跟上，我自己知道有错，不知道有这么大。

杜方平向八·二七同志表示，你们批评，要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我欠了八·二七的债，有多少，还多少，我支持了夺权的一派。

我的指导思想是支持一派，团结另一派。支持以后，实际上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虽然对南京八·二七有团结的愿望，但过早表示了态度，事情发展就难以控制了，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着急。

文凤来发言。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回去以后先要夺“私”字权。欢迎八·二七，东方红帮我们整风，和解放军搞好关系，支持解放军。回去一定好好干，一定做团结的种子，绝不做分裂的苗子。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同敌人江渭清是一致的，过去由于受压制，对压制过自己的同志有意见。后来学“毛著”少。

张建山：中央首长对我帮助很大，我一定要夺“私”字的权。最近南京黑字兵很猖狂，更重要的江渭清这一派还在起作用。我们做了一些事，的确是违背了中央

指示，反正群众要干就干了，有人说我们的后台是江渭清。我自己有决心，解放军接管，我们双手欢迎，否则收拾不了。

曾邦元发言：首先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欺骗党中央，不阳奉阴违，这是革命者起码的品质。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斗争，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来因为受压制，是带宗派情绪的，我们也要从掌权派所犯的错误中吸收教训，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按中央指示去做。刚才杜方平讲欠债，我们说，不是欠债还债的问题，我们都有错误，对革命是损失。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我们外地的也犯了很大错误，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南京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张春桥讲话：

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

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

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

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风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

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

南京部队从老早就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

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

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够那样随便地冲了。

姚文元讲话：

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

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一·三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呀！六·二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

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第二个想谈谈大方向问题。三·五和五·一四讲话还适用不适用？我看除了个别词句外，现在情况还差不多，联合问题没有解决，夺权还没有解决，还是军管嘛！我看军管会现在有瘫痪的危险。要是那样子，江苏的形势是有利，还是不利？

三、江苏两派大规模武斗，中央解决江苏武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遣调查组赴江苏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出一个调查组前往调查了解和协助解决南京和江苏省无锡、苏州等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如劝阻武斗、冲击军区、部队、夺取部队枪支弹药、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等等，调查组由三军干部、红旗杂志、新华社记者，国务院联络员和北航红旗革命小将组成，共 38 人，由刘锦平同志任组长。请你们协助他们搞好这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
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由镇江 252 部队李德康在 252 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三代李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代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1）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如果参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 XXX 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 XX 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

整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的 XX 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心中有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文革调查组接见首都红代会在宁战士时的讲话
八月廿一日下午，中央文革江苏调查组接见了首都红代会大专院校在宁战士。总理秘书宋皋同志讲话要点如下：

- （一）南京文化大革命开展比较早，交大，南大都比较早，但形势较复杂；
 - （二）要研究解决五月十四日后南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要历史的唯物的研究；
 - （三）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同志讲话是中央肯定的；
 - （四）如果都是造反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没有前台？有没有后台？有没有后台的黑后台？
 - （五）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建立革命新秩序。
-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联络站《华东通讯》第十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分歧简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组织简介》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红总、八·二七和促联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南京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江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的复电

中央完全同意和支持你们三派代表于九月四日在南京达成的《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并且高兴地听到你们三方已在南京开始实施。

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协议书和中央这一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能按照这一协议书的各项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逐项付之实施。同时，中央要求各地驻军和军管代表协助和保证各派群众组织对协议各项的贯彻执行。

愿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某日，刘锦平在苏州两派谈判签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刘锦平在无锡两派谈判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无锡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 9 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

“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

“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

部队的代表：27 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

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

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

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五月份去了一次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

七月初六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

七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

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最激烈时，“八·二七”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打够。

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祖；一个面临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很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这是主要的，当然六十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存在。

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十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二十七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

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胡说。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老插话：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帐，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

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讲南京的大联合：

姚文元谈斗私、批修：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江苏红总方面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南京八·二七方面的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刘锦平接见江苏工总勤务组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接见南京促联方面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在省军管会委员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五”指示就是标准，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落实到江苏的几条。按“三·五”指示，都应做自我批评。

（南京）军区有（南京）军区的账，省军区有省军区的账，廿七军有廿七军的账。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标准，搞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

（一）对部队加强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张春桥说：“你们二月份取缔革命组织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犯了错误，部队转过来不容易，现在“626”、“主力军”来了，对部队要多进行教育。

（二）作好工人队伍的工作，先使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张政委说：上海工人联合了，没有谁能影响他的。你们无论如何先把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可先把工代会搞起来。

（三）（提到革与保的问题）张政委说：革与保的关系是有这个问题的，但需要做历史分析。1.3 事件以前，两大派是在革或是保，在非常鲜明。1.3 事件基本上把保守派打垮了，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有些到造反派去了。情况就复杂了。每个大的组织，都有左中右，就是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也要保护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我们要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四）（当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时）张政委说：你们可以多想一些办法，也可以学习山西省的办法，搞个政治协商会议。你们 27 军、空军炮九师、人武部和“九·二”、“主力军”、“626”等大小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定期开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先联合，不一定马上把所有旗帜倒下来，那是最后的理想，名字不一定马上取消，可以待下一步。如果大家都觉悟到了，取消更好。现在有许多地方，先基层联合，自下而上，一个车间，一个工厂，一个系统联合起来，成立工代会。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方向，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大联合。现在先达成几条协议，作为联合的基础，纲领。

互相打起来都有死伤，打起来没有好拳，骂起来没有好言。是走资派挑动的，恨要恨走资派，要恨阶级敌人。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看清，主观上还以为是革命的，群众有些误伤，这样被打死了当然是可惜的。这场大革命，一点代价不付不可能。这次代价最小。江苏武斗是比较多的地方，上海就没有那么多。大家想一想，三年解放战争付出了多大代价！抗美援朝战争将近三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也要三个年头，我们能一点流血都没有？阶级斗争嘛！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嘛，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反映嘛，免不了失手错打了人，有误伤。这种事要分成两类：一是打群架，打起来总会互有死伤。两派都打了，都不要怪对方。另一类是专门打人，用武器杀人，凶手，当然要抓起来交专政机关处理。暗杀更是那个了，

当然不行。活埋，一定有坏人在背后出坏主意，安徽就有，是阶级敌人插手。象你、我，会去活埋人吗？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内部团结了，就找到出路了。现在，常州还在打，很紧张，铁路又不通了，沪宁铁路经常停车，上海、金华那边都通了就是常州这个关口过不去。我要向你们呼吁！今天请煤炭工业部，铁道部的同志也来了。现在淮南煤矿的煤运不去，你们那个关口过不去，影响上海冬季生产，影响整个五年计划。毛主席号召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你们要认真执行嘛！

康生讲话：

最近。我们接到云南的一个电报，报告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斗私批修，打掉派性，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以便促进大联合。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了有八条。这八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很好。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第一，以势压人。就是以自己的力量压制别人。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人多的那一派要注意。我在青岛听到机车制造厂有人自我批评说“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就是说的以势压人。第二，唯我独左。就是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他都是老保，以我为核心。这不是主席批评了吗，是最愚蠢的！第三，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反正从派性出发，（总理插话：这恐怕对你们有点写照吧！）第四，自己不作自我批评。讲是讲了，是叫人家作自我批评。第五，从派性出发，对干部也好，对群众也好，谁支持我，我就结合谁。是派性，不是毛主席路线。同我的意见一致的结合，不大一致的不想结合。第六，报复主义。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第七，学习毛主席著作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第八，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这是比较普遍的。他们检讨这八条以后，原是按派系组织学习班，以后联合起来组织学习。这是云南一个地方（下关）的经验。主席看了很好，比较简明扼要地把派性，阻力检讨出来了，希望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时参考。

总理：刚才军区来的二十一位同志在门口要求接见，我们准你们进来了，但要告诉你们一条，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

（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 21 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

从这三个地方汇报看出来，也听出来了，协议定了，本来应该很好执行，但总是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没有按系统联合，一个就是学生去干扰。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首先按系统联合起来，协议执行就有问题，只要一个学校干扰，就会影响工厂。

如工厂联合起来，就不会受干扰了。各省都是这样，江苏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十一月十八日的号召，南大很快达成协议，提出退出工厂，但实际上这个协议没有实行。南大八·二七还到各县去串连嘛！上次说了，不要到工厂串连，也不要到各县串连，现在要停下来。一个学校不能包办。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连是对的，那是起了带头作用，破旧立新嘛！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我们是忘不了的，在文化革命历史上要大书特书一笔。但是到了今年，情况不同了，夺走资派的权，应该以工人为首了，上海就带了头嘛！如果运动的领导者是学生，就不稳定，就会摇摆，最容易受社会思潮影响，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派性发作，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江苏之所以拖到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的很清楚。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希望南京大学做个表率，协议要执行嘛！你们是受过压制的，你们回去，你们的贡献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和你们都个别的谈过嘛，如果把手伸得很长，又要管工厂，又要管各县，就象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北师大等五大院校要管全国，手伸得很长，结果自己管不了自己，还得收回来。

常州应该把协议修改好，戚墅堰铁路机车车辆厂与地方分开，单独搞个协议，树立个样板。扬州工人虽少，但总比学生多，不要被学生支配。师范学院你们叫鲁迅大学也好，都要复课闹革命，建立红代会，职工搞工代会，农村搞农代会，按照中央十月十七日通知，按系统大联合，不要去干涉地方上的事情，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纲，特别是要斗私批修。

我希望今年年内解决，南京也好，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也好，都要做出榜样来，那能拖这么长的时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嘛！军队一定要把军管搞好，铁路，交通都要实行军管。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如果你们认为军管有的人不行，我们可以换人嘛！但你们一定要服从军管。军管会的威信一定要树立起来。毛主席，林副主席派的人，权威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会的权威树立起来。明天我再找部队少数人谈谈，军管会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没有军管会这个桥梁怎么行？！

铁路交通系统要脱钩。但你们笼统的提脱钩也不行，还是要工人阶级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铁路系统，交通系统要脱，各地工人要联合起来，多数的要欢迎少数的，象解放军欢迎新战士一样欢迎他们回去。因为都是阶级兄

弟嘛！有缺点各自作自我批评嘛！简单的说脱钩，不那么容易，要达成几条协议。订协议要双方都能做到，不是用对自己有利的去压另一派。铁路系统的人到铁道部，交通系统的到交通部去谈，我同意，可暂时住西苑。脱钩要积极脱，要有几条协议保证，谈好再离开代表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希望南京大学各派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

目前，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立即回到本校去，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要认真学习 and 确实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校的斗、批、改。

要以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来推动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的讲话

康老说：关于镇江问题，由李作鹏等同志同南京军区的同志一起来帮助解决。镇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很坦率地讲，你们那个地方两大派由于派性发展，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到部队。部队意见不一致，军队的派性也影响到地方。因此，中央很关心江苏省的问题，镇江是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罗。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贺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许世友在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许世友：

今天大家谈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在用脑考虑问题。不像过去没有敢把大家放在一起，大家都虚心了。自从上次和大家见面后，我就没有管过事。杜方平、高小平是坏蛋，是黑手就应该斗，一切责任要向黑手，是他们在搞鬼的。同志们对以后想了很多，怎么办？这些意见都很好，成立革委会要很好学习上海，特别是报纸，《文汇报》跟中央跟得很紧，我只看《文汇报》，《解放日报》只发了30万份，《文汇报》发了60万份还不够。江苏南京的问题要搞好，关键在头头，你们说要搞好就搞好了，你们说要搞坏就搞坏了。抓黑手、抓坏人一定要自己搞

自己的，自己清理自己的组织，否则就要乱。上海的经验你们要很好的学习，我们虽然比上海推迟了一年，但也有好处，经验教训要多一些。红总方面受了杜方平的骗，八·二七就没有受高啸平的骗吗？现在要向前看，要顾全大局。军管会要硬一些，对一些坏人、杀人的、破坏的、强奸妇女的，该抓则抓，该捉则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复，因为你们的联合就是敌人的完蛋，敌人是不甘心的，干部问题应该联系调查，这样好，干部解放要联合解放，坏人也要联合审查，现在干部要照顾到整体，要有全局观念，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应该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山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否则你们的山头一下子也搞不好，红军也有山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一定要照顾到大局。对南京的问题我一直不管，生病去了，今天我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今天的气氛很好，你们派性少了就好了，群众是要跟毛主席的，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群众就会把你们抛掉，你们不能掉在群众后面，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曾邦元同志反映现在有骄傲自满情绪，有什么骄傲，现在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抛掉，有派性，组织上联合起来实际上并没有联合。现在还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一定要打倒，它是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有无政府主义的人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一切他自己说了算。上海把坏人拉出来，挂牌子，戴高帽子进行斗。这些人你不打击他，他就打击你。你们这些头头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有人暗杀你们的。军管会要大抓毛泽东思想学习，在组织上要抓好干部，对杜方平、高啸平的斗争，还是联合起来斗，这样比单独起来搞好，斗坏人不能联合还能联合起来组织政府吗？杜方平是前线指挥官，他与林杰有关系，杜方平后面还有杜方平。你们八·二七没有上高啸平的当吗？我看是上过当的。你们在北京四个月，我去过一个月，是住在主席那里，你们见不着。你们关心我的身体，老是自然发展规律。我今天讲的可能是主观主义，过去打，现在不打就算了吗？你们犯了一点错误，接受经验教训就行了吗？我们犯的错误比你们多。

四、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许世友：

刚才姚文元同志读了主席，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江青：

我想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财政混乱状态。这就从上两个月英镑，美元贬值开始，黄金出现了两种价格。美元一贬值，就要囤积居奇，抢购物资，物价上涨，工厂倒闭，人民生活就要发生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国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势呢？我们国内货币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是稳定的，这在全世界还找不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众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讲这么两句一对比，就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一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不同。帝国主义出现了二、三十年来没有的混乱。敌人混乱，对我们来说就是胜利！就是大好！

那么国际形势如此，国内形势也大好。江，浙是祖国富饶的省份，目前形势也大好。这在同志们今天的热烈情绪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不打不相识，到现在在一起成立革委会，不是形势大好吗？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敌人是不是就睡大觉呢？就不活动呢？不能这么说。也还是有曲折的，有某些反复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正常现象。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贯串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就是“左”倾，或叫极左，形左实右和右倾分裂主义，我们就是和他们不断进行斗争，不断前进的。在大好形势下，我提醒同志们，在目前来自敌人的干扰，右倾保守，分裂主义是主导，而不是形左实右，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表现。去年下半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形左实右以后，也可以说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的爪牙以后，右倾分裂主义苗头就开始了，到今年右倾分裂主义便大肆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相当可观，表现在为“二月逆

流”翻案。同志们知道什么“二月逆流”吗？从前年冬到去年二月，蹦出来个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他跳出来把锋芒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搞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他和形左实右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他们跳出来想翻案，我们藐视他们，要他们跳出来，不跳出来不好，你们说要不要让他们翻案？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叛徒。特别要点他的名，是因为我过去保过他，他在江、浙有一定市场的，我提醒同志们要警惕！去年春天他就在这里干不正当的勾当，利用他在新四军的关系活动，今天有重新告诉同志们的必要。另外，过去中央文革这个班子，就是刘，邓留下来的班子，个别坏人隐藏下来，干了些坏事，现在把他们揪出来了，不能再干扰了，他们利用这个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否定革命小将的功勋，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军队要不要把他们打倒！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动摇新生革命委员会。你们现在正在成立革委会，一个新生事物，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不要上坏人的当去动摇她。这个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过程中，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要向他们进行斗争。同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我只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

总理：

同志们，今天姚文元同志宣读的中央批示，很快得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向大家庆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鼓掌，口号）今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整装待发，急着回去开成立大会，这是一件大喜事。

刚才江青同志说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从形势看问题。形势大好，世界一片大好，尤其是中国形势大好。敌人一片混乱，帝国主义金融，财政危机，赤字上升，通货膨胀，四十年来未闹过这样大的金融风潮。现代修正主义者开了一个二月黑会，报上也评论了，也是支离破碎，矛盾重重。帝、修、反在一起，美帝，苏修的指挥棒不灵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革命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口号）兄弟的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支持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前后方配合得很好，仗打得很好，美帝、苏修日子更难过。现在中央批准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是第十八个，在中央等着批的还有四、五个省，

照这样，三、四月份二十九个省市基本上可以全部成立。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十九年前解放了，现在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了辉煌胜利。从上海一月夺权，到现在江、浙两省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是很高兴的，敌人是恐慌的。我们就是要敌人恐慌，美帝、苏修要捣乱，他们也要考虑考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如果他们冒险，就会彻底灭亡！

（江青同志领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谁要挑衅，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成立革委会，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要在江苏省革委会的领导下，首先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叛徒刘、邓、陶、彭、贺、彭、陆、罗、杨、谭震林以及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大批特批，批倒！批臭！（口号）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起来，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进行大批判，对广大的群众教育就更深刻了，就更好地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从这个关键问题着手，不要忘记当前形势。

第二，从去年冬天到今春斗争有反复。去年的“二月逆流”，他们想恢复旧秩序，经过半年斗争，批臭了，后来极左思潮，“五·一六”形左实右闹了几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声号召，就击退了，钻进几个坏人，中央文革自己挂起来的，感谢中央文革劳苦功高的同志。极左批了，右的又来了，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总有一小撮兴风作浪。可以肯定，只要中央文革一声号召，马上他们就垮台。目前在北京街上可以看出这一小撮人在活动，搞右倾分裂主义，不会不影响到江、浙、上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是，反动的就要打倒。只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能推进江苏各地、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对敌斗争。江，浙，安徽处东南前线，曾是蒋贼财阀统治地区，南京曾是国民党的巢穴。要有敌情观点，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间谍，都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干扰，他们闹不起大事，但可以干扰我们。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敌斗争眼睛就亮了，对敌斗争就会节节胜利。南京大军区，不仅管江苏，而且要管上海，浙江，安徽。江苏是东南重镇，很重要。所以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好好地进行斗争。

第三，批准的常委名单，没有批满，三十九位名额，只有二十八位，还空十一位。主任就是大家热烈欢迎的许世友同志，副主任七名，有可能多一些，有的省九名，十几名。副主任，还有十一位常委没补，军队、地方名额都未选齐，尤其是群众组织的代表，还没有选为副主任的。提议副主任改为若干名，另几名待补，究竟选几名由常委讨论，逐步充实，不要仓促定下来。浙江采取这个办法，江苏也可采取这个办法。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大联合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支左不支派，所谓支左不支派，是不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而要支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四，拥军爱民问题。这是毛主席所号召的，刚才江青同志说了，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九·五”江青同志对安徽讲话，以后又接见红卫兵讲了。根据毛主席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要巩固加强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要在拥军爱民中表现出成绩。过去这方面有反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反面的，这种反复不仅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这有好处，反复，取得经验教训。靠什么解决？林副主席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标准。拥军爱民要双方作，人民解放军最听话，犯了错误，一声令下，马上就改，改了就好。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才有这样举世无双的军队。这一点，江苏驻军，六十军，二十七军，一个去江南，一个去江北，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军种，兵种。犯了一点错误，改了，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最后，江苏已成立了革委会，上海要与浙江，江苏配合起来。生产要有煤，运输要畅通。农业生产去年增产，今年江苏麦情好，在座的几位女同志，都从公社来的，她们清楚。农业好，工业只要革委会抓，一抓就灵，江，浙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能上去，把安徽带上去，在全国起作用。

康生：

江青同志讲，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极左思潮也要防止。实际上，形左实右，北京有，南京也有。现在有一小撮替“二月逆流”翻案，替“二月逆流”的头子谭震林翻案。要坚决打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任何活动。江青同志再三讲了，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毛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搞山头，搞

宗派，要搞全中国的大山头，要做革命派。革委会成立了，委员们千万不要带山头主义思想参加革委会，要当四千七百万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不是各派联合会。不管哪一派，哪一种山头，只要真正实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样的人就要相信，依靠。要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机构，有缺点要帮助改正，新生事物难免有缺点，不要认为这个人犯错误，动不动就打倒。这是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不是各派联合会，要好好地爱护，帮助。

周总理讲要拥军爱民，中央批示中也讲了，我几次对江苏讲话中讲过，我是共产党员，有义务为一些老同志讲好话，不管一小撮反许世友同志，我和许世友同志一起工作过，许世友同志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林副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今天证明我这个话没有错！同志们，错了没有？（众：没有。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我不是说许世友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他是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品质，他有缺点错误就敢公开承认，就改，这点要向他学习。中央批示中说，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觉得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革委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保证的，他不会搞阴谋，不搞两面手法。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拥军爱民。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关于形势问题

第二、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第三、关于加强革命委员会建设问题

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尤太忠在镇江的讲话

五、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〇年四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一九七〇年八月，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五·一六”分子108人，点名“五·一六”248人，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五·一六”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一九七一年一月，省五七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五·一六”的重任。

1971年省五七干校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五·一六”开始后陆续进来的。

1971年2月，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五·一六”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五·一六”。靠边审查，

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五·一六”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五·一六”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五·一六”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

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五·一六”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

放在南京钢铁厂的 60 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

1971 年 10 月，迟明堂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1971 年底，干校 3000 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 1600 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 400 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 80% 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一九七一年六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被打成“5·16”的占 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 55.5%，处级干部占 42%，一般干部占 30%。

1971 年 11 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 2400 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 70% 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 人中有 25 人打成“5·16”，其中有 8 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 43 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 64 名“留守人员”，有 39 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 60%，处室负责人占 62%，党支部委员占 80%，党员占 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 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 100 多人，

逼死 5 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 4 0 0 多人。有的科研单位 1 0 0 % 的科以上干部和 8 0 % 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工作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 9 7 2 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研究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 2 0 0 多人辛勤劳动，投资 5 0 0 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一九七一年十月，被南大一位被打成“5·16”骨干的人泄愤检举。江苏省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怀疑，一位被审查。

1 9 7 5 年 5 月 3 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 2 9 8 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 8 4 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 1 1 名。

一九七一年六至十月，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

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 2 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 3 9 0 0 多个、2 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 2 0 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 1 2 0 0 多场，收到举报材料 2 万多件。

4 个多月内就有 5 0 0 0 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 6 0 0 多人。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

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

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

1972年底，南京市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二年底，盐城地区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

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

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六、无锡市文革进程

（一）革命群众批判无锡市委路线错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

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无锡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

一九六六年七月，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 XX 老师，XX 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无锡市第一中学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无锡市第一中学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无锡市第一中学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任，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 64 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无锡市第一中学校园内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无锡市第一中学，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 5.6 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

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

一九六六年七月，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

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 6.26 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

“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大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底，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

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一九六六年九月某日，无锡市“拱北楼”面店的工人曹桂宝以“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在无锡市“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

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 81 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

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卜岩等人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

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 XXX 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

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

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

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

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

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

“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

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

“亦工亦农；

“造反兵团；

“红色公安战士”；

“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

“红艺兵”等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无锡市陆渭文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

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

造反队与“红总”挂上了勾，随后，陆渭文被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当面对郑挺说：

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

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无锡市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揪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宣布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下午，无锡市工联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派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闻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

（二）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主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人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在无锡市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无锡市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三)无锡驻军支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无锡市人民欢欣鼓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无锡市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 1、2、3、号通告，前往 27 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 4、5 人。

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

“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 XX。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抗议支左”部队宣布主力军一些基层组织为“反动组织”。

1967 年 2 月 16 日，以“6.26”为首的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了。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6.26”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 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驻军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三月，尤太忠（27军军长）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会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查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7.5造反团”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 造反团”的第一批数百名红卫兵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

当天下午，

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

市一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支援了；

锡师“8.18”、八中“8.18”、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4.15”、七中

“4.23”、“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

“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

一批“6.26 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

“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

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

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

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

4 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二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瞭，在 27 军干部内部对红卫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

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7 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向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意见。经过两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6.26”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

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驻军支左人员王晏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

在红总平反前，第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发生“火烧”小延事件，“六派”学生向“九派”学生发起进攻。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

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

陆渭文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上由“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经过了这段曲折，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一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

二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

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

电讯兵团，（电讯系统）

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 20 万左右。

此时，支左部队支持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简称“九、二”）。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派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陆渭文任“总指挥”，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

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

第四天晚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九、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武斗指挥部，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英雄团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拥挤，这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明，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作出决定，明天（6月20日）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一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

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

“6.26”，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二”一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榨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 X（文革后期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挤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一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突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

“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 9 条死尸。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 4.5 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接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 14 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 14 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下午 5 点多钟，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

“缴枪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待到第二天早上，火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晚，“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起攻击，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无伤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在国棉二厂内二、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达南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主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吴戈华（政治部主任）三人到南京 A、B 大楼，解决 27 军‘支左’的问题。

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 B 楼，上了二楼会议室，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

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 27 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吴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

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 27 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

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

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 27 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吴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吴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吴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吴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吴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吴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 27 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吴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到指挥部。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 252 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场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

李德康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后说：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

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

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

陆渭文，浦湘海问：“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李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

军院的人详细地介绍了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

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卫班（游击兵团）“6.20”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 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后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 18 世纪の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

这时 252 部队的李德康提出了改变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 252 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

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 27 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 0 师的一个步兵排。”

这天上午 7 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

‘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 27 军 79 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

“7.22”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7.22”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刘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查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

陆渭文接到通知之后，留守在洛社待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 10 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倒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 13 人，“九、二”出动的一个班一死两伤俘 13 人全军覆没。

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 9 月 14 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

由于洛社”9.6”事件，”9.9”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 9 月 13 日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 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在 9.13 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愤，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

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一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 3 百多人迅速撤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清晨 6 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 XXX，XXX 中弹倒地，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亡，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

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 10 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 50 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 9 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二”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6.20”部队进攻。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革后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出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6.20”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 60 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祁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 10 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 2.3 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 11 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

“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从 9 月 1 日起到 9 月 15 日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 20 多位主力军年轻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无锡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 9 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

“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

“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

部队的代表：27 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

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 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 9 月 26 日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 68 年 1 月 28 日返回无锡。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五日，在镇江的主力军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陆渭文离开无锡，“九、二”包围老轻院，“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

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藏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这次老轻院被围 36 小时之久。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厂。当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进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四）无锡市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无锡市革命委员会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分驻全市各处要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

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全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

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吟声不绝于耳。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查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纾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沈渊如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

（五）陆渭文等成立“反复辟指挥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干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抵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时，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夜，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 10 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

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

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 5.9 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原“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

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陆渭文再次召集会议。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 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 10 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断然拒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同日，陆渭文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

陆、匡、陶三人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 3 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

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

匡建中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

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

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口号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

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常熟市的每个角落，苏南地区……

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 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

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

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被迫逃亡他乡。

未及逃脱者，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

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

一九六八年十月，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

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

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一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陆渭文召开韩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一九六九年四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浙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

（六）无锡市革委会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〇年春天，无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一九七〇年九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

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 18 只大监房，16 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囚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

陆渭文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 70 年 20 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

许世友说，“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 67 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上午九点过后，看守俞天杰喊：“‘013’出来。”陆渭文走进审讯室，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说：“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70 年 20 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

“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徐世忠说：“好，如果今后查出你是‘5.16’时，新帐旧账一起算。”

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16”，但全市列出的“5.16”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是直接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的，占了“八大罪状”。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 1022 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

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刺激”的口号，无非是“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这两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又把这事定为“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并把这件事的参与者、组织者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2) 《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当时，军管会已经承认错误，这时又把这件事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3) 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急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在这件事上，最多是是两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军管会至少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这时，却把它定为《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之一。

(4) “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二”派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这些武斗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5) 火烧装甲汽车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这个事件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进行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6) 七月三日大撤退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革派联总”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个行动却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7) 洛社武斗

一九六七年七月，“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

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篡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8) 夏季阴谋

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

此“大案”追查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

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

(9) 五月暴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

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10) 流亡政府

一九六八年五月，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锡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

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此外，还有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

该“要案”即指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

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

在围绕上述事件追查过程中，发生许多严刑逼供的事，如：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 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 xxx 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 xx 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自七一年一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于喷血身亡；

陆渭文的妻子张 xx 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河；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 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 xx 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逍遥派”。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 xx 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七四年底仍可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机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铃医生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还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据查；

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

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

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竟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一九七四年，由于民愤太大，市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

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籍，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

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

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七）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一年十月，无锡当局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彪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

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有关当局说：

“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

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

一九七二年初，王晏等又放出风来，说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象；次日天一亮，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

继续“深挖”的需要，又开始对九二派下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甚至于，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也因是“九二高参团”成员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一九七三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初，专政机关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象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

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

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

王晏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蹊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们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

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

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

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

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

“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 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 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 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 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 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 xxx 同志进行审查，现已核查清楚 xxx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

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 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and 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 x 年 x 月 x 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一九七五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出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

看守所的干部问：“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陆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七六年四月，陆渭文被送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

（八）十月政变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一九七九年三月，陆渭文“无罪释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 X 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 XX 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锡市中院驳回通知书》

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省高院驳回通知书》

陆渭文：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 1980 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 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新村 15 号 202 室，邮编是 214026，电话号码是 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 26 号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于 1992 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 年 8 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回”[附件]

于 1997 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 98 年 12 月“予以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 x 的死”这两句与本人无关。

所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是故意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同行入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 82 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二，1992 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三，1998 年 11 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 1，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 2，在省高院的复查中仍然是偏听偏信，当时的所谓揭发材料，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有人为立功交代问题，对待言论的回忆，以谁为准？

四，如此简单的案情，当事人申诉 20 年，而不给平反纠错，问题的结症所在，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市委作过的决定。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如果这样，要法律何用？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空话。

要求，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再次复查，纠正这一冤案。希望，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居然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几日后答复曰，该案已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今后不再受理，来信也不再回复。即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不死，苦心等待。

近日，又闻肖扬院长之声，”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错难纠，甚至有错不纠，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 10. 28.

七、苏州陆兰秀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最初，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她多次向毛泽东、林彪上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但马上招来地方当局的打击。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陆兰秀写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来看，她只是反对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还没有走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直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地步。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陆兰秀写了二十来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她说：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

“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

“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

“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陆兰秀被处以极刑。

一九七八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为陆兰秀平反。

一九八二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

一九九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二〇〇一年，《陆兰秀狱中遗文》，由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

贰、本节简论

江苏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资料，收集不多，而且一九六八年后就没有了，难窥全貌。好在它的一个地区——无锡市提供了较多的资料，使人们对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文革初期，江苏省委执行错误路线，主要责任人是许家屯。十月政变后，他得到重用，被派往香港担任新华分社的负责人。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后，叛逃美国。

二、江苏省的一月夺权，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一派夺权，排斥异己。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南京市有 10 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 330 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江苏省实行军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两派武斗越来越升级。

七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

无锡主力军约四千多人被打出来了，从无锡退到南京。江苏省还有许多人跑到上海。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中央直接出面干涉，还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江苏省督促检查。一直到十一月，各派之间陆续达成了一些协议，如《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扬州两派达成协议、南通达成了一个大联合协议、无锡双方搞了一个重申十四条，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常州也达成制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等等。但为了一些支节问题又争论不休，协议很难落实。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才基本解决问题。

三、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情况说明，省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四、无锡市提供的资料说明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的若干情况

1，一九六八年无锡市成立革委会后，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是按照中央统一布置进行的。但执行中有扩大化倾向。加之，当权人物中原本就有压一派的问题，而“老造反”中社会成分比较复杂，违规违纪的现象较多，很容易形成把矛头对准造反派的局面。

2，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造反派的带头人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仍然采取对待“旧机构”的态度来对待“新机构”，组织所谓“反复辟指挥部”，企图以武力进行对抗。这样的作法，是与中央的战略部署相违背的，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是，地方的当权派利用一打三反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则是完全错误的。

3，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无锡地方党委按照中央一九七〇年中发第二十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发第十三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进行了清查“五·一六”的工作。

在此期间，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了林彪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 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这一段时间，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无锡地区来看，肯定是搞扩大化了。

有人说：这是“浩劫中的浩劫”。这就站到反动立场上去了。

4，十月政变后，当局对陆渭文这样被错关在监狱中的革命造反派，即使在平反翻案的大潮中，也并不急于平反，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无罪释放”。陆渭文出狱后，当局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一九八四年以他说过的几句话和企图叛逃台湾、

苏联的莫须有罪名，判刑五年重新投入监狱。虽经陆渭文多次申诉，法院至今仍不平反。这就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五、苏州陆兰秀一案，收集到的资料不多，吸取到的教训不少。

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困惑。这并不是只有陆兰秀一个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部分党员干部的大多数人逐步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学会了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自觉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支持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始终坚持反对文化大革命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像陆兰秀这样发展到公开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确实是极个别的。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如果仅仅是因为陆兰秀的这些思想，就把她逮捕法办、就判处她的死刑，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陆兰秀能够活到今天，她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们有理由相信，她一定会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2008年6月15日初稿

2011年9月1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浙江省军区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付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1966. 12. 29；中发 [66] 622 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

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1967.01.30；中发 [67] 32 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廿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受伤或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以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丁均

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军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统由杜平同志、丁均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的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二、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

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

1967.07.19； 中发 [67] 223 号

中共中央批示：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

（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此事为由，说张永生与陈励耘、X X 等人策划，平息肖山、富阳等地武斗，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

三、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

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

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上登载了《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

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

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总理说：

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

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

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

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 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 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 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 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 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

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总理：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

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

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

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

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

第七条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

第八条铁路，公、检、法……

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

第十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第十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

最后一条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4号

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时，浙江大学两派也达成了《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

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肃清其流毒。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要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争取早日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四、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名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部书记，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嵎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总理讲话：

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

江青讲话：

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康生讲话：

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

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

陈伯达讲话：

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张永生同 xxx 等人，带领“宣传队”去浙南，发生武斗，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十一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

一九六九年二月“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开始后，南萍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期间，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

一九六九年五月，张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至四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 1 5 0 多人到北京告状。

1969 年 6 月 6 日，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1969 年 6 月 1 2 日，“红暴”派近 2 0 0 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1969 年 6 月 2 0 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1969 年 6 月 2 5 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 3 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1969 年 7 月 1 1 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6 月 2 6 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

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1969年7月12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200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人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有人对“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散发传单说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温联总头头叶少华、姚国麟等人组成八人小组。

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共计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温联总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身中六弹，壮烈牺牲。

在几十分钟内，温联总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数百名温联总人员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

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抓走而死。

温联总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

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

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他们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人被驱散，停止治疗。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温联总”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

温联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温联总守在最高处一一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把钟楼炸开了。经过两天两夜，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 65 17 部队进驻温州城。

“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扬言要吃掉 65 17 部队，来多少吃多少。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早晨。“温联总”红楼指挥部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接着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一九七〇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二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六、南萍等人的非组织活动

一九七〇年以来，南萍、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

南萍、熊应堂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彪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这个工程是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

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南萍、熊应堂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

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

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

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 xxx 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

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

一九七〇年七月，陈励耘把林彪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

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

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

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

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

一九七〇年九月，翁森鹤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副主席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

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彪“六大块四小块”的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

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

会场门口挂的林彪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

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南萍在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

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彪达到了高潮，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省党代会上，南萍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

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彪的书给南萍。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彪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

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南萍、熊应堂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

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

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南萍从王维国处回来后，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毛泽东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

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

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

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

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

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

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

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

一九七一年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议，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

（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公然刊登了林彪的画像。

七、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的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铁瑛、王子达、白宗善、马龙、张孝烈、万振西、夏琦、侯建新到北京开会。

这次会议由许世友主持，联系浙江实际，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对浙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一）会议收获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二) 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三) 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四) 今后意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一九七二年，铁瑛任省委副书记。

一九七三年五月，谭启龙任浙江省委书记。

八、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接着就来了一个整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翁森鹤被拘留审查。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五年七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挠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

（后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十月，谭启龙和铁瑛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 400 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

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

此事被毛泽东发现，批示：“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张永生平了反，谭启龙留北京审查。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永生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制订“批邓联纪打谭”的方针，策划召开“省两全会”。

张永生说：“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

一九七六年四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为省委书记。

九、十月政变后对革命者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张永生将大批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运到杭州。张永生说：“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

张永生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

张永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准备丢掉一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提出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显通（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 届毕业生，1968 年 3 月 18 日被任命为浙江省革委会常委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被在全省首先隔离审查和批斗。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李显通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对李显通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翁森鹤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二月，铁瑛任浙江省委书记。（至一九八三年三月）

一九七七年七月，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 年第十四期上刊登的文章说：对付帮派骨干分子“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

自 1976 年 11 月到 1980 年 2 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

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

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

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

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

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 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 202 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 662 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 7 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 190 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 4 人被判处了死刑。

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 1949 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 年 12 月 2 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 24 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1981 年，“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

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何、孔二人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1981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

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

台州被判处死刑的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

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

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

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

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杭西法刑字[79]第 74 号）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罪名，“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回杭后“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1974年，抵制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解决。

以反革命罪判处李显通五年徒刑。

一九八〇年某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杭法刑上[80]74号）

裁定：李显通案维持原判。

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李显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

（1981年11月20日，李显通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在李显通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1985年4月突然通知李显通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给厂里布置对李显通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份；旅游学院借用李显通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孩子和亲属。）

一九八〇年，方剑文被提拔为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

（后因倒卖钢材被判刑五年）

一九八〇年，姚国麟被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

（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

（后因跟市公安局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一九八〇年，杨秀珠被提拔为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为省建设厅副厅长。

（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未逮捕归案。）

二〇〇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

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多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

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贰、本节简论

浙江省委执行错误路线及群众对它的批判，材料收集不多，情况不明。

二、浙江省军区因保省委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而驻浙部队与省军区观点不一，也产生了矛盾。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管，成立军管会，未能解决上述矛盾。只得又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三、“红暴”是一个“老造反派”（材料不清楚）。但它后来支持军区未经审查和批判就保彭冲，因此犯了错误。虽然中央在处理浙江问题时强调要联合，在成立革委会后，地位不平等，在某些地区还受压。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军分区、人武部的支持。因此两派斗争不断，武斗升级。

四、南萍任省革委会主任以后，不仅一个时期、一些地区压制了原红暴派的群众，也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中打击了原革联派的群众。他还参与了林彪集团的派别活动。

五、在批林批孔中，张永生、翁森鹤等人乘势而起，要求解决清队、打反、清查中发生的问题。以谭启龙、铁瑛为首的省委领导，在政治高压下步步为营，有求必应。而到整顿时就反守为攻，置造反派于死地。

六、铁瑛建国以来一直在浙江省工作，1977 至 1983 年任省委书记。他在文革中及政变后的表演，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复辟狂。

“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走资派要革命派的命”，是这样吗？

2008 年 7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1 日修改

水陆洲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413980771>

内容包括：《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等等